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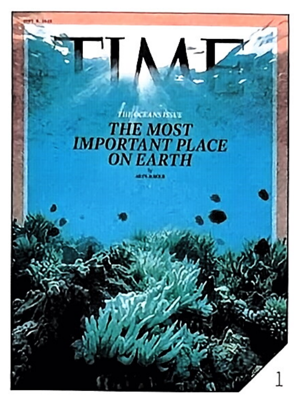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2023.9.11
2023年第37期，总第1255期
www.lifeweek.com.cn
跟着人类学家
重回老家
为何从远方回到家乡
如何重建家族联系
现代与传统怎样相遇
9 771005 360239 37>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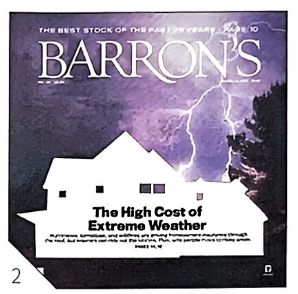


《经济学人》2023.9.2

AI 对民主选举的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伪造的录音、照片和视频具有高度迷惑性。最近，人们开始担忧它是否会提高信息“个性化深度造假”的可能性，进而对 2024 年的美国选举产生影响。OpenAI 公司表示，它将实时监控用户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具有政治影响的操作。Alphabet 和 Meta 表示会迅速对深度造假信息做出处理。《经济学人》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影响民主选举，人类也不会因为虚假信息而轻易改变原本的想法。











1 《时代周刊》2023.9.4

保护海洋

数据显示，2023 年 5 月海洋温度达到了最高纪录。预计 9 月份，世界上约有 50% 的海洋会经历海洋热浪。与此同时，海洋酸度增加，生态系统退化，珊瑚白化。据推测，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2℃，99% 的珊瑚礁都将消失，而珊瑚礁的灭亡会损坏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更重要的是，海洋吸收了全球变暖产生的 90% 以上的热量，如果海洋持续遭到破坏，气候变暖将会加剧。

2 《巴伦周刊》2023.8.28

极端天气中的保险业

在全球融资网络和数十亿公司资产的支持下，保险行业拥有近 1 万亿美元的超额资本，可以用于支付索赔。但随着台风、山火等极端天气的到来，仅在去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保险损失就达到 1200 亿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前 5 年的平均水平。目前，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调高了大部分保险行业的自然灾难损失预估，美国的各大保险公司陆续收紧承保条件、缩小承保范围。

3 《哈佛商业评论》2023.9/10

就业挑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在 15～20 年内，新的自动化技术可能会使全球 14% 的工作岗位消失，并从根本上改变另外 32% 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全球超 10 亿人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这项预测并未将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考量。目前，许多公司、机构已经投入大量资金来提升员工的技能。《哈佛商业评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挑战，不仅需要员工掌握新技能，还需要用新技能来改变职业。

4 《新科学人》2023.8.26

用户数据隐私

研究表明，自 2018 年欧盟发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来，用户使用互联网产生的与隐私相关的数据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这项立法限制公司对用户数据的跟踪与处理。但事实上，用户数据仍然经常被复制、分类，以及输入算法和机器学习系统。研究者建议，删除不用的软件、关闭历史浏览记录、多使用现金支付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数据被滥用。



28 封面故事

跟着人类学家重回老家

为何从远方回到家乡
如何重建家族联系
现代与传统怎样相遇



封面摄影：蔡小川

2023年第37期，总第1255期，2023年9月11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
下载中读客户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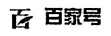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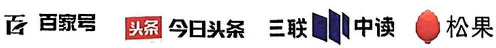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2023 年第 36 期，总第 1254 期

科学的决定性时刻

在尊重相对枯燥的史实框架下，艺术地重构了引人入胜的事件和人物。在当下动荡的世界，更能发起人类的思考。

（@ 牙科医生）

究竟是普罗米修斯还是潘多拉之盒的开启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如也如同电影中各种激烈碰撞的思想、观点和抉择，留个多元开放的答案吧。 （@TravisWY 魏什么）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请允许“人走茶凉”

去年春节，家中电话冷清了许多。父亲的手机也是安静的，不像以往那般热闹，各种拜年电话、短信应接不暇。

母亲笑说，果然是“人走茶凉”，父亲刚刚从一家企业老总的位置上退下来，境况立刻不同。

父亲跟着母亲笑笑，然后平静地说：“要允许别人‘人走茶凉’。人在世上，都活得不容易，精力有限，用有限的精力去应酬和取悦合适的人就够了，哪能那么面面俱到呢？不能说人家不厚道，这只是最简单的生存之道。”说着，父亲起身拿了喷壶去了阳台。自父亲退休后，家里的大阳台就成了花园，各种花草蓬勃生长，侍弄它们，是父亲退休生活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花草牢牢牵着父亲的心思，所以，对于电话的安静，父亲不以为意。

反倒是我，站在那里看着在阳台忙碌的父亲，怔了许久。我知道父亲的不以为意并非因为有了花草的缘故，而是他讲道理、看得开。而且他讲的道理，对于前段时间刚刚跳槽、同样经历了人事变动的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安慰。

3 个月前，为了有更好的前途，我从供职了近 4 年的公司跳槽。离开公司后不久，前任主管的母亲过寿，他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在南京出差，一是时间不允许我赶回去参加宴会，另外，我心里也多少有些不情愿。

怎么说呢，其实我对前任主管的印象并不太好。他有能力，但过于强势，说话刻薄，不体谅同事……只是那几年因为工作关系，要维持表面的友好，所以，我常常违心地参加他安排的活动，逢年过节也会主动打电话或发短信问候。如今既已跳槽，我便不想再维持曾经对他的“好”，连他的微信也被我屏蔽了。我深有体会，不情愿的感情付出，的确是一种负担。所以，他那次的邀请，我还是婉拒了。

但我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他对很多人说我“忘恩负义”，是典型的“人一走茶就凉”。我没有解释。我自己知道，我对他的冷落和“人走茶凉”没什么关系，因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热络，不是真心的。我只是在合适的时机，结束了一段不想维系的前同事关系而已。

因此，对于“人走茶凉”的真相，我深有体会：并非真正人心凉薄，只是在生活中，有很多关系、很多情感，当时的维系中有太多的不得已。如父亲所说，旁人可能碍于礼貌、碍于所谓同事关系，更碍于你上司的身份，才会在同处的时间里和你保持着适当的联络甚至亲密。这样的关系，随着一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结束，这是正常的，没有谁对谁错，更无关一个人的品质。

父亲对待事情的公道让我敬佩。我记得连擅长写情感小说的作家亦舒都说过：面对“新人”，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呵护“旧人”？而她所说的“新人”和“旧人”，指的便是新同事和旧同事。亦舒说，为生存做了同事而已，又不是夫妻，难不成还要求人家一生一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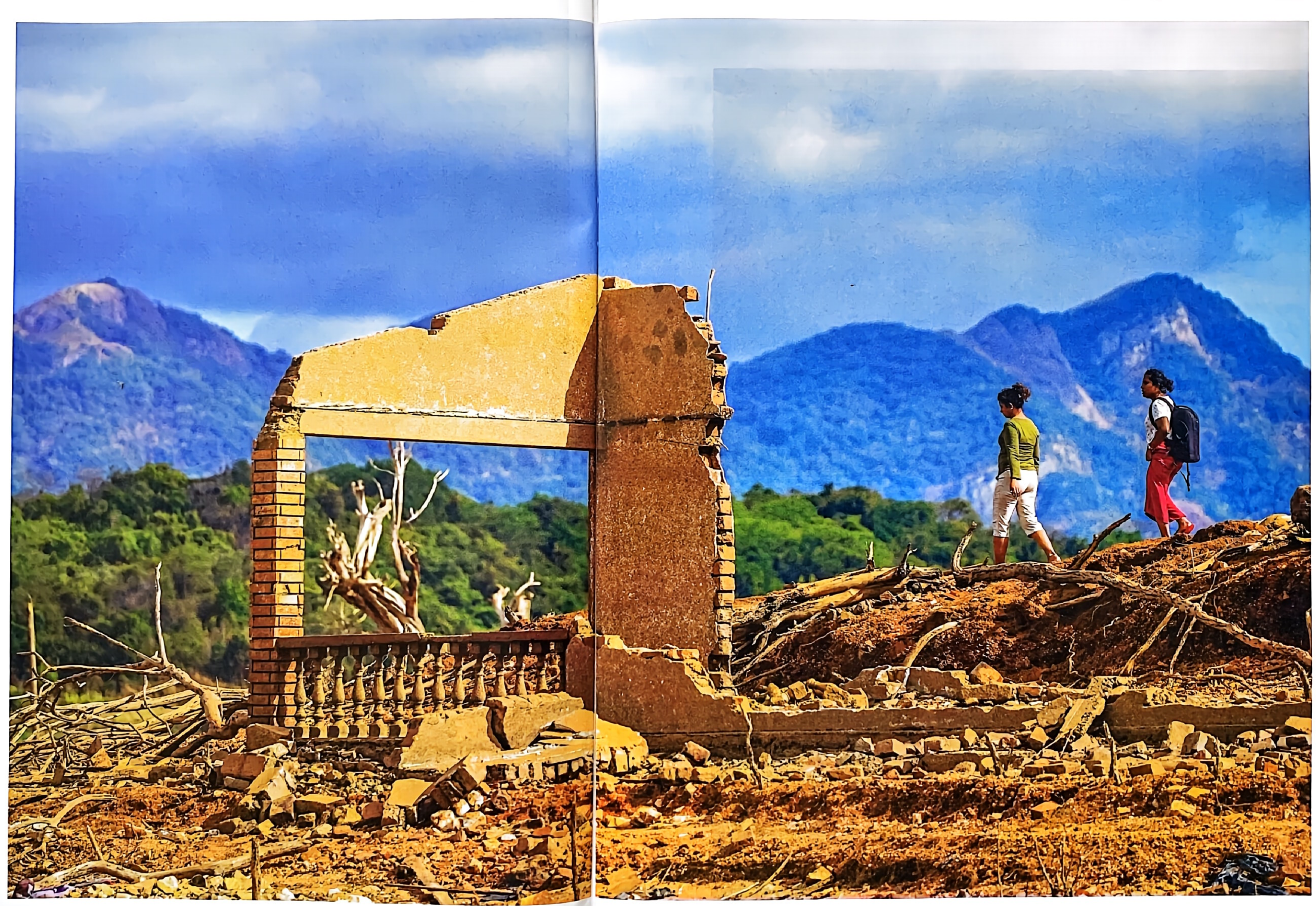
所以，面对“人走茶凉”，实在无须大惊小怪，笑笑就好。

（读者 雨凡）

本期截稿时间：9 月 4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斯里兰卡 | **干旱**

9月2日，游客在莫勒格哈坎达水库的废墟上行走。该国许多地区因严重干旱导致水库干涸。





英国 | **舞会**

（右图）9月2日，伦敦白厅广场举行2023英国夏洛特女王舞会。该舞会在1780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起。参加者需是年满18岁的贵族名门女孩，可身着舞会提供的白色高级礼服，享受美食盛宴。



非洲 | **转移犀牛**

（左页上图）9月1日，南非芬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几名工作人员准备将一头南方白犀牛转移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人员表示，易位是确保犀牛等濒危物种生存的关键。

巴勒斯坦 | **农场收获**

（左页下图）8月28日，巴勒斯坦工人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一个农场收获辣椒。





荷兰 | **芭蕾舞表演**

（左图）8 月 29 日，上海芭蕾舞团 48 名舞者在阿姆斯特丹马海丽吊桥上进行表演。

埃塞俄比亚 | **制作大饼**

（下图）8 月 31 日，亚的斯亚贝巴一家面粉厂的女工正在制作因吉拉。这是一种酸发酵大饼，质地略带海绵状。



“一口价”的价值

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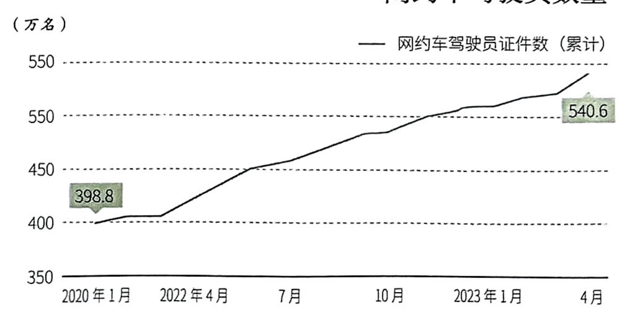
7、8 月间，石家庄、武汉、合肥和杭州都对网约车“一口价”说“不”，“一口价”的定价方式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可没有了“一口价”，司机们难道就能提高收入？各行各业都在节省开支，差旅费标准越来越低，打车若涨价，伤害的恐怕是整个网约车群体。

年初我去洛阳看古迹，一度犹豫要不要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那里离城区实在太远，二十五六公里开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试着搜索了一下网约车，“一口价”的单子蹦出来，40 元，价格太实惠了，毫不犹豫就去了。很多时候，“一口价”给网约车带来的是增量收入。

乘车人喜闻乐见的“一口价”，到底动了谁的奶酪？杭州这样做并不奇怪。此前，杭州在全国率先提高了网约车门槛，燃油车价格需在 15 万元以上，今后，网约车中的“老破小”要逐渐淘汰出局。有了“高大上”的城市出租车整体定位，打车价格当然不能低。“一口价”降低了竞争的门槛，网约车司机在低端竞争激烈，自然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实现车辆升级换代。

今年就业形势不理想，作为就业“备胎”的网约车和外卖，一下子涌入了太多的新面孔，以至于很多城市担心这两个行当人员过多，产生恶性竞争，于是纷纷关闭了大门。即便如此，行业竞争依然白热化了，司机接单量变少，工作时间加长，以至于当订单出现，不假思索地抢，抢完了再看价格。“一口价”定价太低，甚至有司机给运管打电话，投诉价格不合理，连开车的成本都覆盖不了。此时的运管一定是耐着性子听司机抱怨，而不是回怼一句：“你可以不抢啊！”这就是红海市场的典型特征，太过激烈的竞争，太过微薄的利润，众口争食，大家都不过勉强糊口。然后怨气冲天，舆论汹汹，干脆挑起了打车人和开车人的对立，最后闹到监管部门那里一关了之。

网约车驾驶员数量



事关“一口价”之争，其实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网约车的兴起。网约车以低价和补贴杀入本被出租车垄断的市场，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和现在的网约车司机的境况是一样的。出租车价格官定，供给不足，司机们沿街揽活儿，收入稳定。网约车出现后他们先是沮丧，继而是愤怒，取缔网约车的声音也越来越激烈。网约车能够持续扩容发展，成为现在就业市场的缓冲垫，是和消费者有关的，消费者不仅用脚投票，还通过自己的呼吁，给了网约车生存下去的环境。消费者图的是网约车的便捷和廉价，快车 1.5 元 / 公里，出租车价格一下回到 20 年前。滴滴又推出了“一口价”，高德把“一口价”变成了全市场的规范，打车人再也没有价格焦虑了，也因如此，坐网约车的人多了起来。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一口价”成了司机们的众矢之的？个中道理不难理解，网约车以开放的互联网共享精神起家，本质上是不应该关闭司机的加入通道的。司机们无法抱怨来自同行的竞争，只能把怨气发泄在定价规则上。

电动车普及，行驶成本显著跳水，打到的网约车多是电动车，其行驶成本只有燃油车的一半。随着国家新能源政策的落地生根，在城市乡村间穿行，低成本网约车已经成为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机的构成也发生着变化，杭州的网约车几乎都是河南老乡在开，农民们把土地承包了出去，带着一家老小在城郊定居下来，以开网约车为业。

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还差得很远，打工人还是太多，又缺乏社会保障。对于他们的工作境遇，是该先发展还是先保障？就业形势严峻，非但网约车司机艰难，乘客也面临着消费降级，此时恰恰应该是“一口价”多一些，供给和需求都需放量的时候。



栏目插图 · 范薇

半导体国产替代？

还没开发布会，搭载国产麒麟芯片的华为 Mate 60 Pro 就开售。是否 5G，华为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但速度堪比 5G。随着国内芯片技术的提升，半导体上下游厂商开始了国产化替代。Mate 60 Pro 进一步验证了国产芯片的可行性和竞争力。2023 年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 6570 万台，同比下降 2.1%，华为则逆势增长 76.1%，重返国内市场 TOP 5。

寂静的 PE 和 VC

7 月和 8 月，沪深交易所“零受理”，A 股 IPO 节奏或已按下放缓键。二级市场低迷，传导到一级市场，募资、投资、退出三条通道都安静了下来。此前一级市场持续火爆了 8 年，投资额从每年 2000 亿元增长到 1 万亿元。一级股权投资额已经连续 4 年超过退出额，退出压力越来越大，并购也难以消化退出压力。

《好声音》的资本局

浙江卫视宣布《中国好声音》暂停，距李玟的录音流出已 9 天。它的制作方是在香港上市的星空华文，还拥有《蒙面唱将猜猜猜》《这！就是街舞》等多个知名综艺 IP。上市后股价一度涨超 70%，市值达到 200 亿港元。李玟录音事件发酵后，星空华文的股价跌幅超过 55%。星空华文的前身是上海灿星文化，曾两次冲击 A 股上市，均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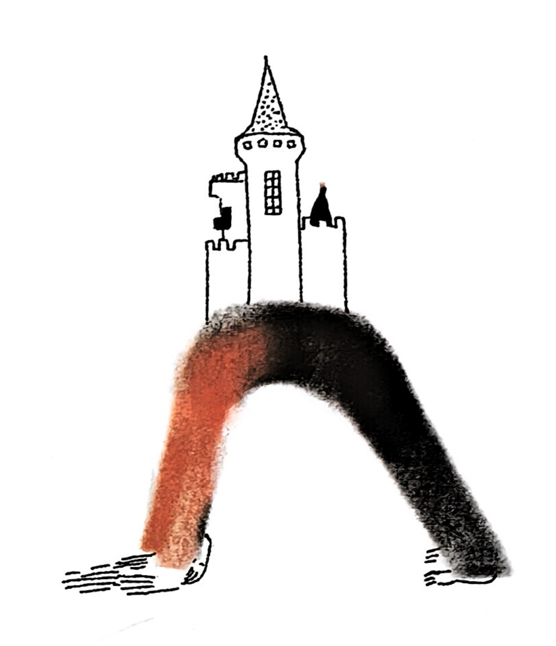
破发、破净就别减持了

证监会政策调整，上市公司破发、破净等情形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证监会还透露，相关部门正在细化规则，扎紧篱笆，避免“变相减持”“花式减持”“绕道减持”。近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很多以离婚、质押抵债、合伙人份额转让等形式，引来外界质疑，却难以核查。

餐企业绩亮眼



上半年财报显示，餐饮业正恢复增长，扭亏为盈。海底捞净利润22.6亿元，已接近2019年全年净利润，整体翻台率回升至3.3次/天。奈雪的茶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门店表现优异，扭亏为盈。达势股份（达美乐中国）总收入较2022年同期增长51.5%。“Tim天好中国”第二季度实现营收4.117亿元，同比增长129.7%。当然，餐饮业的成长与去年的低基数有关。



量化大佬买豪宅

百亿量化私募大佬、明汯投资创始人裘慧明以2.85亿元竞得上海一处豪宅，股民热议：“有一个平方是我贡献的。”散户“血流成河”，量化策略却大赚其钱。私募排排网显示，截至7月底，26家百亿量化私募，今年整体收益为6.95%，其中25家实现正收益。A股5000只股票，“模型+算力加持”的量化基金带来了新形势：量化为刀俎，散户为鱼肉。

“认房不认贷”

8月30日，广州明确落地“认房不认贷”。同日，深圳也同步了新政。广深“卖一买一”的改善型需求购房者，可以降低一成首付了。以400万元的房子计算，首付将可减少40万元。除了“卖一买一”的改善型需求，都市圈的流动人口，以及长期居住在广州、深圳但在周边购房的年轻人或外来人口也将受益。



医生性别与手术效果

来自加拿大和瑞典的两项研究近期都指出，主刀医生的性别与病人的手术效果存在相关性。多伦多西奈山医院的团队分析了120万例常见手术病人的病历，从并发症、重新住院率和术后死亡率等指标来看，女医生的病人预后状况显著优于男医生的。术后90天内，男医生主治的病人出现各类术后不良事件的比例为13.9%，女医生的病人为12.5%；术后一年内，男医生的病人的死亡率比女医生的高25%。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也观察到，在12万例胆囊摘除术中，由女医生主刀的病人更少出现并发症，住院时间更短。研究者的初步分析均指出，女医生的平均手术时间比男医生长或能部分解释这种现象。

好消息



香料的妙用

过度摄入饱和脂肪、糖和盐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在近期研究中发现，在食谱中更多使用香草和香料（如大蒜粉、芥末籽、辣椒粉）可以在保持食物适口性的同时，帮助人们显著减少对营养素的摄入。



大笑疗法

欧洲心脏病学会2023年年会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笑能促进心血管功能。26名老年动脉斑块病变患者中，一半人每周看两小时喜剧节目，一半人每周看两部严肃纪录片。12周后，喜剧组患者的心脏供氧能力提高了10%。

坏消息



乳化剂的健康风险

乳化剂是常用于冰激凌、面包、蛋糕粉、沙拉酱等深度加工食品的添加剂。西班牙巴塞罗那生物调查所进行的试验表明，小鼠在孕期食用乳化剂后，其后代出现轻度代谢、认知和心理障碍的风险增加。这种负面影响在雄性后代中比雌性更显著。



不孕症治疗与中风

美国罗杰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对接受过不孕症治疗的女性的住院率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调查，结果发现，在采用过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冻卵手术的女性中，患脑出血的风险比其他女性增加近一倍，患脑梗的风险增加55%。



在北京方言中，有工作就是有“嚼谷”，丢了工作就是“饭碗砸了”。难怪中国人对比经济阶层的方式就是对比不同阶层的饮食风格……饮食语义学告诉我们，经济壁垒比生与死、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壁垒更难跨越。

——考古学家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

GPT-3 和 ChatGPT 很大的危险在于它们能够繁殖。没生命的东西也能演化。病毒没有生命，但它们能演化。事物在演化是因为它们能那样做，而文化的演化是很强大的，我们需要采取隔离措施，阻止那些能够破坏文化和民主的文化变异的传播。

——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

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对奥本海默说：“我听说你写诗就像你研究物理学那样出色。你是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要知道，在科学上，大家都尽力使人们把过去不明白的事物弄清楚，而在诗中，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范洪义，《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

唯美主义者的玫瑰屋暴露出它与家庭主妇的强迫性洁癖之间颇有关联。财富和艺术品都得来不易，值得悉心保护，避免由于人类的冒失和时间消磨造成毁损。获得审美文化的富有之人，于是成了监护者，而不是创造者。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



（插图 山羊胡）

斯宾诺莎告诫说，极好之事“少见且艰难”。为什么杰出的哲学文本应该比高等数学或者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更容易理解？这样的文本内含着一种创造过程，一种既揭示又抗拒的“诗”……哲学无疑和“诗歌”一样，有它自己的音乐，它的悲剧脉搏，它的狂喜，甚至它的笑声（如在蒙田或休谟处）。

——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思想之诗》

+/−

数字

2 亿欧元

为了阻止葡萄酒价格暴跌，法国政府将拨出 2 亿欧元以处理难以销售的葡萄酒。这批酒大约有 300 万升。意大利的葡萄酒消费量下降了 7%，法国下降了 15%，德国下降了 22%，但整个欧盟地区的葡萄酒产量却增加了 4%。

34 个

英国北部一位火车司机被迫重新录制 34 个火车站的语音播报，因为收到几十个投诉说这些站名都被读错了，包括 Redcar、Wombwell。

50 种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迈克尔·斯奈德说，目前发现人的衰老类型有四种：肾脏型、肝脏型、免疫系统型和一般代谢型。人体有 78 个器官，是不是会有 78 种衰老类型呢？存在 50 种主要的衰老类型可能并不离谱。

比喻练习

文 · 凤城小铁桃　图 · 谢驭飞



前几天读到一本书，书名是《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是川上未映子采访村上春树的访谈录，村上讲到他的写作诀窍，说基本功就两个，三板斧都不到，也就两板斧。一板斧，是对白不能平淡无奇，如果有人质问你，他的话听见了吗？不能回听见了，平淡无奇，应该回答：“我又不是聋子！”另一板斧，是要有好的比喻，例子是钱德勒的小说里的一句：“失眠之夜，和胖邮差一样罕见。”

读到这里，我心里直痒痒，作为一个有志于写小说的人，一定要学起来。首先是对白，必须得有人物、场景，对白才能成立，不好操作。比喻就灵活多了，可以随时随地练习，于是，之后的几天，我就像贾岛一样，苦吟推敲起来。

一天早上推开窗，一眼看见对面小区的杂树林里有一棵枯树，于是有了一个比喻：“葱绿的杂木林边缘，立着一株枯木，苍白而醒目，好像人群中突然混入一具站立的骷髅。”我得意了两天，第三天那株“枯木”开满了一树的红花，这才知道那是一株木棉，活得好好的。

一次揉眼睛，不小心睫毛掉进眼睛里，刺痛难忍，跑去卫生间对着镜子扒眼睛，又是揉，又是洗，终于弄出来了，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睫毛掉进眼睛里，像一只出生在眼球里的蚊子，还难产了，发出一阵阵刺痛。”果然苦难可以滋养文学。

我苦练比喻的时间里，叶子也兴奋不已，围着我跳，仿佛一只围观猫吵架的狗子，想要加入，又不知道从何处下嘴（注意这也是一个比喻）。

从市场上买了丑橘，两人正一起吃橘子，叶子突然指着满是麻坑的橘皮，说：“比喻来了，这片橘皮，就像你的脸皮一样。”我摇头道：“不错，很生动，不过还未尽善，可以补充一下：丑橘的皮，就像圣诞老人饱经风霜的脸。”叶子不服，问何以见得是圣诞老人的？我答：“没有被圣诞夜大雪纷飞的凛冽高空寒风吹过，不足以长出这么粗糙的脸皮。”

看自己的手，“手上青筋遍布，如愤怒的蚯蚓汇集，又如一丛丛肉的闪电”。

看纪录片里有天鹅，“夜幕下的湖里，几只天鹅在戏水，张开翅膀，伸长脖颈，仿佛是一只只白天的鼻子，好奇地嗅探黑夜”。叶子听了大惊小怪，说你有做诗人的天赋呢。我假装不在意，心里却小小地得意。

几天锻炼下来，还是有一点小小感悟的，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太近了，读者一眼就看到底，不行；太远了，读者压根看不懂，也不行。本体和喻体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怎样找到这个通道？完全没有道理可讲，全凭感觉。就我最近的阅读来看，张爱玲、布劳提根二人，可谓比喻圣手。当然很多优秀的诗人那里，也不乏好的比喻。

从前老听说“生活不是没有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这句大俗话。现在我终于领悟，生活中的美，不是自动出现的，不会自动跑到你的眼前，而是要自己主动去发现，就是所谓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比喻。当然，也许摄影啊、绘画啊，都有类似功能，我不懂，就不提了。

晚上叶子睡觉前，跟我斗比喻，之前她老是输给我。我说：“困意，是金色黏稠的蜂蜜。”叶子已经上了床，戴好了眼罩，迷迷糊糊地说：“困意，是脑子里紧紧绑着的鞋带，突然被三下五除二解开了，放松了……”我默默比较了一下，终于认输，再看叶子，已经呼呼睡着了。

我走出卧室，独自来到客厅，感到有点饿，于是打开冰箱，看见几个用来腌渍咸柠的新鲜柠檬，一个钱德勒式的比喻突然进入脑海：“失眠的夜晚，和剥了皮的柠檬一样罕见。”

回家的诱惑

文 · 筱诗　图 · 谢驭飞



第一次发现我喜欢闻返潮的味道，是到外地上学以后。放假回家，到楼下拉开电子门，一股反潮的气浪扑鼻而来。味道是从地下室飘上来的，自从搬到这里，我进门时都会屏一点气，不敢吸到头儿，要不味儿太冲了。这一闻，就是20年。当我跟这股味道久别重逢，竟没觉得有一点难闻，还猛吸了一口，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我到家了。

一阵特殊的气味、一个嗅觉的诱因，竟然可以唤起如此强烈的情绪，仿佛突然把我拉回到某个特定时空。英国神经科主任医师盖伊·勒施齐纳在《五感之谜》一书中，结合从医经历讲述各种感官的奥秘。在写到嗅觉时，他想起了25年前闻过的一股让他终生难忘的味道——那时他还是个医学实习生，一次跟着外科主治医师查房时，他闻到病房里弥漫着一股臭味。他说："直到今天，它还充塞着我的鼻孔，我也还清楚地记得胃里突然升起的那股恐惧和厌恶之感。我还能清楚地看见那可怜妇女的表情：她茫然地望着我们的面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们是谁、又围拢在这里做些什么。她那张脸，那股恶臭，还有种种情绪，一样样都铭刻进了我的记忆，并没有被时间冲淡。""死去的回忆突然开始攻击我"，网友们玩的梗看来还有点科学道理。

一种味道为什么能突然唤醒人们记忆中早已忘怀的强烈瞬间？盖伊解释道，我们脑内参与嗅觉和情绪加工的区域，在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比其他感觉，气味更能唤起情绪状态及相关事件，也就是说，嗅觉能勾起我们记忆中情绪更为浓烈的往事，比如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只要一闻到血或汽油的气味，或者像越战老兵那样闻到凝固汽油弹的气味，就可能引发极为夸张的、关联着可怕记忆的恐惧反应。气味易于触发记忆，这一点可能还有着深远意义，"研究发现，由气味引起的正向情绪记忆，对免疫系统和炎症都很有裨益，它还能超出嗅觉区域改变脑部活动"。

我们通过气味感知到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幻象，是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在为空气中的化学物质赋予意义。比如我喜欢的返潮味儿，唤起的就是对家的记忆，熟悉的感觉让我的情绪得到舒缓。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在其他地方，比如公司地下车库闻到的味道，虽然只是相似，但也足够聊以慰藉。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复古韵味

Gucci Allegoria 系列耳饰采用两颗老式欧洲型切割钻石，每颗重量超过 12 克拉，周围环绕花朵形切割的欧泊石，另有长阶梯形和佩斯利涡旋花纹钻石令整体设计缤纷耀目。





花开有时

梵克雅宝 Lady Arpels Heures Florales 腕表表盘上的 12 朵立体花蕾以诗意的开合方式显示时间，机芯内的模块通过 166 枚零件相互作用，每 60 分钟花蕾徐徐闭合，迎接另一朵娇花缓缓绽放。

书林漫旅

万宝龙风尚 3.0 系列 M 扣信封包的 M Lock 4810 锁扣将登山运动锁扣的功能性融入设计，兼具美学与稳固，包豪斯风格压纹印花图案贯穿松石蓝色皮质包身。





创意音箱

Lyric 扬声器的机身外壳和待机屏幕都设有代表性的花卉元素，两路低音反射扬声器再现宽广的声音范围，箱体的亚克力面板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过度的失真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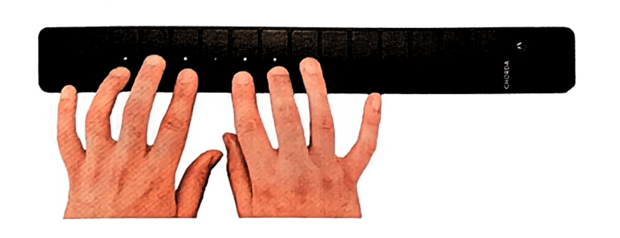


混合风味

DUOBO 采用二次分层混合技术，能够在一次冲泡中结合两种不同的胶囊咖啡，显示屏和配套 App 支持用户进行咖啡的预约、冲泡、位置调整等步骤。

多功能乐器

Chorda 结合了智能合成器、Looper 和 MIDI 控制器，有 12 个触摸感应垫，采用了灵敏的电容触摸传感器，能够捕捉到最轻微的动作，根据速度和力度来表达每个音符，同样适用于音乐启发和音乐教育。



街头灵感

Christian Louboutin 全新 ASTROLOUBI 运动鞋将篮球鞋与滑板鞋的元素相融合，饰边细节搭配几何感线条和铆钉元素，针织鞋舌、柔软坚固的鞋面结构以及轻质鞋底让其比同类全皮革款式轻 20%。





天然羽毛

Piaget Extravagant 腕表在不对称表耳上镶嵌渐变色彩的祖母绿和蓝色蓝宝石，凸显蛋白石表盘的火彩，同色调的天然羽毛可以取下来变成一对耳环。

微晶玻璃

Thomas Sabo Stone 项链的焦点是一颗形似祖母绿的吊坠，实际使用了八角形切割的翠绿色微晶玻璃，四爪镶嵌方式更加凸显吊坠在光线照射下的色彩。



旋褶手柄

橄榄绿色小羊皮制作的 JW Anderson Twister 手提包，翻盖装饰凹面压花标志。宽阔的皮条扭转之后，就变成了褶皱样式的手柄。



屋顶烟囱

Matière Grise Multitude 台灯的设计借鉴了巴黎屋顶烟囱的重复轮廓，钢管底座结合喷砂玻璃管扩散器，水平和垂直圆管道的互锁形成微型建筑景观。





平衡比例

Hay Palissade 边桌强调图形化轮廓与平衡比例，锥形底座用混凝土加重，与钢管无缝对接后支撑起厚度只有 4 毫米的钢制桌面。



四方形椅腿

孔雀绿色饰面的 Toogood Fudge 靠背椅，粗壮的四方形椅腿表现出俏皮的厚实感。椅子的制作始于手工雕刻的木材，再用耐用玻璃纤维铸造。



跟着人类学家重回老家

为何从远方回到家乡
如何重建家族联系
现代与传统怎样相遇

荷珠村郑氏祠堂祭祖仪式后，族人们在振兴宫举办宴席



（蔡小川 摄）

郑振满的学生们在福州永泰县调查、搜集民间文献

文 · 吴琪

学者费孝通曾经用“乡土中国”一词，概括了中国基于传统社会而人口较少流动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变化，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当前城镇人口为9.02亿人，其中流动人口3.7亿多人。我们早已由人们固守乡土的国度，变为了“迁徙中国”。

大量在城市里建立新生活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远离故乡的“无根之人”。我们离开家乡，去到远方，似乎曾是“人往高处走”的命运馈赠。但是当大量原子化的个体在城市里飘浮，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如何在公共空间里重建公共生活，如何在回望中发现“老家”的价值，这些命题重新变得重要。“老家”的传统社会，曾在某些时刻被视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但是随着人们重新渴望“关系”，老家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又在人文精神层面，浮现出了新的价值。

这期封面故事，我们跟着几位人类学家重回老家，正是试图借助他们的目光，看到现代城市与传统乡土社会在中国产生的奇妙碰撞。巧合的是，这几位人类学家都是来自乡土习俗丰厚的福建。但是我们与他们一起试图探寻的，如何在当下重新发现老家的价值，如何重新看到“穷亲戚”的价值，是如何在现代性与传统中找到新的平衡，这些问题则是超越地方性的。这一次我们先随这几位人类学家去到福建，既是看他们的老家，也是让我们对自己作为现代人的处境，多一重感受。

重建连接：何不从“过度理性”回归“人之常情”？

——专访人类学家王铭铭

文 · 吴琪



人类学家王铭铭

人类学家王铭铭说他有一种很传统的信仰，人存在的本质是社会性，不能真正脱离他者而独处。在传统社会里，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社区”练习，沉浸在人之常情里，习得人与人、与物甚至与神的相处方式。现代性将人从地方性经验里“解放”了出来，但过度的理性，或许正在妨碍我们建立真正的连接。

是否该规避亲戚网络？

三联生活周刊：王老师是福建泉州人，泉州也是你作为人类学家的重要田野地之一。今天在一些年轻人中间流行“断亲”的说法，大家会抱怨父母辈看重的亲戚圈子，觉得亲戚们带着非常强烈的传统价值观，向年轻人催婚催育，这种压力让人很不舒适，所以要“断亲”。你怎么看待这种新现象？

王铭铭：说起来这现象也不算太新，不算太奇怪。人在年轻的时候，想与老家保持距离，规避亲情给我们施加的压力，这过去也常见。上大学之前，我在泉州生活的时候，我就很想离开那里。那时候泉州城内的人口，有一二十万吧。在自己熟悉的街区，街头巷尾人人都互相认识，我就觉得很没意思，向往外边的世界。我到厦门读本科和研究生，然后又去伦敦读博士，好像离家越远越好，后来我到北京工作。所以厦门、伦敦和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家乡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确实会给人压力。我年轻时回泉州的次数比较少，那也是在躲避压力吧。我从伦敦留学后回老家做研究，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家里人会说：你看你去国外留个学，也没挣到钱，对象也没好好找一个。单身时家人会催婚，结婚后家人催着生孩子，这些我也经历过的。

亲戚网络和传统价值观，确实在某些方面是给人压力的。不过“断亲”又好像太绝对，我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想起来我的经验是，随着年龄变大，人会有不同感受，压力会慢慢变成责任心的一部分。

自己步入中年，父母就进入老年，身体远不如前，我们便感到回乡看望老人、处理老人的事是自己的一份一般叫作“孝心”的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人在社区中的家族、亲属关系，是人类学家研究的重要维度。但是在过去一些年里，很多人把家族、仪式看成是“落后”的事物。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多人离开农业村庄到城市里，从事着现代化的行业。他们会觉得老家的那套亲属关系、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自己实际上没关系了。

王铭铭：我们确实出现了一种对现代性的“移情别恋”。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急于现代化，把家族、仪式看成是“落后”的表现，看成是我们依赖的这个现代性的对立面。100 多年来，这种“现代性爱情”导致了不少遗憾。我曾经生活的家乡，家族、亲属关系曾是社区和社会的主要单位，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些曾被当成“落后文化”，遭到一系列的斗争。

从事你所说的“现代化的行业”的人，对家乡的关系系统和地方认同的疏离感，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

除了继嗣，在传统村庄里，婚姻也是超个人、超家庭的，是社会借以界定人文关系的手段。婚礼起到了达成家族之间社会人文资源互通的作用。村落里有自己的仪式周期，每一个节庆又有不同的层次，一个人是在社区里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训练中长大的。随着现代性的来临，我们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这不仅仅是中国出现的变化，而是在各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农业生产向“国民经济”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取代了传统的社区训练。标准化知识进入社区，会不自觉地排挤传统社区文化。西方人类学家比较早就对这些问题开始了研究。

具体到中国的变化，民国时期政府对“旧俗”的禁止，也是旨在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采用的方式包括“现代性”和“科学”的推广、取缔私塾等，因为私塾教授的内容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公民的需要，用建立新型的中小学来取而代之。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也经历了相应的重要变化。

但现代“大众社会”是否就在中国完全取代了乡土社区呢？显然并没有。虽然在各种变动中，我们村落内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改变，本来以年龄级序、家族内聚为原则的社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平等的生产者和公民关系，但是传统一直作为一种有坚韧生命力的力量，在与新的变动试图达成平衡。所以我觉得社区和社会的旧形态仍可能与“离家”的人保持着关联。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老家，用新的眼光看待各种人际关系和乡土习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正在经历现代性的人，受到传统的震动？

王铭铭：去大城市打拼的人，进入了某种“陌生人社会”，人和人之前互不相识。但是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传统的家族继嗣制度和通婚制度建造了人们之间关系的基础，形成了社会互助的圈子，之所以大家愿意互助，是由于社会圈子的成员，多能互相承认其共同的“社会历史经验”。也就是说，同一个圈子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以前”即有基础。共同的社会经历创造了村民之间关系的机制，然后这种机制很容易转化为“兄弟情谊”。

现代大城市与乡土老家似乎是两种对立的“理想型”。但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原因之一近在眼前，我们不能把现代大城市文化等同于“科学理性”，并将之与乡土老家的“农民的迷信”对立看待。另


2023 年 2 月，王铭铭重访泉州市安溪县





外，如一些人类学研究表明的，在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和社会形式中，也存在所谓的“企业家理念”“工业主义精神”和商业化潜力，后者常常被界定为非乡土、反乡土的现代性，其实至少在闽南这个区域，它们却与传统有关，甚至是它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闽南农村做过长期田野调查，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在8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试验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被称为“闽南金三角”。在这个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导致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反而为这些地方的传统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一大批民间的庙宇和祠堂被修复，传统仪式又活跃起来。文化遗产得到重视后，不少地方把传统文化和旅游发展结合起来，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存在和扩展空间，它变得四处可见。现在传统的复兴似乎是极其显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与现代完全相同。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们在家乡生活的经验是地方性的，文化认同也是地域性的，可是现代化的生活提供了很多超地方性的价值观。这些变化确实会对个体产生不同的冲击。现在我们把文化和旅游结合得太紧密，这也应引起警惕，我相信，保护文化的最好方式肯定不是把文化当产业来发展，文化产业这类事容易导致生活世界的碎片化。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家乡的人情世故，当老家人催婚催育时，往往让人很无奈。但是另一面，一个人在传统的人情关系网里又容易感觉到安心、温暖。这几年一些年轻人对民间仪式的兴趣大增，各地也在复兴赛龙舟这些庆典，你对此怎么看呢？

王铭铭：一个人的生活感受，既受“大传统”的影响，也受“小传统”的影响。“大传统”指以



（秦小川 摄）

左图：在泉州石狮龟湖大普的普渡仪式上，村民抬着神轿舞蹈

右图：石狮市苏厝纱塔旁，戏班演员准备上台表演

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所谓“小传统”则指的是一般民众的文化，尤其是乡民文化。“大传统”常把人类的存在割裂于其他存在之外。“小传统”有很浓厚的关系主义色彩，它拒绝分类，认为人无法摆脱其他存在而存在，强调灵验观、万物有灵论等。

一个人如果不被“小传统”包裹，而是直接面对“大传统”，他很不容易感受到快乐。

当年我在一个闽南村庄做调查时，发现村民爱用“人缘”这个词来对一个人的交往做评价。在我这个学者看来，村民们在实现社会互助时，是一个家户或个人消费社会关系资源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社会关系资源实现供求互动的过程。不同家户拥有不同数量的社会关系资源。当村民用“人缘”来解释的时候，似乎是说人们生来就有处世为人的不同能力。这种民间意识形态，它的作用在于从“命”“运”“缘分”等观念阐释并支持社会关系资源的等级差序。

一个人在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里，确实容易感到安心。因为乡土社会有自己的社区契约和教化方式，比如一个人名字里体现的辈分，使得其他族人见到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上下左右的关系。村民间的社会关系和互助，也包含一定“道德经济”因素。在不平等的状态出现时，社区会产生内部的调整机制，以一定的仪式礼俗规范人际关系。比如一个村子要重新修葺村庙，经济条件好的人，就得比一般村民捐资多得多。我们可以理解为，“上等人”需要出钱买“面子”。这实际上是在不平等的人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平等的交换关系。

民间仪式是连接人与“神权”的途径。民间权威在乡间的存在，也充分反映了在变迁的社区中，人们寻求历史的稳定感和命运的解说的心态。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里，仪式被看成落后的、应该取缔的。但多数学者越来越反对把中国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看成没有体系的“迷信”或“原始巫术”的残余，而主张把这些现象界定为一种社会生活系统。比如村神的存在，他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现代的心理医生，但又不完全一样。他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或者说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个人的不安。

现在年轻人的困扰，有很大一部分与现代性有关。我所在的人类学领域里，也早已有智者指出，在“现代”来临之前，并不存在独立于“非己”之外的“己”，也并不存在独立于“非我”之外的“我”。所谓“现代”，可以理解为边界清晰的“自我”的诞生。我们身处现代性的冲击当中，个体对于“自我”与他人、人与物、人与神的传统关系，都在变化当中。

对“老家”的沉浸与抽离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它一下子变为非常大众化的网红旅游城市，你看到的家乡变化大吗？

王铭铭：泉州现在的名声是更大了，好处是那些遗产点和传统的庙、祠堂、书院、老街等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我也希望跟这些场所关联着的仪式特别是它们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不要丧失，我希望我们不要让文化拜物教化，别让文化遗产变为“无魂”的空壳。

80年代初我从泉州到厦门大学读书时，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地方的人，去到大城市了。那时候羡慕厦门的洋气。当我后来把家乡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我才更能从地方、中国与世界的不同视野来定位和描摹泉州城。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迅速发展，商贸繁盛，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泉州有复兴宋元繁荣的努力和迹象了。我看它的发展历程体现的是一种传统找寻自身的现代未来的努力。这蛮重要的。如果没有传统，泉州这个地方的国际化是无法展开的。

我可能太爱学问，我对家乡泉州的“爱情”往往与理论解释有关。而家乡的一些朋友则是典型的“家乡宝”。他们特别热爱泉州，离不开家乡，那里的自然环境、饮食口味、人情世故，使他们生活得十分安逸。泉州古城确实保护得好，这在全国都很少见，现在泉州变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知名度很高的城市，我的“家乡宝”朋友们更有自豪感了。

三联生活周刊：不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自己的故乡有深厚的情感，故乡给了他们不可替代的生活体验，也给他们提供了独特的学术经验。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是不是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故乡给神圣化？

王铭铭：把家乡想象成一个神圣的完美秩序，恐怕是不现实的。秩序如果要“完美”，那恐怕要在死寂的封闭空间里才会实现，历史现实里的空间往往是活的。以泉州为例，这正是在秩序和“混沌”之间摇摆的地方，它的历史自身是地方自立和开放的辩证法，这为研究者超越地方与世界、特殊与普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场。泉州有众多现象在向我们表明，近代以来的所谓“世界”、所谓“普遍”，都不过是世界上一个特定角落的特殊文明形态，它们也鼓励我们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展望地方性的世界性未来、特殊性的普遍性前景、传统自身的现代未来。我对于老家的含义是这么看的。我既有沉浸于其中的部分，也有抽离出来的部分，我觉得我的这种心态符合家乡自身的特质。



（谢明飞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4 月 1 日，福建泉州西街熙熙攘攘，游客身穿蟳埔女服饰、头戴簪花围头饰在街头漫步

泉州很能勾连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它有很强的多元性、复合性，它摇摆于“夷夏”之间，时而得到繁荣的机会，时而沦为军事化的边疆。“大传统”起落无常，而“小传统”悠久且绵延。历史上的基于“治乱”的泉州民间宗教 / 文化，表现出“生生状”和“条理状”的组合性格。

“生生状”的民间生态是非常可贵的，在“他乡”也有。比如我住在北京五道口这块，我过去很喜欢这里。为什么呢？过去这里有街头歌手卖唱，有小贩烤串做夜宵，有老人家推着一板车的陶瓷制品来卖，很有生活气息。我过去也非常喜欢去北京的花鸟鱼虫市场，看看动物看看花草，买点茶叶。那些地方虽是北京的，但卖茶叶和茶具的基本是我们福建人，跟老乡一聊天，就熟络起来了。生活的趣味就是由这些构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条理状”而抹去这样的“生生状”，处处建设整齐的大楼，把花鸟鱼虫市场搬到地下，使街头小贩不见踪影，那热闹蓬勃的气息就没了，可贵的民间生态也就受到了损害，相当可惜。

这几年我回泉州的时候，看到不少穿着汉服的年轻人，晚上在西街上逛来逛去，我挺高兴，觉得西街很繁盛，有“生生状”。但是朋友告诉我说：王老师，这实际上是因为泉州可供年轻人玩的地方很有限，大家没地方去，所以才来“打卡”。我想想也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博物馆多，美术馆、剧院也多，文化的公共空间发达。年轻人到泉州也会去逛寺庙、听听当地戏剧，但公共空间还不算多。所以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生活的空间，但不要失去了民间社会的“生生状”，那个东西是最吸引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也开始看重“社区感”，希望有更多公共空间，与人建立连接。大家爱去泉州旅游，也是羡慕这里深厚的历史感，寺庙、祠堂这样的传统公共空间仍然活跃着。不知道一两百年前生活在泉州的人，他们的公共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是由哪些公共空间来满足呢？

王铭铭：倒推 100 年，就是上世纪 20 年代。那时我们的青年学生和政治精英已受现代性思想的影响，正在琢磨着要把泉州的古城给拆掉重建，

实现现代化。以为城墙必定阻碍交通和商业的观点，从泉州的整体历史来看是荒谬的，因为泉州宋元繁荣时并不是一座无墙之城，但民国时人们还是坚信，城墙这种旧的东西在妨碍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当时的政府和学生都很痛恨“封建迷信”，也试图革新乡风民俗。

要承认的是，即使有这些，那个时候能构成的破坏实际是有限的，我们看到传统和现代还是同时存在。

当时的社会生态仍是丰富多元的，泉州最典型的公共活动就是仪式。很多老百姓还是去小庙里活动。一年四季有很多节庆，每逢初二和十六都要祭祀土地公，祭祀完了就要聚餐。一个庙里往往有四五个甚至数十个神，每个神的诞辰不一样，各种活动就很热闹，这些活动也调集起来民间所有的文艺形式。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公共生活的空间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生生状”的社会存在时，个人的幸福感应该是比较强的。

在这些传统仪式里，也有械斗，实际上那是小的共同体之间的一种带引号的“战争”，伤人并不重，可以说与青壮年展现自己力量有关，可以理解为一种表演，但是也被当时的政府禁了。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年轻人，称自己为“社畜”“公司人”，好像他们变成了商业运行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我们习惯用商业规则和法治思维来“解决”问题，但是在人的感性层面，那种孤独感和虚无感似乎更深了。

王铭铭：这与所谓“理性”有关，其中有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理性之根，也有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之源，它所鼓励的是对“逻辑”的信仰，所反对的是“迷信”。“理性主义”的出现，催生了某种全球化的“伦理”。这种“伦理”过分否认传统社区认同和关系主义，容易使人们采取纯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大多与幸福没有关系，而它对传统的否定会带来各种失衡。

一个稳固的社会，需要坚实的中间层。在传统社会里，除了正式权威之外，还会有民间权威的存在。民间权威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不可缺失的中介角色，他们也是历史与现代的中介。今天在有些村落里，还有类似“长老”“头人”发挥着作用，比如要重建祖祠了，村里有威望的人会形成一个筹备委员会。他们使得人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还能感受到一定的历史稳定感，人们对自己的命运，也能在传统的体系里获得一个解释。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能够给予的。

中国人的厉害之处也在于，即使时代规定了我们大的“议题”，大家也总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比如一方面泉州人在现代经济生活里发展得很好，当老板、开工厂；另一面，他们对家族制度、对神鬼祖先的祭祀，还是很积极。在他们很多人看来，传统甚至是现代化的保障。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是一个相当珍贵的东西。

人如果割裂，就无快乐可言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过往三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使得很多人离开家乡，在更大的城市定居下来。我们“60后”“70后”在老家还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但是像我的孩子这一代人，她虽然法律意义上是北京人，在北京出生长大，但她在北京是没有亲戚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要面对不同于祖祖辈辈的一种人际交往状况。

王铭铭：这倒是的。我儿子也是法律—行政意义上的北京人，他在北京长大，泉州对他来说，更多是户口本上的祖籍地。我儿子在北京也没有亲戚，他有交往密切的同学，还有关心他的老师，这些构成了他的人际交往圈子。这确实也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状况，传统的亲属关系离他们很远。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不少学者，在很早之前就对“现代化”“现代性”提出警惕和反思，比如：现代化带来的人的理性化，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商品化使得法律成为全民准则，劳动力成为“工作区位”的附属品，等等。这两年年轻人流行读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是某种程度上对现代性的反思。

王铭铭：100多年来对现代文化的宣扬，很容易使我们把自己视为“落后分子”。民间文化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也曾经受到很大冲击。从西方过来的现代性，其实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不要只是陷入对现代性的向往，而忘了现代性潜在的种种问题。我主张不要过于“崇新弃旧”，一味求新，而要从中找到一种平衡。以人文知识分子

来说，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太把“理性”当回事，太过于强调理性了，很少会注意到，非理性也是作为想象的理性之源的西方的一部分。就像我提到的，“生生状”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要把“生生状”都舍弃了，以一种纯洁主义的态度来想象过去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很少在传统社会的网络中面对面去习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了。我们变成了许多个独立的个体，不再依靠交流获取知识。在发达到僵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有的隐私欲，会出现在一些年轻人身上。一方面互联网上社交媒体很发达，使得我们好像都没有隐私。可是另一方面，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与人的界限划分得非常鲜明，表现出比较强的自我保护的心态。这和传统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很不一样。一个人如果在私生活里也显得很理性，生活的趣味就少太多了。我们现在似乎出现了过早和过度追求理性化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有一种很传统的信仰——人存在的本质是社会性。人不能脱离他者而完全独处。或者是因为我是福建人，一直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传统里吧？我认为人和人的割裂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交换和融合一直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另外，我很喜欢一首改革开放初期的歌——《跟着感觉走》，现在这样的歌不多了，似乎人们都在寻求攻略型的知识、技能，相当无聊。

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归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也就是“人情”，是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情分。在传统的人情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天生就负有义务。当现代化来临后，社区内部的人不断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但是作为个体，我们如果直接面对庞大的全民性规范，是不容易感到幸福的。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多层面的丰富性，来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人之常情”。

三联生活周刊：王老师你近年来的研究，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关注比较多。你也越来越强调要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看到更广义的“人文生境”。这种态度除了学术上的意义外，对我们一般人看待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是不是也有启发意义？

王铭铭：我们有可能已经陷入某种思想危机。“完美秩序”存在的条件往往是沉寂乃至死亡。要制造秩序的景观，社会科学家往往需要将活人化成“死证据”，而矛盾的是，他们多是研究活人的。我提醒自己，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是生动活泼的，又是与众多其他存在者关联互动着的，就像我在西南看到的“小社会与大自然”一样。这些“对象”的所谓“生活”自身表明，“变”或是古人说的“易”是根本，关系是根本。

人的生活是在“环境”里展开的，它必然内在地容有“环境”之整体，比如古人所谓的“天”。在西南地区考察，我更加意识到自然生存环境的广阔性和重要性，我形成一种看法：最好不要将生活世界看作“纯人性的”，而是由人、神、物这三类“存在体”共同构成的。他们各自存在转化为“其他 / 它”的可能，比如人有成圣的可能，神有在物中得到显现的可能，人有化成物的可能，他们在相互关系中，是共存于生活世界的。

这对一般人看待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是不是也有启发？这我不了解，但我相信它对于我们的时代蛮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福建老家传统乡俗仍然很深厚，但是有些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老家没有什么显赫的历史或传统，在文化上很贫瘠。如果需要你提供一些方法论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去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老家？

王铭铭：不要轻易说一个地方的历史很贫瘠，传统很单薄，未必是这样。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博士生去山西的某个村子调研，这个村子的庙不如广东、福建这么漂亮发达，但是每到晚上，村民就开始讲上古神话传说和春秋战国故事。像我看到的福建这边，人们一般讲的是宋明传奇这类，很少能非常清晰地讲述夏商周三代的故事。所以这个山西村子之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觉得村民这种讲述的传统，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我一度认为，北方农村的民间公共生活不够发达。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能晓得，这种看法也不准确。比如据一个朋友说，东北人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都可以在炕上进行，除了家事，二人转也能在炕上表演，这似乎意味着东北人没有社会。其实不然，我们只能说，他们不像南方人那种，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划分得那么清楚。这些年我研究的西南民族地区的村子，和福建汉人的村子，又不太一样。

郑振满：回望老家的仪式

记者·刘畅 摄影·蔡小川

68 岁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老家在莆田仙游的枫亭镇，这里以仪式传统深厚著称。家乡既给了他个人生活的充足体验，也是他研究的重要对象。郑振满从家乡的宫庙开始，持续了 40 多年对宗族、仪式的研究。这 40 多年刚好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剧烈的阶段，在这片土地上，也展开了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对撞。一方面，传统仪式表现出了让人惊诧的“变形”能力，以适应族人们离土离乡的现实；另一方面，仪式也在冥冥之中感召着那些曾经看淡家乡的年轻人，他们穿梭在现实与故土之间，试图寻找内心的依傍。



在塔斗山玉皇殿门口，郑振满（中间）与玉皇殿董事会致意



回乡看传统

对于一个外地人，前往莆田仙游县枫亭镇的麟山宫的难度，并不比前往厦门的厦门大学大。只要坐高铁，仙游站就在枫亭镇里，麟山宫是镇上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车程八分钟。

十余年前，我曾在厦门上学，看见麟山宫，就勾起那时的回忆。当时路过郊野，除了颜色鲜艳、飞檐飘逸的各种庙宇，总会碰见红白喜事的锣鼓声，甚至遇上打着幡的出殡队伍浩浩荡荡，公交车也不得不为他们让路。麟山宫比那些乡间小庙气派得多，宫前有一片可以媲美学校操场的广场，宫殿式的飞檐上，飘逸的飞龙相对，三座殿前立有一对辉绿岩石雕龙柱，两侧建有保和楼、戏台、鼓楼。甚至我站在宫前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殿门都被栅栏遮挡，侧面的小门似掩非掩。

8 月底，我在此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见面。68 岁的他一头白发，皮肤黝黑，身材颀长，穿一身休闲装，如今“福建整个阴历七月都是中元节，中元祭鬼，祖先也是鬼，于是祭祖、游神、普渡的仪式遍布闽地”，郑振满正开启他的暑期调研的模式。他在学界有“找庙看碑”的名号，习惯在福建的城市、村落里找庙、看碑，到老乡家里扫描民间文书。在契约文书、族谱、账簿、诉状，甚至宗教科仪本中，描绘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通过“追踪”他们生活的变动，揭示福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的发展脉络。



左图：郑氏祠堂里的祭祖仪式中，道士在做仪式

右图：郑振满（左三）在麟山宫向大家讲解当年他在石碑上的发现

约在麟山宫，是因为这里既属于他的老家，又曾是他小学的所在地，还是他的学术起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陪美国学者丁荷生到莆田考察，他提出要参观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我们到麟山宫转了一圈，意外在宫外水沟边发现了这座石碑的碎块。我发现上面有自己的祖先捐款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关注。”郑振满首先带我来到麟山宫内一座镶在墙里的石碑面前，那就是他开启自己学术兴趣的钥匙。

像他的一口“地瓜腔”，会把“碑刻”念成“白客”，从此他的学术研究与他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通过在村里调查，郑振满发现保和堂是在道光年间应对当地大规模械斗而形成的民间社团。晚清民国时，为争夺灌溉农田的水源等公共资源，农村之间形成超越村界的“乌旗”和“白旗”两派组织，彼此斗争。保和堂形成之初，包括周边地区的六个村落，曾经与附近的大姓连年械斗，最后经过调解，划定了各自的地界。此后，陆续有不少村落加入了保和堂，最终形成了声名显赫的“三十六村”集团。麟山宫则是保和堂成立60年后建立的，是用宗教和仪式，将已经形成的权力关系仪式化。此后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间，他每年暑假都在莆田做调研，和丁荷生走遍了1500个村、2800多个庙，揭开了当地的仪式联盟，勾勒出当年“乌白旗”的势力地图。

如今麟山宫虽不是郑振满当年上学时的模样，却是它更应该成为的样子。麟山宫几乎每十年就会扩张一次，殿外气派，殿内也今非昔比，殿内曾经被毁掉的杨公太师、马公太师、铁公太师神像早已修复，两侧的巨型壁画也恢复如新，正殿旁还有当年大械斗中殉难者的神主牌。在保和楼的办公室里，有监控摄像头的后台，实时监测宫里每个角落的情况。历史在沿着传统的轨道飞驰。

但当真如此简单吗？当地早已没有械斗，枫亭镇早已城镇化，除了高铁，省道、国道纵横。即便没有通体玻璃的摩天大楼，也已高楼林立。

一方面作为蔡襄故里，被当作风景名胜，被大力开发，一方面镇里有工业区和开发区，其中既有家具、鞋服等莆田的传统产业，也有轮胎、玻璃之类的制造业大厂。人们不再生活于农耕社会的乡族共同体之中。

而我们见到如今麟山宫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古稀之年的退休老人，他们在村里有威望，却并非说一不二的领导人物。在当地，如果年轻人不出外闯荡，就会被骂“没出息”。那么，曾经的仪式传统和乡村组织在当今以何种形态存在？它们能否为后代唤起老家的记忆？带着这些问题，我随郑振满在他的家乡探索。

重教育的沿海乡村

郑振满带我来到枫亭镇以往的中心塔斗山，枫亭镇由此分为斗西、斗北、斗南三大区域，从这里能见证枫亭历史上发展的两个方向。山间在古代有会心书院，蔡襄曾在此求学，朱熹曾在此讲学。当地人尤善科举，比如宋代蔡氏一门就有进士 23 人，自宋至清枫亭登进士第达 127 人。山顶则从宋代就立起一座航标塔，枫亭镇有沧溪和枫溪汇入湄洲湾，形成一个海港，古称“连江里”，出入贸易的船只靠岸时，都要靠航标塔辨认方向。“1940 年代末，枫亭镇就有 26 种同业公会。其中糖、桂元、木、竹篾、石灰等行业，主要经营本地土产的外销业务；肥料、百货、粮食、鱼、布、鞋、京果、国药、图书、纸等行业，主要经营外地商品的内销业务。这种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使枫亭成为闽中地区的主要商品集散中心之一。”

而航标塔下、塔斗山东北方，就是郑振满的家乡荷珠村，那里距离塔斗山不到两公里，恰是沧溪的入海口。湄洲湾沿岸的物资都要经过那里的码头运送出去，古代码头边停泊可以载重数千担的海船，商业相当发达。郑振满家祖上就是开鱼行的，经营当地很有名的“泰兴号”，做沿海岛屿和台湾的生意。

如今塔斗山修成公园，上面有一座玉皇殿，山间的文昌阁、书院均在原址上重建，航标塔也单纯成为古迹，沿海建设的路桥阻塞航道，家乡的港口日益衰落。而在郑振满的记忆里，他儿时就在海滩捉鱼、摸虾、挖蛤蜊。涨潮的时候，有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运来各种各样的海产品。

在青少年时代，郑振满也参与过码头的一些“进出口”业务。比如从仙游山区或枫亭市场收购柴草，运回码头，转卖给来自各地的渔船，“我父亲早逝，留下的唯一



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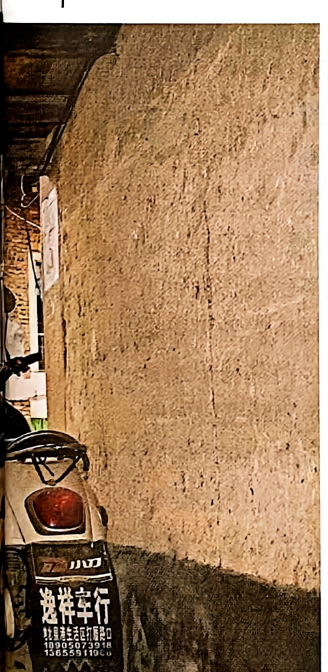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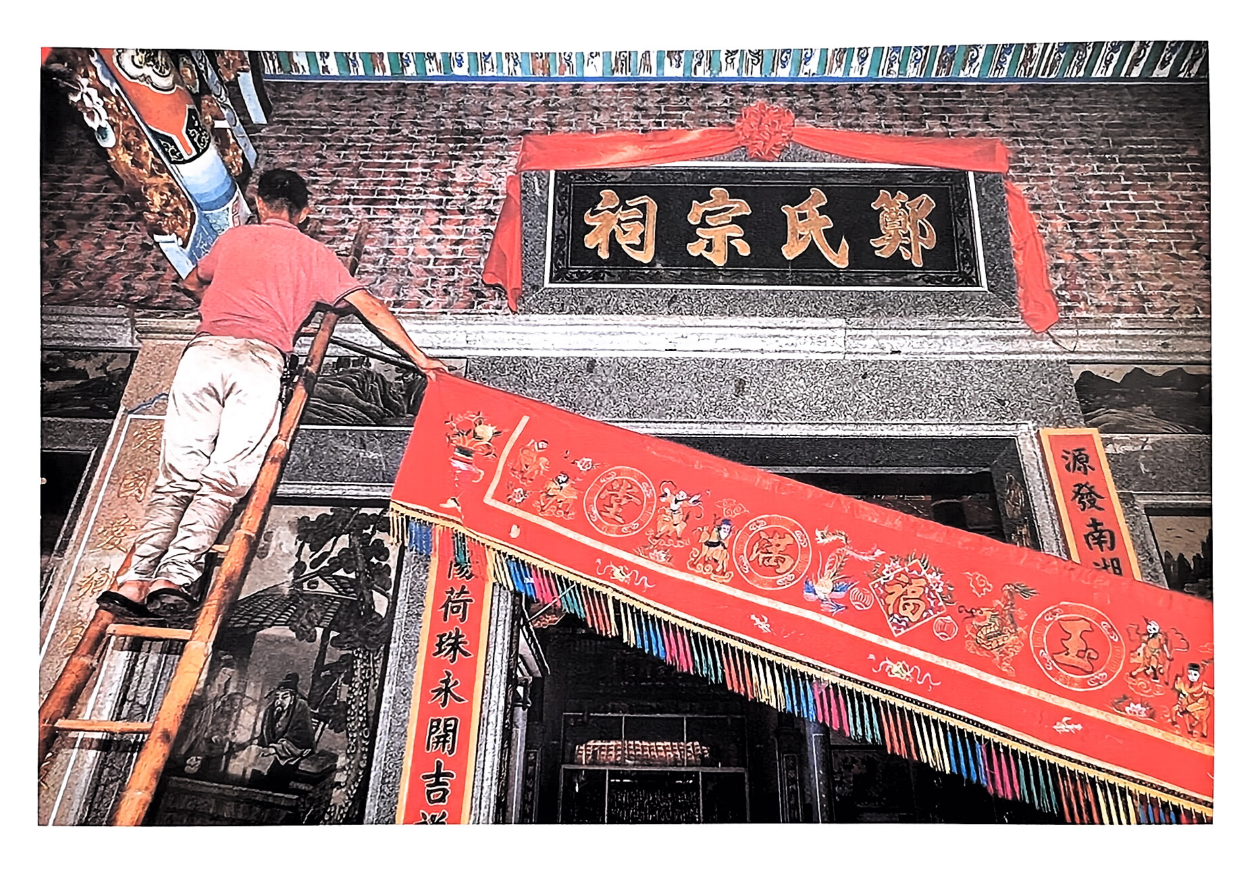
4

1. 住在荷珠村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2. 农历七月初八，郑氏族人在郑氏祠堂爬梯悬挂条幅

3. 荷珠村的土地庙

4. 郑氏族人将丁饼搬入郑氏祠堂，准备次日的祭祖仪式



左图：郑氏祠堂装饰一新，准备祭祖仪式

右图：郑氏族人试鼓，为祭祖仪式做准备

照片是他作为码头工会会员的证件照。我后来得知，他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当码头的搬运工，同时也是贩卖咸鱼的肩挑小贩”。

郑振满青年时没有子承父业，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商品贸易中断，当地耕地稀少，普遍陷入贫困。郑振满的小学同学和同乡们记得，那时冬天要打着赤脚上学、吃地瓜叶果腹，一些学生因有亲人是东南亚华侨，靠华侨救济才活下来。一方面则是他的学业非常顺利，从距荷珠村不到一公里的麟山宫小学，进入曾经闻名全国，至今在莆田也小有名气的枫亭中学就读，那里位于蔡襄故里所在地的学士里，距他家也不过两公里，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华侨源源不断地捐资。

但那时像郑振满一般的大学生属于极端的个例，枫亭镇只有他被推荐上厦门大学。而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恢复，枫亭镇曾经的活力回归，郑振满的许多同学考上大学，日后成为公务员、中小学老师。海外华侨也重新捐资助学，枫亭中学就非常典型，仅 1988 年到 1998 年的十年间，旅台校友和华侨就捐给学校 10 万美元和 30 余万人民币。

荷珠村里也同样注重教育。2007 年时，荷珠村宗亲和村里外出的企业家，分别成立教育基金，宗亲的基金会有本金十余万元，每年拿出利息奖励考上大学的学子、资助贫困学生、鼓励在校表现优异的学生，企业家则每年捐赠一万五千元，答谢培养出大学生的老师。每到高考发榜后，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奖励两千元，村里人敲锣打鼓把钱送到学子在村里的家中。如今荷珠村以出读书人出名，除了郑振满，还有等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室等机构的高级工程师。村里的开发区小学是重点小学，荷珠村也成了学区。

这样的结果便是，当地很少有人打工，如果不是做学术，或在体制内工作，就是做生意。郑振满和他亲兄弟的子女都是如此，不是在厦门、深圳，就是在江西、武汉，早就远离家乡。



祠堂记忆

因为年轻人出外闯荡，目前荷珠村两千多人中，只有四五百人常住在村里，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人。但在村里，总能找到在外游子的印记，最集中的地点就是郑氏祠堂。

荷珠村原本叫做“下朱村”，是一个朱姓为主的村庄。郑振满考证，明朝嘉靖年间，也许是为躲避倭乱，他的祖先从漳洲府海澄县卢仔上门村迁到这里，将朱姓替代，村名也改了过来。繁衍至今，除了曾、游、萧、杨、陈、林、蔡等小姓，每姓只有三至五户人家，村里绝大多数都为郑氏族人，已经传承二十余代，共九房子孙。郑氏祠堂有 500 余年的历史，见证了荷珠村的发展历程。

在村里找郑氏祠堂，并不是十分容易。在郑振满的记忆里，人民公社时期祠堂已被改成了食堂，旁边建了厨房。小时候他总肚子饿，天天跑到祠堂这里看大人煮饭。2003 年全体族人筹集 60 余万元资金在原址上重修。虽然祠堂居于整个村子正中，前面有一片小广场。祠堂占地 800 多平方米，红砖紫瓦，雕梁石柱，前后两厅，两重飞檐，除了村庙，村里没有其他建筑是如此样式。改革开放以后，村子经历过两次大变动。一次是 1999 年的台风和洪水，把村里低矮处的农田和房子都冲毁了。洪水后硬化路面，许多农田被水泥路覆盖。此后随着村里的二层小楼越建越多，不仅从高度上见不到飞檐，以前分散的聚落，也成了几乎都连在一起的街道，祠堂被藏在了街道深处。尔后



左图：农历七月初十，郑氏族人济济一堂，为祖先上香

右图：郑氏族人在郑氏祠堂里码放丁饼，供祭祖仪式后，族人按房领取

修建高速、建设高铁，整个村子就被高速路和高铁桥隔成两半。从郑振满家走到祠堂，就要穿过一条四车道的省道。

但祠堂仍是村里老人日常活动的中心。走进祠堂，敞亮的大堂足够放下十多张麻将桌，平时村里老人就在此打麻将。同时祠堂也是老人协会的所在地，大堂的东厢房是老人协会的办公室，供老人们喝茶、聊天。

祠堂尽头的享堂令人震撼。享堂正中，摆设香案祭桌，高悬“光宗耀祖”的匾额。享堂上，悬挂郑氏始祖的画像，画像下密密麻麻供奉着10余层、20余代、600余座列代祖宗的神主牌。那是祖先灵魂依附的场所。每一个小神主牌就是夫妻两个人，当一辈人都过世，就把一辈人归入一个大的神主牌中。深棕色的神主牌上竖着三重莲花和寿字图案，如古代官帽的翎子，它们是亮片的材质，从远处望去，像一面面旌旗。

郑振满先人和过世兄弟的神主牌也都在那里。祠堂侧壁上，还雕着郑振满年轻时的照片。那是重建祠堂时，村里为捐款超过两千元的族人统一做的。但最令人感到一个人与家乡联接的，却是祭桌上的宗族簿和掌管宗族簿的宗祠管理委员会秘书长郑捷文的讲述。因为重建祠堂时，为了便于查找享堂上的神主牌，宗祠管委会把享堂每个角落编了号，同郑氏族人一一对应，族人的生卒信息，都记在宗族簿上，可以随时查到。而郑捷文随口就能说他们的过往。

“郑振满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是本村人。郑振满的父亲本想生四个孩子，取‘金玉满堂’，只生到振满。振满的二哥振玉以前在江西工作，不幸溺亡。当时把振玉的神主牌放进祠堂里，振满的二嫂来看，抱着神主牌就哭起来。”郑捷文今年74岁，退休前是国企公司管人事的职工，如今仍结实、干练。他比郑振满大5岁，两人平辈，都是当地郑氏家族中的广字辈，只是郑振满是四房，广字辈中间的名字是“振”；郑捷文属于三房，他们房



的这一辈名字中间是“捷”。作为秘书长，祠堂内整体材料，组织祭祖等活动的流程，都是他的工作。为保证每年新去世的族人能在祭祖仪式前，灵魂归入享堂，郑捷文有一个习惯，每听到村里有白事的锣鼓、鞭炮声，他就记下日期和那一家的名字，等来年祭祖前，去敲门问要不要把神主牌放进祠堂。“一块神主牌 200 块钱。如果那家人忘了提前说，祭祖时亲人的牌位没在享堂里，会不高兴的。”

我在荷珠村期间，恰赶上祭祖仪式。仪式开始前一天，享堂周围又摆了一排红色的祭桌，桌子上铺满数千块代表子孙人丁的丁饼，家里每有一口人，就有两块，按各房的顺序摆放，摞起来有五六层。

无论是郑氏祠堂里的陈设，还是全族的祭祖仪式，都是象征性地把郑氏族人联结为一个共同体，虽然不强求族人都回来，宗祠的功能仍然维持着运转。

祭祖当天，300 年前迁到其他村的郑氏族人也会派代表来参加，祠堂里有五六十人，仍然多是老人。大厅里摆着长桌，上面堆满寓意多子多福的桂圆。仪式开始前，道士作法，一边念咒，一边用笔蘸水后在神主牌的名字上点点画画，预示着此世的户籍已销，逝者到彼世的先人那里报到。仪式开始后，族长儿子穿着正式，戴着黑檐帽、身披蓝大褂，站在最前面，引领族人敬香、跪拜。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最后分丁饼。”仪式有一个多小时，仪式结束后，郑捷文在桌前和各房族长一起对着丁饼分配的名单。丁饼是各房族长提前一个月找师傅做的，与小号的披萨差不多大小，上面有芝麻，里面有馅。在场的人一拥而上，把属于自家的一份拿回家，那意味着经过祖先认定和祝福，自己仍身处家族之中。

大家族的饭桌

在囊括所有族人的郑氏祠堂之下，荷珠村原有各房的小祠堂，一共七处。祠堂最初是由祖屋

形成的，小祠堂所在地也是一房族人日常生活的聚集地。

直到郑振满小时候，各房的聚集地还都比较分散。郑振满家四房的大宅院在郑氏祠堂东南方向，而郑捷文家三房的宅院在郑氏祠堂南边四五百米的地方。在他们那代人的童年里，郑氏祠堂已经失去功能，围绕各家小祠堂，一个家族聚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令他们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以前的大宅院很大，同一房数百名族人住在一起，分到每家人的房间很小，屋内没有地方吃饭时，族人们都坐在外面，聚在一起吃。郑振满记得，“每一年祭祖，大宅院里家家户户就把桌子搬出来，约有 20 来家，桌子一直摆到天井。”

曾经共同生活的情谊延续至今，尤其在族人生病、过世时，表现得最为真切。一旦听说有族人病重，出门在外的族人就会陆续回家看望；族人去世，在外同房的族人必须回乡。郑捷文记得，两年前他们房有一位老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三房的人们一商量，每家拿出两千块钱应急。郑振满家也是如此。郑振满堂哥郑振寿至今对 2015 年郑振满母亲的葬礼记忆犹新。丧礼期间，几乎所有的族人、亲戚、邻居、朋友第一时间到场。仪式很隆重，出殡时有一前一后两个吹拉弹唱的队伍，亲属都穿着丧服，郑振满的哥哥作为长子站在队伍最前面，郑振满走在第二位，像郑振寿这样的亲属走在棺材后面，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如今因为人民公社运动和上世纪 90 年代的洪水，七个祠堂或只存留一部分，或被改建为民房，四房的祠堂就在洪水后重建为民房，大宅院也在原址复建为三排二层小楼，大部分人已不在此居住。只有郑捷文所在的三房重建了祠堂。那里距离郑姓祠堂只有四五百米，也雕梁画栋，规模却是郑氏宗祠的四分之一，里面也供着



祭祖仪式前，从外地远道而来的郑氏族人聚在一起聊天





郑振满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右）讨论有关庙的问题

三房祖先的牌位。郑氏祠堂的神主牌是祭祖时祭拜，而三房祠堂里面的牌位，则在亲人的忌日和清明节时祭拜。

但即便没有小祠堂，大部分族人也不再聚居，每年冬至也仍然会在祖墓前祭祖。因村子附近没有山地，他们的家族墓地在十余公里外。“扫墓是由最远的祖先一层一层拜下来，要扫很多天。家有喜事，孩子考上大学，也都要拿猪肉、花生到墓前祭拜祖先。”振满记得，他最近一次扫墓是前年参加曾祖父的墓祭，全家人都参加。“为久远的祖先扫墓时，是各家派代表，更近的祖先就是全家都参与，所以每一次扫墓见到的亲戚都不一样。”

每轮扫墓后聚在一起吃饭，就是家族内互通有无的时刻，各家的利益因此绑定在一起。虽然亲戚间的帮助在任何一个家庭都屡见不鲜，比如郑捷文没退休时帮外甥找工作，郑振满帮升学的侄子联系学校，但饭桌上的互助不一样，往往是一起商定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

“孩子是股东，有孩子才能继承公共资源，才能分红。”也是在这样的饭桌上，才能体会当地人信仰“多子多福”的现实意义，在古代是保证自己能得到族产的分红，在当下也类似。郑振满作为大学教授，不参与他们的生意，但扫墓后的一次聚餐，可能就谈好了两三个生意，他经常见证这种场景。在他家那里，合伙办加油站的生意非常盛行，一个加油站需要投资数百万元，通常是一人带头，数家投资，这种经营模式令莆田人几乎垄断了从南到北的加油站。

郑振满告诉我，“他们是认股，股份分完就派一个人去经营，其他人全部都在老家，等着年底分红。这里的银行到年底都要紧急调现款。我有一个同学，长期就在老家，因为知道如何写不同

的文书，有谈判经验，很多公司都是他操盘。有一年寒假，我到他家去，不到一个下午，前前后后有十几人到他家，亲眼看到他不断从床底下拿出一袋袋现金，给上门的股东们分红。这种民间集资、合作经营的方式，可能比现代企业的效率要高得多。”

转向“文保”的麟山宫

如果说郑氏祠堂的氛围是严肃中透着温馨，平时宽敞、明亮的大堂里，摆着麻将桌，开着空调扇，老人们仿佛是在祖先、亲人的陪伴下享受天伦之乐，那么村里还有一处神秘而庄严的所在——振兴宫。

原建于 1907 年的振兴宫是荷珠村的村庙，在郑氏祠堂东面二三百米的地方。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被改为粮库，内部的神像被毁，之后恢复为村庙。改革开放后，经历过三次重修，如今两进的宫庙，宫外有大戏台，宫门口立着龙柱，雕梁画栋，比郑氏祠堂富丽得多，恨不得每根梁上都雕刻金龙，里面将振兴宫与社庙保兴社、保全社合在一起，供奉着天上圣母、玄天上帝、协天大帝、酆都大帝、杨公太师、田公元帅、张公圣君、萧公圣君，以及社主明王。与郑氏祠堂始终打开的大门不同，振兴宫的大门只有在重大节日时才会打开，平常被栅栏门拦住，只留侧门供村民敬香。

属神的宫庙要高于属祖先的祠堂，比如一个人在家里请道士做仪式，道士要拿一个本子念道：“仙游县连江里振兴宫保全社某某人家要做某某仪式”，然后还要把这个本子烧掉，表示已经上奏神明；甚至当年重修祠堂时，德高望重的族人要在振兴宫里占卜，认定祠堂是在原址重建，还是另择新地。“村民们都很愿意为振兴宫捐钱。2013 年重修，上台剪彩的人每人收一万，仅剪彩一项，就收了 36 万元。”郑捷文也是振兴宫董事会的秘书长，当年重修时候负责记账，也负责日常整理关于振兴宫的资料，组织与振兴宫相关的仪式。

二者的高低之差，不仅源于对神的信仰，也是当地乡村特殊治理模式的遗存。当村与村之间发生纠纷，超越宗族，就需要更大的“谈判机构”，那就是通过宫的系统向外连接。振兴宫的“上级”是麟山宫。

“麟山宫在 1905 年就有了第一届董事会，如今已经发展到第五届。就像各个国家会到联合国派代表，目前麟山宫下辖 38 村，各村都要派代表加入麟山宫的董事会和理事会，振兴宫也是如此。”郑振满带我见到麟山宫董事会和理事会的成员，多是退休干部、教师、老板。

郑捷文既是振兴宫的代表，也是麟山宫董事会的秘书长，他的任职资格是此类理事、董事的典型。首先是对家乡的感情过硬。郑捷文在 1966 年，19 岁时就支援三线建设，被分配到三明深山里的军管的装配公司，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在三明工作 41 年后退休，户口还在泉州，他就卖掉那里的房子，搬回老家。另外就是家境殷实，不贪小财。虽然他平有是穿一件参加活动发的 T 恤，粗布休闲裤，脚踩一双旧凉鞋，拿的企业退休金，每个月只有两三千元，但有两个优秀的儿子，大儿子在苏州开工厂，小儿子在济南办软件公司，又有加油站的生意，每年都能收入上百万。退休后，大家熟知他平时喜欢动笔头、做简报，就被叫来麟山宫任职。

我在的那些天，他可能是镇上最忙的老人。在村里祭祖的前三天里，他每天早上 7 点就赶回村里，搬桌子，运丁饼，核对上一年去世的人的神主牌，中午被电话催着回到麟山宫，晚上也在麟山宫过夜。因为正赶上他值班，要在宫里收取香火钱、记账，也要注意宫里的安保。

郑捷文的工作，恰可说明在没有械斗的年代，麟山宫的主要功能。它的权威仍在，村庙修缮、举办仪式，要先到麟山宫占卜。两个村间的土地纠纷，往往会请宫里主持公道，麟山宫董事会经常与当地老人协会配合，出面调解。救助灾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麟山宫志》上记载，仅 1986 年恢复董事会以来，宫董事先后派人深入十多村调解二十余起民事纠葛，“每值逢年过节和发生天灾人祸时，宫董事及时登门访问，1998 至 2000 年，共资助特困户 41 户次。解决困难户急难之需。”

但类似的功能屈指可数，郑捷文已忘记振兴宫下面的村里，何时发生过纠纷。反而作为一个省级文保单位，董事们日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和财务的公开透明，注重将麟山宫宣传出去。他们编辑出版了很多书籍，送给我两袋子书，我每抛出一个问题，他们就会得意地说，“都记在书里”。

“自娱自乐”的游神

对于生活在村里的郑捷文，一年到头参与各种节庆活动。除了正月闹元宵，还有“三月初三”和“五月初五”，以及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振兴宫旁边的戏台都要请戏班表演节目。但他最近尤为期待的活动，是阴历八月十三，湄洲岛妈祖的游神仪式，据说有七八百人的队伍，18 辆彩车，他活 70 多年也没见过。

在当地所有“层级”的宫庙，最热闹的仪式就是游神。所谓“游神”，就是将宫里的神用轿子抬出来，沿着固定的路线巡游一圈。抬出的是哪尊神不重要，当地人信仰灵活，孙悟空、猪八戒也都可以当作神来供奉。重要的是神游的范围，那往往意味着不同层级的网络。像湄洲祖庙的妈祖出来巡游，就既是热闹，也是打通沿途各妈祖庙背后团体的关节。

而在麟山宫，每一层级的宫庙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元宵节的游神仪式。麟山宫是游神三天，巡游 100 多里，所住村庄视为“神赐平安吉祥”，要点灯结彩，搭筵演戏。每个村的代表在中秋节就要到麟山宫占卜，请示何时出游，巡游哪条路线，在哪两个村分别过夜。而在荷珠村和其他麟山宫管辖的村庄，正月十五当天，上午在村庙占卜，确认游神时间后，抬神轿绕村子巡游一圈，晚上游灯。

这是自保和堂成立，举行游神形式后，就定下的规矩。当时矛盾的村庄要彼此发请柬，通过游神弥合冲突，如今游神是 38 个村庄共同的狂欢。

为迎接麟山宫的杨公太师，被选中的村子需要提前半年做准备，它们的村庙相当于杨公太师的行宫。当地的村民既要准备数十只全猪、全羊、印膏塔、年糕塔、粽子塔、米粉塔、豆皮塔、红菇塔、香菇塔、金针塔。侍奉神明吃饭，也要为神明准备住所，如果选择在振兴宫过夜，他们就会在振兴宫大殿里做两间行宫，一间供奉神像，一间用作神明的办公室，里面配上电脑。游神期间，村里至少要 1500 人参加，振兴宫董事会事先就要指派，春节期间就到指派的人家发请柬，说明特定的角色，附带一对桔子和三天共 150 块钱的辛苦费。仪式当天，出游队伍模仿古代官员出巡，把杨公太师请出宫、为神开道，后面像皇帝的队列，跟随着大锣、大灯，乃至枪班、管乐队、马队、舞龙、舞狮，以及神卒、高官、神轿和各种文艺队伍，一路浩浩荡荡，所过村庄，设香案迎接。

宫庙在当下正常运转的方式也在那时表现得最为清晰。郑捷文告诉我，当游神队伍走来，人们争相恐后地过去，把红包挂在抬神像的把手上，一旦队伍落脚，麟山宫董事会的人就会把红包收走，正所谓“大宫出游，小宫出钱”。

而麟山宫游神后，各村各自的出游也是如此。郑振满虽然平时很忙，但疫情之前，他在春节都会带家人在老家过。元宵节下午出游时，锣鼓喧天，数百名村民组成队伍从振兴宫门前的广场出发，举着大灯、彩旗、大牌和龙虎旗，抬着神像缓步行进。两个小时间，寻遍村庄各个角落，族人在接神点备设香案迎接，沿途各家各户在门前恭候。每年农历正月初四，振兴宫董事会都要到全村各家各户“乞彩”，筹集全年的活动经费，在节日时请戏班演戏，举办公益事业。郑振满记得，今年元宵节回老家，他特意到振兴宫里捐了 1000 元，“把之前两年的补上 ”。

但就像郑氏祠堂的祭祖仪式上，只有老人在搬桌子，布置祠堂，甚至爬上两层楼高的前厅贴红字，村里元宵节的游神时，许多年轻人也已经离乡上班。郑捷文颇为无奈，“以前麟山宫的游神是在正月十三日之后，也就是中秋节占卜时，从正月十三日开始问神，后来因为春节假期就到初七，就在占卜时把时间提前，从正月初六开始问。因为仪式太繁琐，我们想过改为 5 年办一次，村里老人不同意，觉得难得看一回，5 年后没准就看不到了”。

变形的仪式

当我在郑振满富庶的家乡发现，出门在外的人与家乡有紧密的关联，老人互助，甚至有层层的自治组织协调日常的生活，郑捷文的一封遗书，令我深感意外。

“几年前我就写了遗书，免得突然得病说不出话，孩子不明白我的想法。我念给同时退休的同乡，他们都很认同，也想照着写一份。”郑捷文告诉我，他在遗书里对孩子们讲了三条，一条是让他们照顾好老太婆；一条是骨灰安葬在哪里；一条是希望以后在他们的家里，能把他的像挂得尽量久一些。“我已经做好了我和我家老太婆的像，把我们的照片用相框装好，给相框钻了眼，等我们都去世后，我们的相片就能拼在一起。我做了两套，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我想等我和老太婆都过世后，儿子就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的孩子不在农村长大，不愿回农村，他们也要听孩子的想法。村里的房子会卖掉，这是很现实的事。但不论他们住在哪里，希望挂着我们的像，让孩子们记住我们的样子。”

这不像郑捷文会面对的问题。他儿子在老家盖的两栋二层别墅非常豪华，当时为避免地基不稳，特意像在城里盖房一样，深挖地基、竖起钢筋、浇筑水泥，两栋别墅加在一起，花费要五六百万。儿子们也很孝顺，最令郑捷文自豪的就是，两个儿子每年除了春节回家，因为他老伴的生日在农历六月，他们年中也会回来给母亲过生日。

而如果郑捷文都不期待他的孩子回乡，甚至他已年过古稀，早已希望卸职，却没有人顶替，家乡诸多仪式的运转，是否还能吸引新鲜的血液？我随郑振满参加的一场“潦草”的祭祖仪式，令我有不一样的体验。



祭祖仪式上，祠堂外观看表演的小女孩

最近几年，郑振满的团队在福州永泰发现了一大批民间文献，他们专注于研究明清以来的山区社会，其中同样涉及当地的庙宇和仪式活动。于是我们来到永泰县盖洋乡珠峰村，参观那里举行的谢氏“大祖”祭祖仪式，也就是祭拜谢氏来到当地的“开基”祖先的仪式。

珠峰村在郑振满的老家荷珠村西北方向约140余公里，属于闽中山区。一如“珠峰”的名字，海拔700多米，地处层峦叠嶂中，是戴云山东北麓最为偏僻的古村落。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村里到县城，要走一周的路。那个村的主要姓氏就是谢，建村的历史与荷珠村差不多，也是明代从外地迁来，替代了村里原有的姓氏。只不过村子规模小得多，总共500余人，平时年轻人在福州及周边地区工作，只有二三十位老人在

村里。村庄已濒临凋敝，现存 40 余座古屋旧厝和占地 7000 多平方米、包括 372 间房间的巨大庄寨钦察寨遗迹。

祭祖仪式已延续数百年。如今珠峰谢氏有十房，仍按照清代以来的规矩，各房经过抓阄，每四户一组，轮流做头祭祖，日后分家独立的子孙按已经排好的顺序轮流。本世纪初，村里大量人口外出以前，在祭祖仪式前两天，大家一起到祠堂除草、打扫卫生。祭祖时，每家拿一份自己的饭菜到祠堂，拜完祖宗后，各自把祭品带回家，也没有一起聚餐的习俗。如今阴历七月初一祭祖前后，依然会有二三百人回乡，许多都是年轻人，甚至有很多小孩子将祭祖仪式的现场当作游乐场。

祭祖仪式在祠堂陈留堂展开，举办得有些“潦草”。陈留堂里只有一个列祖列宗的牌位，没有每位先人的神主牌，没有分丁饼；大堂空间狭小，不能同时容纳全部族人在一起敬香、祭拜。仪式看起来比较随意，虽然请了道士，但他只要没有念咒或是吹牛角号，叼着的烟就没断过。道士身边的族人们有四五十人，从没形成整齐的队列，像看节目一般在院子里来来回回，除了被招呼烧香、敬拜时，一拥而上取香，呼啦啦跪拜，总是私下扎堆聊着天。

在祭祖仪式上最显眼的，却是 40 多岁主持念祭文的谢志道。他在祭祖仪式前就表现得非常积极，特地带着一儿一女提前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谢齐仁给他以前的范本，让他誊写祭文，修改错别字、添加今年的日期、人名。祭文写在一张 A4 纸上，他却用了将近一宿。并非因为改动多，只是他过于慎重其事，“本来想把祷文都用毛笔写出来，后来发现那样纸太长了，最后只得用签字笔誊写了一遍”。

在仪式开始前的饭桌上，作为外来学者的郑振满和他的学生、负责当地古村落保护开发的县领导，与当地村书记、乡贤聚在一起。不了解祭祖流程的县领导，对仪式感却颇为上心，提议“要是祭祀的人都穿上礼服就好了，下午进行到一个环节，要有人带着叫好，拜的时候要全体都跪，那才壮观”。而同样不甚了解仪式如何组织的谢志道，却回应最为积极，他不胜酒力，却频频举杯，连连称是。

这些似乎有些怪诞的画面背后，透露出当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承担建设家乡任务的动力。



家的连结

谢志道的长相与李敖有几分相像，也戴着粗框方眼镜，短袖西服衬衫配着西裤。那是他大学毕业后，常年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养成的习惯。对于家乡的祭祖仪式，他其实已经很陌生了。2019 年从保险公司辞职前，他也因工作在外，有近 20 年没有参加过祭祖。如今他和妻子在福州开



谢志道（左）与谢齐仁在钦察寨的前厅前回忆往昔

一个小诊所，父亲作为族长年事已高，就让他这位长房里比较有学问的人回来念祭文，主持祭祖仪式。

他对村里的热心，源于2015年前后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修缮钦察寨。那时谢氏族人得知永泰县获得了筹建美丽乡村的资格，珠峰村因为偏远，古宅虽然破旧，但仍保有原貌。2015年祭祖仪式后，族人们都希望能将儿时生活过的钦察寨修缮好。而当年在东南乡建首席建筑师张明珍的帮助下，珠峰村与“美丽乡村”项目结缘。2016年村里成立“珠峰寨修缮理事会”，组织筹备资金，曾经住在庄寨内的后代每人出资500元，上不封顶。理事会筹集到20万元，又向永泰县政府筹集到20万元。虽然不够将钦察寨彻底修复，但开启了第一步，将正厅、关厅与书斋修缮完成。

当时除了放下在福州、厦门的工作，回来捐


谢志道和他的两个孩子与谢齐仁一同离开如今已经荒废的钦察寨

款、帮忙的族内老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积极响应。谢志道家不是住在钦察寨里的人，本不必出资，但他也捐了许多钱，只因在他小时候寨里仍有 300 多人住在里面，他的小学也是在寨里面上的，晚上大堂的阴森仍令他记忆犹新，他把钦察寨当成自家的文物看待。而让他写祭文的村支书谢齐仁今年 50 出头，已经定居长乐，他家是最后一户从钦察寨搬离的人家，他记得寨子里每一个房间的样子。开始修缮钦察寨后，他也奔波在长乐与珠峰村之间。如今他走进满是荒草的寨里，即便立在桌子上积灰许久的烛台倒了，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扶起来。

他们作为中年人与家乡的关系，与郑振满的女儿郑静颇为相似。郑静四十出头，如今是武汉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她小时候经常回老家，即使到上到大学，每年寒暑假都会被郑振满拉回老家，曾经因无法和同学聚会而痛苦，如今却总希望暑假能够在老家待上两个月，甚至在谋划与家乡相关的研究课题。

这一切与郑振满在老家的房子有很大关联。1980 年代分田到户时，村里人认为虽然郑振满的户口已经不在村里，但读书人应该有“书田”，就单独分给他一块地。他后来在这块地上盖房子，一盖十多年，从一层变成如今的四层小楼。在郑振满的印象里，他的“红砖厝”在当地颇有特色，周边村庄修庙时都到他家来借鉴。甚至因为他对麟山宫有所帮助，房子盖好后，几十个老人家敲锣打鼓，抬着匾到他家来贺喜。而在郑静的经验中，盖房的过程，是她从小长大的重要记忆。村里人告诉她，最初盖房时，木料堆在她的外婆家门口，她就站在旁边看着，说那是她家的东西，怕别人拿走。在她看来，自己最终选择学习建筑，也因为这个房子。虽然诸如卫生间的位置之类的问题，她提出的想法都没有被采纳，但她毕竟见证了一砖一瓦终于成为一栋房子，那也有她的心血。

作为一名 80 后，她对亲戚、家族的感受和大部分人没有区别。遇到事情，有时不敢向亲戚说实话，亲戚一定会“添油加醋”，辗转告诉父母，引起父母担心，把一件小事变得比天还大。但老家有一栋自己建的房子，“那与在城里买的房子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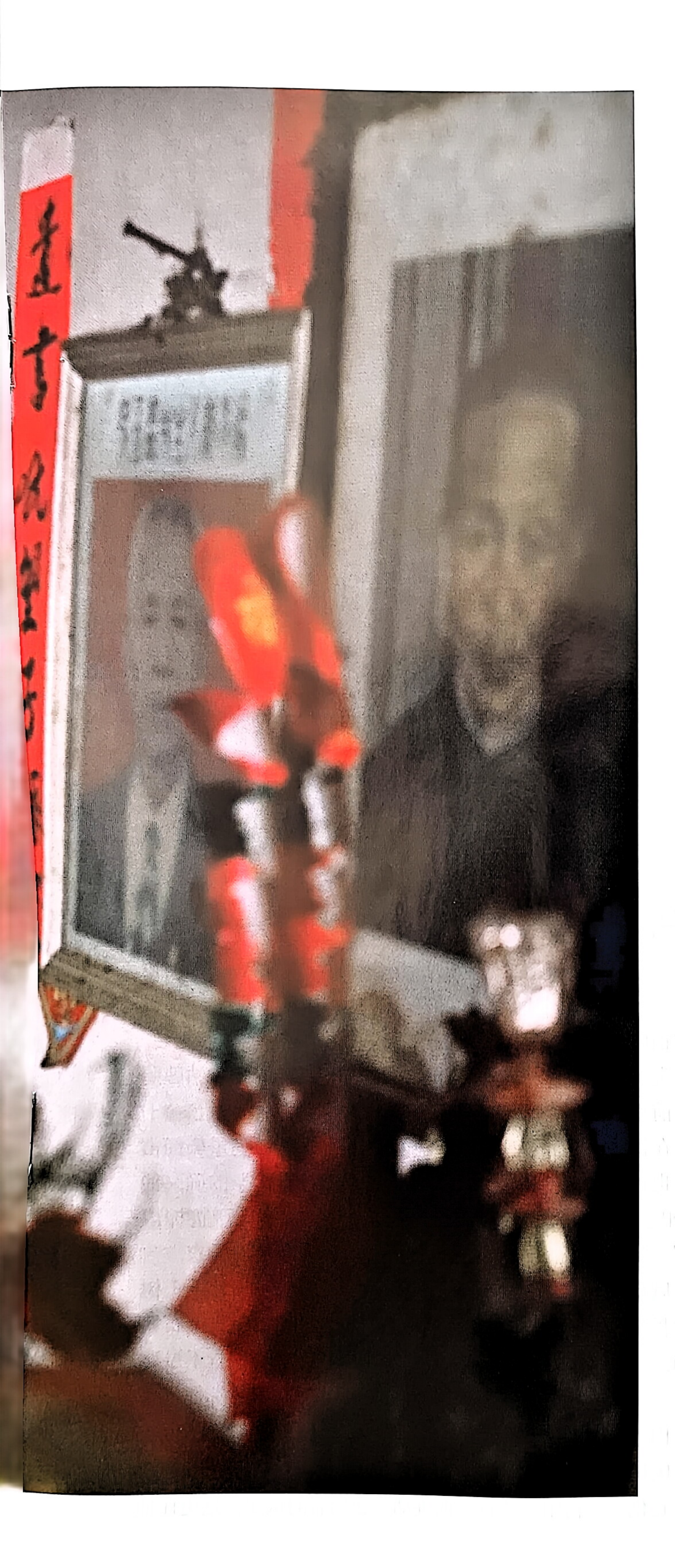
而当她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各奔东西，曾经的遗憾变成人生的常态。尤其当自己成为母亲，面对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又在学生们的讨论中发现，“北方的学生无法想象用大笔钱在老家盖楼，他们的生活经验都是家里有钱后，搬到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城里”，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老家的意义。

如今郑静的儿子只有三岁多，郑静希望尽可能向他展示乡村生活，供他长大后自由选择。郑振满的想法则是，“要想办法把他‘骗’到老家来”。

（感谢陈鸿伟、朱琳琳、李庆华、蔡沧铭、蔡金楠对本文的帮助）



吴重庆的老家孙村位于莆田半岛的中部，前后被海湾包围。清朝时，这里是荒凉贫瘠的“界外”



跟随吴重庆：回到“界外”老家

记者 · 魏倩　摄影 · 张雷

老家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 40 年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人往高处走”的奋斗叙事：年轻人背井离乡，拼尽全力留在大城市，依靠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跃升，获得财富和尊严。家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被抛在身后的记忆。吴重庆从读大学开始，到了广州这个华南的中心之地生活，而他在福建的老家，是一片曾被称为“界外”的经济贫瘠之地。但吴重庆和他的“界外”同乡们似乎在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故事类型，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文化母体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对于这里的年轻人而言，偏于一隅的故乡，乡土习俗依然深厚，它有时能满足一个人被社会关系网承接的需求。不过年轻一代的需求，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了。

1. 老家孙村

我们是在台风“杜苏芮”登陆的前两天到的莆田。从城市东南角的莆田站驱车再向南行，车窗外的树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司机说，风从海来。

我们的确在向大海行进。从地图上看，莆田半岛如同一把倒立的三叉戟，三个更小的半岛则是三个伸向南海的叉尖，此行的目的地“孙村”就在靠东北部的最大一爪“埭头半岛”的指根处。一上 224 县道“石黄线”，司机就迷了路，接连问了我们好几遍具体在哪儿停车，我掏出手机一字一顿念“秀屿区埭头镇武胜村孙厝”，他茫然摇头，“那你们看着点路边”。

在莆田，“埭头”并不是最有名的地方。醴泉半岛上的东庄镇是著名的“莆田系”医院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据称，这里的人们经营着全国 80% 以上的民营医疗机构；忠门半岛上的居民则多从事建材行业，


埭头半岛上的民居多建在田埂之中。“界外”土地贫瘠，很多年里，村民只能靠种植花生、番薯维生

也占据着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城厢区的安福电商城，一到夜晚就会变身全球最大的仿冒鞋类交易集散地，同行的同事张雷告诉我，他多年前在那里买的仿冒鞋到现在还没有穿坏……财富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迅速改造了城市的样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外部世界对“莆田”的一贯印象。

路越走越窄，司机到底没有找到“孙厝”。我们只得在导航指示的地方下车，吴重庆迎着风从远处的斜坡走来。他今年59岁，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向导。

在朋友圈子里，吴重庆有个别称叫“吴莆田”。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申请电子邮箱，吴重庆用这三个字的拼音注册了地址，之后也偶尔用它化名写作、回信，学界朋友们久仰“吴莆田”之名，有时因公路过莆田火车站，还会特意拍张站牌照片，“到‘莆田’了”。

但在许多需要介绍籍贯的场合，吴重庆经常收到另外一种评价：“你不像莆田人。”的确，他身材高大，圆圆的玳瑁边眼镜，头发严整梳成三七分，见面那天，穿件质地轻薄的白衬衣，一条白色长裤，风一吹，颇有点民国知识分子玉树临风的意思。一路带我们走在花生田和灰黄石墙之间的乡间小路上，“出众感”尤其鲜明。不过这样的评价听多了，他也会问对方一句，“那你心目中的莆田人是什么样的？”得到诸多或正面或负面的回应后，他反而更主动地在这样的场合提及“莆田”，“有意识挑动”在场者的认知，这更让他

成了学界中的一位“莆田代言人”。2018 年，在清华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一次名为“同乡同业：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的讲座中，他特意分享了“另一种莆田系”的生活经验。

“另一种莆田系”是吴重庆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他的故乡孙村，村民们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如今不管在全国哪个城市，只要进入一家金银饰品加工店，里面的老板十有八九是吴重庆的同乡。吴重庆认为，这种“同乡同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乡土社会资源与经济形式的紧密“互嵌”。以此为起点，乡村的公共事务和民间信仰都被重新激活，甚至呈现出“超越空心化”的趋势。

这让我们对莆田，尤其是孙村产生了第一重好奇。在过去 40 年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人往高处走”的奋斗叙事：年轻人背井离乡，拼尽全力留在大城市，依靠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获得财富和尊严。而那个被他 / 她远远抛下的故乡或者成为逢年过节夸示乡里的对象，或者成为某种成功人士的乡愁点缀，从此不再在这个以上升为主基调的故事里出场。但 2018 年吴重庆那次讲座的简介里，主办方写道：“在神化个人奋斗及个人发展的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今天，莆田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的范本，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和他的文化母体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是什么让一个人不停地返回故乡、研究故乡？吴重庆和他那些遍布全国的“打金”同乡们，靠什么和这个东南沿海的僻静小村紧紧相连？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们把生活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留在了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故事可以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复制”吗？ 2018 年，吴重庆在他所任教的中山大学里发起了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山大学校友总会联合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面向全校学生招募调查员，希望他们利用假期时间，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带着研究的目光“重回家乡”，了解中国现实，重新建立和故乡的联结。到 2023 年，该项目已经进行了第 12 期。吴重庆告诉我，对于这一代“有家无根”的年轻人来说，他将之视为一个“育人项目”。

2023 年 7 月底，暑假过半，学生们各自在家乡做着调查，吴重庆一家趁假期从广州回家看望 90 多岁的母亲，我们也因此得以和他一道，回到记忆和现实中的孙村。

“到了，我家就是这儿！”沿着小路没走几步是个坡道，吴重庆大步向前，指了指近前的牌坊，“按理说司机应该把你们带到这里的”。那是一面 2 米多高、10 米宽的折角影壁式牌坊，灰白配色，仿福建民居设计，中央是“孙厝”两个大字。吴重庆说，这个村里的小地标也有他的一份贡献——2020 年春节期间，因为新冠疫情村里的中青年们被困在家里，借此机会，他们在微信群里发动捐款，募资修了这座牌坊，又重修了面前的小路和斜坡上的小桥。下坡前，他特意指了指桥头的那棵悬垂向沟渠的苦楝树，“过去这棵树不死不活的，有人提议要把它砍掉，现在桥修好了，它也长得很茂盛了。”

孙村，或者说孙厝，指的是这牌坊一周方圆 6 公里左右的自然村。它距离莆田市区 30 公里左右，地处埭头半岛中部，东北和西南各有一片海湾。在距今 2000 年前的汉代，半岛并不与陆地相连，孙村就是亚欧大陆东南沿海的最边缘。到了清代，清政府为剿灭控制莆田沿海诸岛的郑成功部，于 1662 年下“截界令”，在沿海每隔五里建一石寨并筑界墙，将居民尽数迁往“界内”。直到 1683 年台湾纳入清版图，莆田沿海才拆除界墙，居民回迁。自那时起，孙村所在的地区又被称为“界外”，既是边陲，也是化外。

一路上，我都在想牌坊两侧的那副对联，“他山之石可居厝，螽斯其羽宜子孙”，字尾嵌了村名。吴重庆告诉我，虽然名叫“孙村”，但全村并没有姓孙的人家——他猜测，这个地名是过去瘟疫等自然灾害将村庄整个抹去的证据——村里最主要的三个姓氏是林、何和吴。吴氏的聚集地在其他两姓之间。绕开“孙厝”牌坊往东走就能抵达。

久居城市，我已许久没有想象过螽斯多子多福的意象，直到进入吴重庆家的小院。院子在一条小巷里，左手边用条石垒成的房子属于吴重庆的堂哥，再往前一幢白色瓷砖装饰，属于他已故

上图：吴重庆二哥家的小厨房里，小辈们正帮忙做饭

下图：吴重庆二哥家的客厅，可以容纳全家的子侄共同用餐



的父亲，接下来是二哥的房子、大哥的房子，家里的老宅，顺时针围出一片不规则的空地，铺上方砖，上面早有一群年轻人聚拢在一起聊天。他们都是吴重庆的侄孙辈，他的儿子刚刚从广州回来，也亲亲热热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吴重庆久居在外，没有在这院里起新房，每次回来，他都住在二哥家楼上。一层大厅里，一张大圆桌能同时容纳近10人用餐。我们进屋的时候，吴重庆的哥嫂正给孩子们准备晚饭，嫁到外村的姐姐也回来和一家人团聚，楼上楼下忙碌着，屋里的嘈杂带着生气，一个久违的大宗族。

时候正是7月底，天气预报超强台风“杜苏芮”马上就要登陆。风向北吹入正堂，吴重庆打开茶海上的壶具，泡茶递到我们面前。同时出现在桌上的还有一盆花生。“现在是收花生的季节。我们这里的花生是这样做，煮的时候加很多盐进去，煮熟捞出来再把多余的盐分洗掉，这样花生不会回潮，里面的仁也有了点咸味。非常好吃。”

他说得没错。刚做好的花生还没完全干透，里面咸香味的仁带点水汽，越嚼越觉清甜，尤其适合搭配酽茶。不多一会儿，同事张雷面前已经聚了一小堆花生壳。吴重庆的讲述则带有学者的客观：“今天这里还有人做农业，其实已经不是为了赚钱和糊口。照他们的算法，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要送给子女，其实是一种‘礼品’。老人继续做农业，是为了对子女的关心，子女回来拿到父母种的东西，就会感觉他们的情感联系一直保持着。在中大（中山大学）的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里，基本上只要大家一起喝茶，就会问我，‘有没有孙村的花生？’这种和家乡的联系对我来说很珍贵。”

2. 两代“乡贤”

吴重庆家的老宅是小院里最早的建筑物。这是一幢传统的莆田沿海乡村小楼，灰黄色石块砌成，上下两层，结构左右对称。二层大厅南面是阳台连廊，左右方砖墙面平整，靠近看是两幅褪了色的彩画装饰，前面各挂一枚“吴”字红灯笼。为了盖新房，村里其他人家的老宅早就拆掉了，他们家则争取把主体结构保留了下来。虽然靠西的一侧厢房在大哥盖房时拆掉了一部分，如今它仍能算村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房子是吴重庆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盖好的，1952年又加盖二层。吴重庆出生在这里，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二层盖好后，全家7口人就住在楼上。大哥结婚后，分走了靠西的厢房，他和二哥就支了床住在二层大厅一角，再后来到二哥结婚，他就搬到一楼独住，直到14岁离家到莆田市读高中。

一楼大厅属于父亲吴玉森，这儿是他的会客室。他是村里有名的“读书人”，上过中式私塾，也上过新式学堂，1938年考入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埭头半岛多个村庄从教，还独自创办过多所小学。因为他的博学和广泛交游，家里的客厅里常年有人坐着喝茶谈天。吴玉森不是农民，但对农业知识很熟悉，村里人灌溉、杀虫、施肥的杂事都来向他讨教，村里婚丧嫁娶，亲戚关系盘根错节，行礼时需要用不同的称呼表达，吴重庆记得，小时候总有人半夜登门请教这一类称呼如何调整修改，父亲也往往能给出最准确合礼的回答。

吴玉森性格刚硬，在家里不轻易开口，用当地话讲叫“言语很重”，除了谈天叙旧，村里的人有什么纠纷事务，也都上门请他调解，这时，年幼的吴重庆就负责在旁边烧火沏茶，木柴的烟滚上来，手脸总是熏得黑乎乎的。茶泡好了端上来，吴重庆坐在一边听大人们聊天，谁家的鸡闯进了邻居的菜地，谁家的灌溉水引错了渠，父亲都自有公断。关于他的人情练达，有些细节让吴重庆记忆尤深。记得有次听父亲说起，如果上谁家相亲，见人家茶壶干净崭新，说明“这家的壶是借来的”，这家人平时没什么人来往，社会关系一定不广。又说起去别人家喝茶，如果水瓶里的水一股怪味，说明这水是用锅煮开的，“这家连一个专门烧水的壶都没有，家境想必比较清寒”。

儿时还有一桩新闻让吴重庆印象深刻。莆田当地民乐靠10种乐器演奏，名为“十音”，琵琶老胡拍板云锣，吴玉森都能上手演奏。他组织村里的孩子们建了一支小乐队，为了给乐队成员凑钱买乐器，还出面和生产队商量，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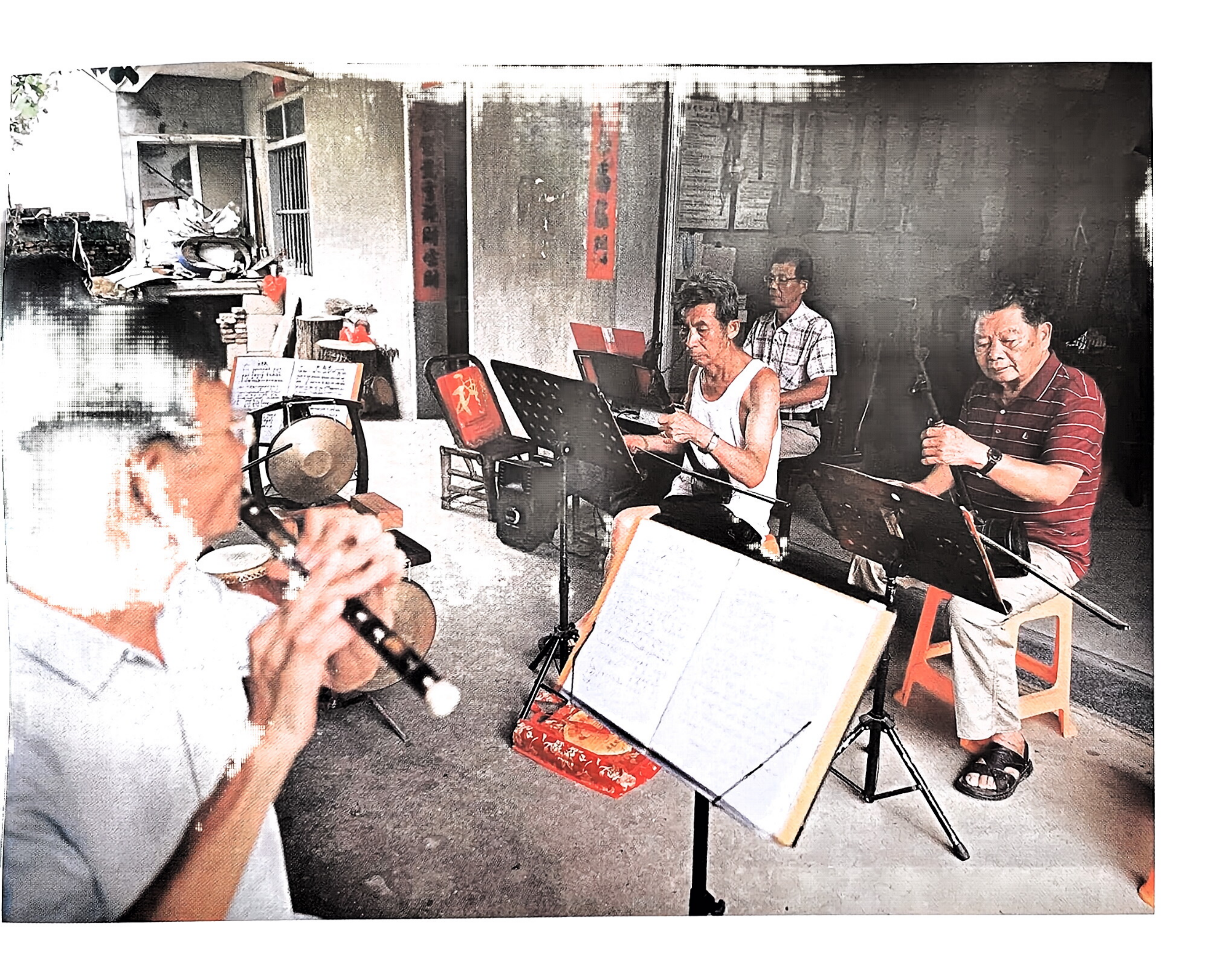
左图：泛神崇拜是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

右图：莆田当地的“十音”乐团

孩子们每天清早起来拾粪，回来卖给生产队，再用这些钱把琴一把一把地凑够。乐队建好了，大家常常聚在吴重庆家的老宅里演奏，吹拉弹唱热闹非凡，当时吴重庆年纪还小，连路都走不稳就能跟着乐队哼唱曲目，听那些传统的、古老的旋律从一个孩子口中唱出，村里的老人们都蔚为奇观。

孙村地处偏僻，村里的人们难得与外界发生联系，若有人外出谋生，村里人称之为“出社会”。儿时的吴重庆只觉得父亲和一般村民不一样，却不知道他为何能成为“界外”不多的几个“出社会”的人。一天午餐时，我向他问起祖父辈的故事，他才告诉我，其实他们家本不姓“吴”，而是姓“李”。吴重庆的祖母是埭头半岛后温村人，嫁入孙村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按照当地习俗，她不得不从附近汀塘村招来一位“上门女婿”，即吴重庆的祖父。在孙厝，他们一家都是外姓人，自然备受欺负。一家人挤到莆田城里租房子住，祖母帮人洗衣服，祖父就沿街做点小买卖，只靠这样，他们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学堂。后来，吴重庆想，性格强硬的父亲也许在很小的时候就想过，今后要成为一个在村里有影响力的人。

为此，他选择了一条长久存在于莆田地区的人生道路：读书。南宋时期，莆田所属的兴化府是中国科举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由于文教兴盛，福州、莆田、泉州一带曾被人称为“海滨邹鲁”，年轻士人们读书求取功名，年老官员们还乡又成为地方绅士，他们是传统社会形态中儒家价值的



承担者，也是莆田地区一贯为人所推崇的对象。

吴重庆后来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父亲考上了海疆大学，但当时祖母觉得他是家里的“独苗”，怕读大学以后要到台湾去，坚决不让他离开。但从始至终，他没有听父亲对此流露过一次遗憾。他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最适合的角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村民们也给予了这位“读书人”相当大的尊重。“四清运动”时期，吴玉森因故获罪回村，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但在吴重庆的记忆里，即使在“落难”的近20年里，村里人依然把父亲当知识人看待，他没有挨过一次“整”。

村子保护了吴玉森，也让他对子女的出路有了打算。吴重庆读小学时，因为不想让儿子在一年级浪费光阴，他要求儿子直接从二年级开始读起。1978年，高考恢复后第一年，吴重庆初中毕业。他做好打算，如果儿子只能考上埭头公社所在的莆田第十一中学，不如早早回家养鸭。但吴重庆考取了位于市区的莆田市第六中学，夏天的末尾，他亲自带着儿子先搭汽车再换汽船，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抵达城区求学。四年后，吴重庆被中山大学哲学系录取，吴家“读书人”的传统有了延续。

如今，在吴重庆二哥家正堂上方最显眼的位置，还挂着去年他的儿子和二哥的孙女考上大学时用以庆贺的两幅红纸题字。吴重庆告诉我，家里这一代的子侄们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不少人还在读研究生、读博士。有他做参谋指导，如今吴家仍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书香门第。

1



2



3

1. 在已有 700 多年历史的莆田云门寺里，信众可以享用素斋
2. 孙村东南一公里左右的“九山白云洞”是近 30 年来出现的新祭祀场所
3. 在民间信仰活跃的埭头半岛上，崇儒尊孔的“三一教”颇受欢迎

3. 读书人的传统

说起来，吴重庆对老家的研究兴趣也是从父亲开始的，“如果人的心真的是一块田，那时已经有种子在里面了”。

1991 年博士毕业后，吴重庆进入广州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工作，两年后，他和几位同人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岭南文化时报》的报纸，这虽然是张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却有不小的影响力，也成为“边缘人”吴重庆在大世界里确认自我声音的一次尝试。

五年后，报纸因故停刊。吴重庆回家过年时，没和父亲聊起自己遭遇的挫折。父子俩还是延续过去的交流模式，儿子为父亲沏茶点烟，两人话都不多。入夜，他在寂寥中打开吴玉森白天给他的莆田县地图，上面一个个熟悉的村名，忽然唤醒了他儿时煮茶旁听时的不少记忆。这些年，他曾和朋友做过一些农村调查，也一直对费孝通和林耀华笔下的故乡村落很感兴趣，如今，他在离乡多年后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起点，也决定对这个无比熟悉又陌生的家乡做个深入研究。莆田的传统的宗族社会里，姻亲关系就是连接地图上那些不同乡村的线段，儿时的吴重庆也是借由这些村庄中的“外来者”，才得以明白孙村之外世界的复杂样貌，他想起邻居的那些或全职或兼职的媒人，决定从他们开始“访谈”。1998 年冬天的这次“通婚圈”调查，最后成稿《社会变迁与乡村通婚地域的伸缩》发表在次年的《开放时代》杂志，成为他的第一篇关于家乡孙村的调查报告。

2005 年，吴重庆过“五一”假期回家时偷偷拿了个 MP3，向父亲吴玉森提议做一次“正式的访问”。父亲疑惑，“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就能录进这么多话？”他肯定地回答，但后来却因为转存失误，丢失了近 10 小时的口述录音。3 个月后，他带着老式录音机和磁带再回孙村，并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通过 10 多次访问，详细记录了一份来自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这份记录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著作《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中。在后记里，他记录了在父亲身体不便的最后两年，自己在元宵节游神时作为“乡老替”代替父亲捧香跪拜的经历：“在娱神的唢呐声中，在双膝点地的瞬间，才觉得是真正触及家乡的大地。”

在经历过更广大的世界，“吃过更多的盐米”之后，父子俩以不同的形式在故乡重逢，父亲的历史上终于又叠印上了他的。那天离开老宅前，同事张雷提出想给吴重庆在那个通风的小窗口旁拍张照。连接两层楼的木质楼梯很窄，如今身高一米八几的吴重庆要上去必须得躬身了，很难想象他曾经是如何与兄弟们比赛着顺扶手滑下。40 余年过去，那个大家争抢着要挤过去的通风小窗也被邻居新起的高楼挡住，再也看不见大海，起身顺着墙壁定睛再望，神龛边挂着的变成了父亲的遗像。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一书前后写了 15 年，吴重庆本想早点让父亲看到书稿，好请这位“乡老”确定他笔下的孙村有多大程度的差错。但就在书出版前的一年，吴玉森去世了。

4. 贫瘠的海边

“杜苏芮”台风并没有给孙村带来多少影响，那几天，莆田市区降下超过 500 毫米的特大暴雨，但地处海边的孙厝只下了两天不大的雨，刮倒了几棵树。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地气候的“反直觉”，吴重庆告诉我们，“界外”虽地处海边，但常年降雨量少，水资源奇缺，加上盐碱地多，土壤质量差，村民们只能靠种植番薯花生之类糊口。儿时趴在老宅的窗口向外望，他感受到的“不是对大世界的向往”，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辛苦”，“夏天很热，农民们都在干活”。

从土地中得不到回报，人就只能向大海讨生活。孙村东北和西南角分别有两湾当地人称“前海”“后海”的海滩，但大海并未提供足以养活乡民的渔产。前者自清朝就是福建最大的盐田，后者则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围垦成渔场。民国时期，盐场被地方军阀把持，当地居民苦于谋生，只好冒险从盐场偷出“私盐”倒卖，这些人因此成了孙村最早的货郎。他们离家前要背上一二百斤的私盐，一路贩卖，抵达二三十公里外的莆田



城区后，再于次日背着城里的物产返乡，这些肩挑私盐和货物的货郎们形成市场，被称为“肩头店”。

困守在家显然不是办法，村民们只能离乡谋生。它们走上了长期存在于莆田沿海地区的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外出经商。吴重庆在书里介绍，“界外”居民长期具有一种“流动型兼业”传统，“流动型兼业是家庭主劳力承担副业，即男主外当流动货郎或游走四方的工匠，又被称为‘男商女耕’”。其实，吴重庆的两位哥哥也曾是现代“货郎”中的一分子。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维持生计，家里大哥二哥每天都要从生产队进货，到附近的村庄兜售莆田米粉。大哥骑一辆车到离家较远的霞屿市场，二哥则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每天能卖 1 元钱”。

7 月 27 日下午，吴重庆带着我们从孙村向西南方向出发，前往 3 公里外的“前海盐场”。台风即将来临，天气忽晴忽雨，越接近大海，云在天上走得越快，山头的电力风车隆隆然。坐在车里伸出手，我忽然摸出风有点黏，眼镜也沾上细小颗粒，起初还以为是错觉，直到我们看见了盐田。

“盐田”确实也是“田”，一大片一大片开阔平整的土地，被分成大小接近的小格子，海水从前海被引进来，再蒸发，析出细细的盐粒。每个小格子上都有块黑色毡布，有的平铺好用红砖盖牢，有的包成土丘状，毡布缝隙里漏出的就是这



左图：台风前，前海盐场上的盐工

右图：新建的“黄金珠宝小镇”附近，北高镇的老街依然保持着30年前的模样

块田地的产出物。有的地方盐粒倾洒出来，人走在上面如同行在雪地。在大片盐场中，只有零星几间石头垒成的二层小屋，吴重庆说，那些整齐划一的小屋是国营盐场的遗存，也是盐工的住所。

在吴重庆的记忆里，这里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去学校的路上，总要和相熟的同学们站在田埂往后海方向看，直到望尽所有白帆，还是逃不过上学，只好拼命往学校方向跑。后来，他才知道，那些白帆是开往福清方向的运盐船。

东峤盐场是福建省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后，盐场国有化，这一带的渔民们都成了盐民，他们有了固定工作，成了产业工人，比寻常村民高出一等。吴重庆印象里，盐工们虽然辛苦，但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关于他们的回忆和常年在霞屿市场摆摊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来市场帮大哥推车，大哥带他在街边店吃了一碗卤面。村里人要办红白喜事，办酒席时才会到这里购物，“盐工们不种田，什么东西都从外面买，就在工人文化宫前形成了固定的日间市场，那时的市场热闹极了”。

2023年，这个台风将至的下午，盐田上的工人并不多。10年前政府已经放开盐业专营，如今县道两旁随处可见成规模的食盐公司，他们会对回收的粗盐进行深度加工，或者将它们直接运走腌制海带。盐工们成了真正的雇工，不得不承受暴晒、海风的侵袭，赚得不多的收入。我们在盐田间停下车，下午日光正毒，远远望见有人蹲在田里，几个人还以为是有人在偷盐，走近了才知道是一位蹲着补毡布的女盐工。她告诉我们，自己和丈夫共同负责这片盐田，平时就住在路旁的小楼里，食盐有腐蚀性，毡布常被镂出一个个小洞，因为担心明天台风把盐刮跑，她不得蹲不在烈日下细心把小洞补上。行前，她带我们去那栋种着木瓜树的小楼边歇脚，我这才看清她的脸，粉红



曾经兴旺的霞屿市场上，退休的盐工聚在一起饮番薯酒

的遮阳帽下，她不过40岁上下，整张脸还是被晒得又红又黑。

沿着盐田的堤坝返回，吴重庆决定带我们去寻找霞屿市场。进村后，我们找了两圈才找到市场前的空地。吴重庆确认了好几次，认出工人文化宫东侧的一片荒楼，大哥就曾经站在它门前叫卖。近些年不知是地面抬升还是楼体下降，土黄色的楼看起来一半陷在地下，文化宫大门紧锁，广场也被一座民居占掉三分之一。几位有些年纪的村民坐在街边喝番薯酒，我们上前搭话，他们一眼可见曾是盐民——所有人的脸都不同寻常地黑，角膜发红，是长期暴晒的结果。吴重庆用莆田话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行前，一位盐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们早就不再从事盐业，虽然那是“自古以来的生计”。

5.“打金”的人

除了贩盐贩货，孙村当地还有另外一种“兼业”传统，即“男匠女耕”，子女众多的家庭为了省出口粮，接济家用，父母往往会安排家里的未成年男孩学一门手艺，如铁匠、木工、石匠，他们成人后就会成为村落间的流动工匠。这些“副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都未停止，这些工匠和商贩们只需要向生产队缴纳一笔“副业金”，就可以继续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改革开放后，正是这一“男匠女耕”的副业传统彻底改变了孙村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在距孙村3公里外的埕头村，一位名叫叶先锋的匠人自创黄金首饰加工手艺，专门为人制作嫁妆金饰。村里人偷师后，金器加工逐渐成为一项新兴工匠技术，孙村男孩的学徒专业也在“打铁”“打石”之外增加了一项“打金”。但由于黄金加工技术精细，这项技艺并未形成主流。直到70年代末，几位孙村的铁匠发明了铁制模具（“铁模”），金液一体灌注成型，使“打金”的从业门槛骤然降低，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行业在以孙村为中心的3个乡镇迅猛流行起来。

市场日渐兴旺，金匠们离开家乡，到珠三角和福建其他城市开设“打金店”，武盛村（孙村的上级行政村）一带开出的模具厂负责生产模具，推销员们就背着“铁模”坐客运大巴去外地的金店推销，再将外界流行的式样信息带回村中，生产新的模具。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者们又将“铁模”升级成“石膏模具”，新模具质量更轻，携带更方便，孙村人的打金店也就从福建一路开到了中国的北方。

借由蓬勃兴起的“打金业”，模具厂、打金工具厂、银饰加工厂，甚至包括长途客运在内，与金饰加工相关的一系列产业链在孙村聚集，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已经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元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

7月27日上午，吴重庆带着我们在武盛村的“九龙山”（旧称“鸡笼山”）顶俯瞰整个埭头半岛。站在山与海包围的这片半岛上，任何人都会感受到它的蓬勃气势。黑云中，前海的海岸线上白色风车伫立，视线拉近，山峦之间，动辄四五层高的民居密密麻麻填满了整个半岛，这些建筑形状风格各异，多以大理石和反光玻璃作外立面，比起小镇，更像是个独立的县城，山脚下甚至有片区正被开发成楼盘待售。吴重庆指向西北方向，“那边就是北高镇，那里也是最主要的‘打金业’聚集地，现在政府在那里开发了一个‘北高黄金珠宝特色小镇’，如果你从这儿转身往上塘村走，就是‘上塘银饰小镇’，我开玩笑常说，这条连通两座小镇的路应该叫‘金银大道’。”

下山后，我们在装修一新的武盛村委会楼下遇见了正在村里“度假”的刘力。他是武盛下属的北渚村人，就住在孙村隔壁。“我们这儿那时候是名副其实的明星村，全国各地的人都涌到我们这里来。”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曾经是“模具推销大军”中的一员。父亲经销模具，到他这一代，就成了真正的“打金人”。17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的他第一次离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辽宁省沈阳市姐夫的店里学习“打金”手艺，“打金是手艺活，又是和黄金打交道，外面的人一见面就叫声‘师傅’，让人觉得很受尊重”。姐夫教得毫无保留，一年学成后，他又到了四川省武夷山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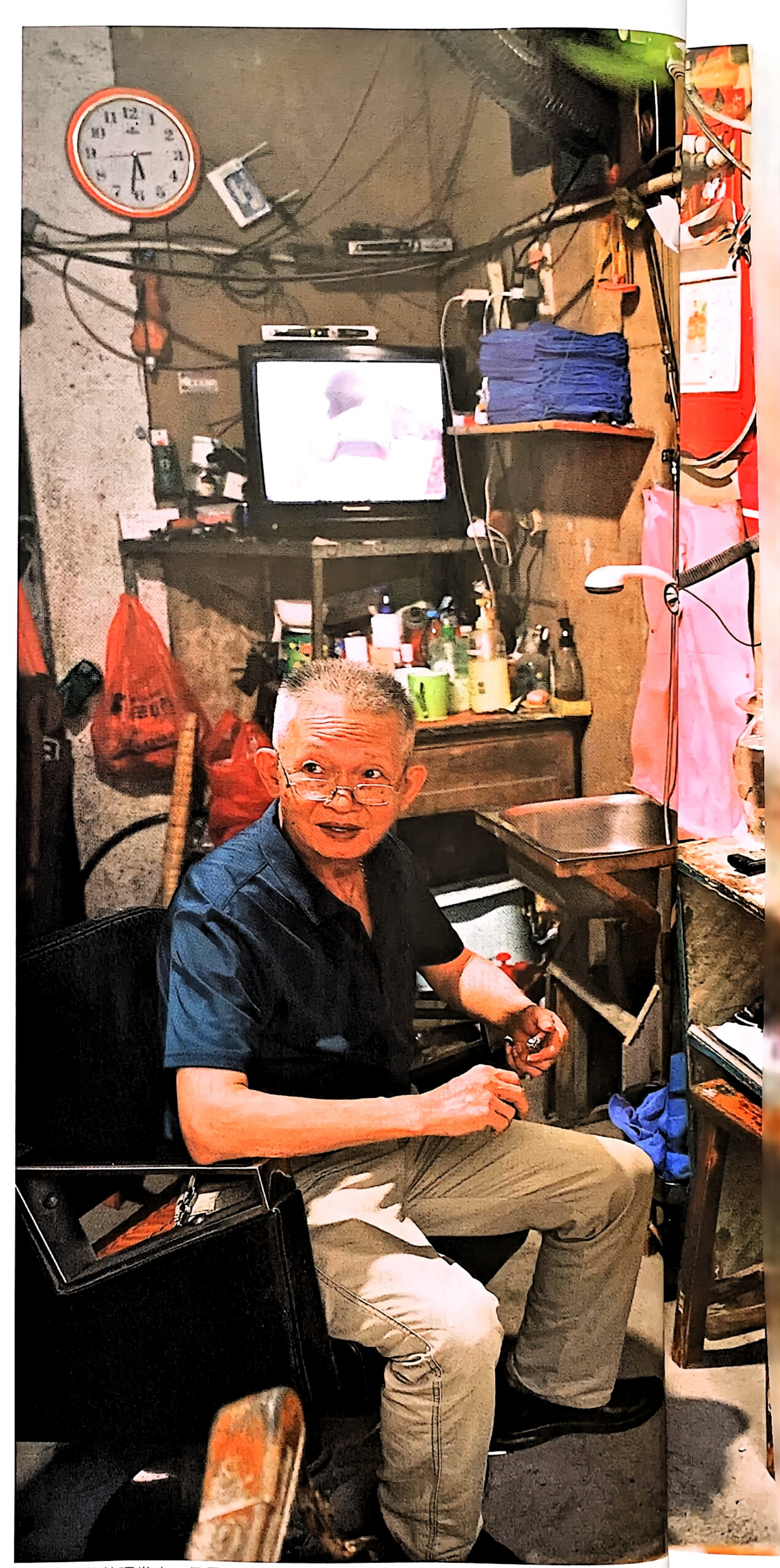
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打金店”。武夷山这城市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当时他有位堂哥正在四川省乐山市卖模具。一年后，姐夫盘掉了沈阳的店铺，也来投奔刘力，一起赚钱。

像刘力一家的这种亲友之间的“同乡同业”关系，被吴重庆视为孙村人能迅速占据“打金”市场的制胜关键：“在此特殊的人际背景下，师傅并不把徒弟视为雇工。师傅不仅在短时间内教给徒弟关键的技术，还帮徒弟寻找合适的店面，无偿借给生产工具和少量资金，助其快速另立门户，在各个微型的非亲即故的亲缘关系圈中，共同致富成为共识。”在研究中，他用“经济关系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嵌入关系”概念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乡村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宗族和姻亲关系，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中的各项成本，尽管他们并没有有意挤压排斥外来者，后者也很难涉足其中。

刘力告诉我，他学成后，带出的第一个徒弟就是自己当时刚过门的妻子，拿着父亲资助的创业资金，他们夫妇先在武夷山盘下一个不到 30 平方米的小店，既在里面工作，也在里面生活。他们到的时候，市里已经有两三家黄金加工店，也都是“界外”亲友开的，大家互相帮衬，并没有严格的竞争关系，平时谁家缺合适的模具，也会互相借来借去，“白天工作完，晚上关了门就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虽在异乡，感受到的关心和支持却有增无减。

2003 年，国内黄金原料市场开放，孙村人的这些“打金店”又迅速地转为金店，之后又加盟不同的黄金珠宝品牌。如今，刘力在四川开有三四家黄金门店，他的一个姐姐在广东做珠宝生意，最开始带他“入行”的姐夫仍和他一起工作。他的父亲早已赋闲在家，自今年端午节回乡看望老人，刘力就一直没再回四川，他告诉我，店铺一切都在正轨，不需要多操心，如今他是武盛村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一分子，留在村里还能“多做点贡献”。

27 日晚，“杜苏芮”带来的水汽横扫武盛村，我们开车往市里行，入夜后的武盛村只有风吹树枝的响动，村道上既暗且静。村里大部分的模具厂都已经转做其他贵金属相关业务，30 年前建起



北高镇的传统理发店，仍是吴重庆记忆里的样子


营业执照
25元



当地政府在北高镇规划出了一片黄金珠宝特色小镇

的厂房如今也都空着，但几次转弯，我们依然能看见村里几家大厂的灯牌，想象这条路曾有过的车水马龙，它们延伸出的道路，已经从这个边陲小村辐射向全国。

2000 年左右，吴重庆带着几个外乡学者朋友回家过年，入夜，整村烟花绽放，朋友们看得“大为感动”。“他们不是为景观而激动，而是发现农民也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小山村里，农民愿意花一两千块钱放烟花，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了一点钱，生活改善了，翻身了。”吴重庆停顿了一会儿，“这个地方的人原来都是很困难的，现在他们不靠进厂打工，也没有被当成一个什么廉价劳动力被卷入城市，不受什么人的剥削压迫，这一切都是他们辛苦干出来的。我们过去总说资本主义经济‘没心没肺’。那如果能有一点点不同的经济形式出现，我就会比较想去肯定和传播它。所以，如果说我对莆田有情感认同，就是基于同乡同业。”

6. 好给人“勘带”

到孙村第一晚，吴重庆留我们在二哥家吃饭。二哥早年做过厨师，能做一手地道的莆田菜。炸荔枝肉、炒米粉、蛤蜊汤，菜一道道端上圆桌，他依然在厨房忙个不停。吴重庆告诉我们，大哥和二哥虽然早已分家，但因为同在一院居住，一家人依然会聚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有其他同族们临时加入，也并不稀奇。

说着忽听屋外摩托车声响，果然来了客。原来是吴重庆家前院住的一位发小，听说他回乡，特意来找他聊天。发小姓林，像是刚喝过酒，坐下来亲亲热热地和“吴教授”用方言聊天。过了一小会儿，我们才得知，他是一位在江浙做石料生意的商人，现在主要承接陵园工程。行前就知道孙村到处是“老板”，没想到这位卷着一条裤腿、随意斜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聊了一会儿，林老板又乐呵呵地骑着摩托车往夜色中去了。吴重庆告诉我们，时值暑假，村里的人不算多，还是因为他们一家回乡，亲友们才从各处赶来聚一聚。赶上寒假和春节，二哥家的门厅里才真正是挤满了人。村里调转不了车头的小道上停满各式各样的名牌轿车，从车里走出来的人们衣着光鲜，穿金戴银，那时的孙村，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象。

我们只能凭借遍布埭头半岛的那些形状各异的民居想象孙村春节的盛况。回乡盖房，是“界外人”发达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刘力家的房子是2005年就修好的，那是他在四川开出金店的第二年，四层小楼，一共1000多平方米。和他一起“打金”的朋友们也大抵如此，从市区开往孙村的县道两旁，动辄四五层的小洋楼密密匝匝挤在一起，大理石立面、古罗马立柱，佐以绿色反光玻璃和红瓦屋顶，同事张雷是摄影师，他说这儿可以开个“中国奇异建筑博览会”。

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不同，“界外人”回乡盖房，除了表示衣锦还乡，改善父母居住环境等目的，还有一重意义是给人“勘带”。这是一句莆田方言。按照当地习俗，新娘子娶回家，要有一个认亲改口的仪式，主持人向她介绍婆家的亲眷，大哥大嫂、姑姑舅舅，一一叫罢才算进门。这个仪式就叫“勘带”，是个“定名分”的过程。吴重庆解释，在当地的社会关系里，“让别人看见，有个称呼”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比如你人生不如意，别人看见你也有点别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定位，就没法‘勘带’”。

“给人‘勘带’”，一部分是出于实用目的。吴重庆告诉我们，这是那些依靠宗族关系致富的“打金人”们维护亲缘和熟人关系资源的方式，这对他们未来的生意也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在村庄中盖新房，意在向全村表明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孙村的一分子，透露了在外漂泊的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内在认同”。这之后，每当我再看见那些形状怪异的建筑物，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个写好位次的名牌。通过它们，这些在全国各地“打金”的生意人们，各自在家乡的关系网中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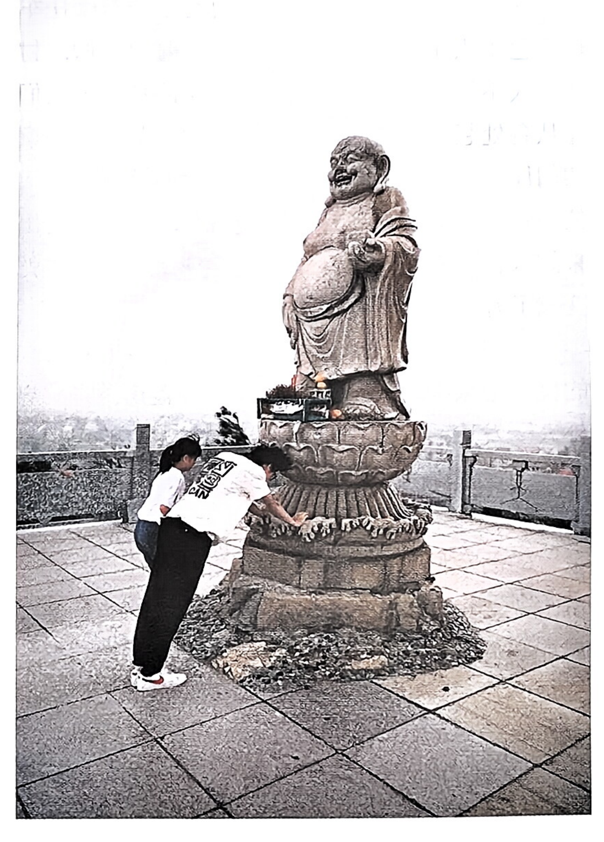
如果说在地上建立房屋是留给现世的名牌，那么在重大节庆时参与村内民俗事务就可以算得上是对神的奉献。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莆田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对特殊的泛神崇拜正是作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当地人通过祭拜神灵获得心理慰藉，也扩展着家族和地域的时间与空间，进而成为熟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分子。

去九龙山的路上，吴重庆指着村里的一处田埂说：“过去，那块地方被称为‘龙脊’。”他听父亲说，过去村里有一位从仙游县来的风水先生，说孙村是龙穴所在，村前的两座祠堂为“龙眼”，祠堂前的池塘是“龙喉”，祠堂前的巷道通向村中戏埕，称为“龙舌”。在这些村庄中的公共建筑里，最重要的是处在“龙尾”位置的永进社，龙尾一压，全村的气运也就稳了。吴重庆介绍，永进社全名“合浦里孙厝境永进社”，这里的“合浦里”不是行政区划，而是附近一座名叫玉蟾宫的神庙所辖的范围。次级名称中的“孙厝境”，除了确切的地理疆域，其意涵更像是《红楼梦》里的“天仙宝境”，是一块划归神明的地界。每年正月十一是孙村的元宵节，社内主神需“绕境巡游”，凡被巡视过的“境”，都属于这位主神庇佑的范围。由此，村民们在世俗身份外又都拥有了一重神圣的身份。

我们到永进社的时候接近晚饭时分，附近没什么人。这个村庄中的神圣所在远看相当朴素，像是一间寻常民居，灰色砖石垒成的外墙，仅窗口有花砖装饰。社门前空地上方搭了个彩钢棚，感觉适合晒谷。看起来，这神社并不刻意让自己显得高高在上。只有正门口那个一人多高，被熏得乌黑的香炉提示我们其香火鼎盛。一年过半，神社里还依稀残留着近年元宵节游神的痕迹，接神时助兴的炮铳立在墙角，香炉里攒满香烛灰烬，神庙顶部高悬的黄色油纸灯也是游神后挂在这里的，上面用大红字写着“平安”。

自孙村“打金”业兴起之后，每到元宵节绕境巡游和杨公太师神诞日，这间不起眼的神社就成了全村的中心。返乡的“打金人”们既想在神明那里求得庇护，又想在熟人社会里出头，对神社活动就越发积极。吴重庆介绍，以往元宵出游





左图：形状各异的民居遍布埭头半岛

右图：人们爬上九龙山顶，向弥勒像祈福

时每家每户给的“压岁钱”只有一二十元，现在已经翻了百倍。如果赶上神诞日，村民们还会回乡大摆宴席，雇佣戏班表演“娱神”。

在孙村，村民与神明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崇拜，倒像是达成了一种长久的默契合作，或者用吴重庆的话来说，也是“实用”。当地颇有家庭因为祭祀后家运仍然不顺，愤而砸毁自家香炉神像，另投其他神祇庇佑的传言。此外，有些神明的供奉还有特殊讲究，一旦迎进门，必须全年香火不断，给家中的妇女带来许多麻烦。吴重庆在早年的通婚圈调查时就发现，这种设有特殊神坛的家庭，子女求亲往往相当困难。

但即便有这许许多多的掣肘，真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刻，这些亲切的神明仍能为当地人提供慰藉。在孙村东南一公里左右的“九山白云洞”是近30年来在孙村一带出现的新祭祀场所，这里的“主营业务”名为“谢恩”。说是“谢恩”，整个仪式的过程更像是还愿和“赔罪”。吴重庆告诉我，当地人在生活中遇到不顺求助灵媒，会得到“之所以现在遇到不顺，是因为你祖上‘有恩没有谢过’”的回答。这时，村民就需要筹备一场隆重的仪式，身穿破衣、戴上赦枷在白云洞的神庙间乞讨、进香，以求神明宽恕。整个活动往往要延续数天，耗资上万，动用几个家族的力量，才能使生活不顺的人获得心灵的安慰。那天在白云洞的谢恩仪式捐赠单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位刚来孙村时遇见的“打金”老板。尽管我们见面时，他整个人乐呵呵的，但吴重庆说，因为这两年他家生意不顺利，又遇到法律上的麻烦，就在前阵子，他家刚刚完成了一次“谢恩”。

7. 公共事务复兴

2022年春节，一位吴重庆家附近的邻居到永进社进香，闭目焚香结束，烟雾缭绕间，头顶的纸灯笼突然原地旋转了起来。他大为惊骇，连忙拿起正殿感应台上的“筶杯”占卜，占卜结果是：村里应该重新修缮永进社。

“其实他早就在心里预设好问题了。”吴重庆向我们解释“筶杯”的占卜方式。“筶杯”分左右两个，合扣成一对。元宵游神乡老祈祷时，要通过它们来与神明沟通。往往是由他先提出一个“是或否”的疑问句，然后离地一米处抛出“杯”，如果两杯一阴一阳，即为“圣杯”，连续抛出三次“圣杯”，代表神明答“是”。因为“筶杯”抛出只能体现神明“是或否”的回答，祈祷者的发问就变得格外重要。邻居是吴重庆大哥的发小，当天到家里喝茶，就把这桩奇事告诉了吴家。大家没有说破，这位邻居一直在云南做首饰生意，但近些年事业不太顺利，这或许是他想重修永进社的潜在动机之一。

但最终村里人还是通过了他的提议，既是因为畏惧神意难测，希望祈求平安，很多在外经商遇到瓶颈的人们，也正想借此机会在村里继续累积社会资源，“民间信仰并不仅仅是个人什么迷信的问题，它也是一种参与塑造社区舆论的力量”。但要怎么修，是否要拆了重建，村民们的意见分成两派：一派希望把永进社拆掉，原址重建一座钢筋水泥的二层建筑，另一派如吴重庆一家，则希望修旧如旧，在现有的结构上调整建筑式样。作为村里“见过世面”的知识人，吴重庆的意见占据了主流。

2022年夏天，他特意从广东邀请了两位建筑师朋友到孙村实地勘探，经过讨论，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永进社改造计划：到时，他们将在永进社前加盖山门，使得前后两间殿被围成一体，现有神殿上方的彩钢棚也会被拆掉，场院里将留出一大片用于仪式的空地。“广州的设计师会在里面加入一些相对现代的符号进来，原有神庙结构保持不变，到时候做出来会非常有意思，会非常有张力，吸引很多人来参观，正好，其实神明也很喜欢热闹。”吴重庆说。

其实，修村口那块“孙厝”牌坊，开始也是因神圣事务而起。吴重庆告诉我，靠近村口那家人常年供奉一座佛坛，为作挡避，2020年，他们向同宗的几位亲戚提议在佛坛前修建一道影壁。吴重庆当时正在家中过春节，提议不如把影壁修成一个地标式的牌坊。七八家同姓宗亲同意参与募资，在微信里拉个小群讨论工程事宜，又托家里在江苏做建材生意的年轻人帮忙设计建造。待牌坊修好，他们又觉得它和村口的小桥不太搭配，桥太窄，还没有护栏，于是又扩大募资范围，共同翻修了村口小桥，再接下来是连通小桥的乡道，这次全村的年轻人都参与了募资。项目多出来的钱，他们又陆续翻修了村西的另外一座石桥和乡道。

整个项目持续了近两年，谁都没有想到，小工程最后成了大工程，村民们的自发组织，居然建成了过去村委会都办不成的“大事”。最后项目仍有余款，他们还用这笔钱恢复了村里的三眼水塘，那是在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就被陆续填平的乡村微型水系，有了它，村民们栽种的番薯花生才能得到自然灌溉，最原始的集体记忆也得以慢慢复活。

这些开支款项的细节，都公布在永进社北边墙上的红纸上，上首三大张，分别是：孙厝境永进社癸卯年元宵收丁、户款项公布；癸卯年元宵福首炉挂豆；孙厝境永进社癸卯年四月廿六杨公太师寿诞收付公布。这些以元宵节、社公寿诞等名义收来的款项，最终成为村里的公益基金，在神明的“监督”下，变成了村里的小路、桥梁和水渠。在神前许下的愿望，终于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人的生活。

这次修“孙厝”牌坊，其实是吴重庆第一次直接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身为走“另一条道路”的读书人，他并没有明显的给人“堪带”的欲望，也一直没有在村里建新房。但这次，他不仅在修牌坊时帮大家提供意见，参与设计，还在筹资时特意问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吴形而，“你要不要捐款？”

也是在修建牌坊和路桥的两年间，吴重庆发现，那些外出闯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往往要比

他们的父辈更明理，也愿意为公共福祉出让个人利益。因为参与者很多都在外工作，他们日常都通过微信群联系。这在客观上反倒帮助他们绕开了较为顽固的老年人。“他们有人听说了就不高兴，嫌我们不作请示贸然行动。也有人出来搅局，但我们大家也不管他，只到家里找他们的儿子谈事情。最后虽然也有人因此闹得不愉快，很多人到现在互相都不讲话了，但我想这种自组织拓展出来的公共性，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乡村主体的一部分中青年也确实在回流。7 月 29 日，我们在武盛村参与了一群吴重庆的同龄人们的小聚会。饭局就设在村支部书记黄金鑽家里——一栋自带电梯和会客厅的小楼。黄金鑽的父亲坐在上首位置，他是当地一家知名模具厂的创始人，60 岁上下年纪，头发染得黑亮，指间佩金戒，名牌腰带上挂跑车钥匙，不苟言笑。老黄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把家里的银饰公司和电子衡器厂分给两个儿子打理。但在 2020 年，小儿子黄金鑽突然提出要参与村里的支部书记竞选，两父子一度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当天席间玩笑起来，老黄的态度已经软化不少。黄金鑽上任后，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搞“改革”，武盛村下属的几个自然村都成立了“乡村振兴项目组”，他们还在村里做了“村民议事厅”，商定公共事务，调停处理乡民内部纠纷。当天席间一半以上都是村里“乡村振兴项目组”的成员，听他们夹杂着莆仙方言和各地俚语的普通话，我才知道，他们也都是“一代”或“二代”打金人，聊起过去“跑社会、打戒指”的经历，大家一笑置之，现在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村里和儿孙辈身上。刘力告诉我，仅在 2022 年的一次“春节茶话会”上，武盛村里的年轻人就募集了将近 300 万元，现在，他们的大计划是要在那座九龙山上修建一座“城里才有”的公园。

8. 缝隙之间的年轻人

在二哥家吃饭的那天晚上，吴重庆特意开了一瓶朋友送的意大利葡萄酒，叫来几位子侄坐在桌边。他向孩子们介绍了我们的来意，又像所有威严的父辈一样提出要求，“今天有客人来，大家都‘提’一杯吧”。坐在桌边的孩子们不解，“什么是‘提一杯’？”吴重庆像老师一样讲解，“敬敬酒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少年们感受到压力，不好意思地笑着，依次举杯说了几句客气话，红着脸夹了些菜，笑闹着到楼上去吃了。

吃完饭，我们从鬼神聊到宗族，我向他发问，“可是你不会觉得这些传统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束缚吗？”

吴重庆点头，说，关于宗族家庭关系网络的众多说法中，自己最欣赏人类学家林耀华的描述：“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崩溃混乱”，“关键是平衡。当然我们会从平衡关系中看到控制，看到约束，但它一定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支持、连接和帮助。”

我没有被他完全说服。除了像他一样的“60 后”，身处这位次和角色安排如此明晰的社会之网中，年轻人们会感受到什么呢？吴重庆提议我们可以一起去市区的“疯灯”书店看看。“疯灯”是音译，在莆田当地方言里是“疯疯癫癫”的意思，朋友圈里，他将这间小书店称作“莆田的文化地标”，“这是一批我回到家乡后愿意去接触的‘在地’年轻人。跟他们这批人的交谈中，我常常觉得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到书店那天是 7 月 30 日，我们一路驱车往北，抵达莆田老城的双池巷。穿过巷口的肥硕芭蕉，在一棵开得正盛的巨大三角梅下，陈建雄和卓超贤已经在等待。陈建雄今年 30 岁，在市委的机关报《湄洲日报》工作，卓超贤是位“00 后”摄影师，去年刚刚大学毕业。他俩是这间书店的 12 位股东之一。2020 年，他们和其他 10 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职业的莆田人共同盘下这间小店，作为大家相聚的一个小据点。

也许因为我是外乡人，一走进“疯灯”就强烈感觉到它的“莆田气”。台风刚过，三角梅的花瓣落满小院，屋里摆着城里各处淘来的旧家具，墙上是莆田特色的红蓝两色彩布，挂着龙舟桨板，

书架上是介绍当地文化的书籍，隔间上摆了一排我们在神庙见过的纸糊灯笼，写着“平安”“福首”“壶山兰水”。这里的“壶”指壶公山，“兰”指木兰溪，是莆田的名山大川。屋里有一股幽深湿润的味道，这地方让人舒服。

进屋坐下，他们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和茶叶，“自己泡茶吧，茶叶放在里面就是冷泡茶了”，这让在“界外”待了几天，见惯各种不同形式茶盘茶海的我有点不适应。后来陈建雄告诉我，他们是实在不喜欢那一套繁文缛节，才开发出了这一套“简易泡茶法”。

有所保留，再加点年轻人的创新，那天我在“疯灯”里见到的一切都和“冷泡茶”原则类似。说是书店，这儿其实并不卖书——或者说并不“营业”——更多时候只是个朋友们相聚喝茶的文化空间。陈建雄随手点开幻灯片，展示他们开店以来办过的几次小活动：元宵节一起“庆赏元宵”，端午采香草、包粽子，中秋赏月，年末“尾牙祭”。这些活动既与莆田传统乡俗有关，又不完全类似，比如他们会满城到处找哪位师傅做的纸糊灯笼最地道、哪家的“丁饼”最好吃，但并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忙于定立福首，游神祭祀。

陈建雄告诉我，和自己同龄的莆田人大抵只有两个去向，要么离家不再回来，要么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莆田。书店的“十二股东”中不少都是从外地回到家乡的莆田人，其中一个朋友甚至是被父母用“祖宗托梦”的名义硬留在了老家。人留下来，自然想着要找些精神寄托，所以才凑出了这么一间店。开始大家“并没有要刻意营造某种风格”，如果一定要说这里很“莆田”，恐怕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本来自带着这些东西”。

陈建雄是湄洲岛人，在同龄人里，他对故乡的感情实在称得上异数。见面自我介绍，他笑称自己来自“妈祖那个岛”。他





上图：陈建雄（后）和卓超贤站在“疯灯”书店门口

下图：从“疯灯”书店二楼窗口向外看，三角梅开得正盛

出生在那里，还没懂事就被做木材生意的父母带到上海，闵行区一个大木材加工市场，里面都是莆田人。到了学校，陈建雄发现自己是绝对的少数，人人都说着听不懂的上海话，年幼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何谓“排外”，每年寒暑假回莆田，返程时都哭得泪汪汪。

他开始对家里的那些属于“莆田”的符号产生兴趣。湄洲岛人外出经商，身边总要带上妈祖神龛。陈建雄说，自己的一个伯伯去山东做石料生意时，甚至在海边给自己雕了一个小小的妈祖庙。在家见父母有事没事都向神位祈祷，陈建雄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卜杯”。他还迷上了中央台的《走遍中国》，日夜盼着节目组能录一期莆田的节目，后来节目真的播出，他又开始对着电视自学莆田文化，研究莆仙戏的唱法。

熬到小学毕业，陈建雄终于如愿回到莆田读初中。“当时我幻想着我要回到家乡，就像去拥抱一棵大树，我要去亲吻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但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我也很难说清。”这话听起来太过于抒情，陈建雄有点不好意思。

大学毕业后，陈建雄在市里找到工作，又在莆田成家。他告诉我，湄洲岛上的老宅新建时，一开始就建好了他和哥哥两家人的居所，那是属于他们的位置。

但大部分时候，陈建雄住在莆田市里。我拿出那晚同样的问题向陈建雄发问，他说：“在成家之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束缚我的，但可能是我被‘洗脑’得比较彻底，结婚以后，我发现这个规则在保护你，让你的生活变成一个很有轨道的东西，它不会让生活中出现那么多闹心的事，但也把你变得很无聊。”

“也就是因为觉得城市太无聊，我们几个才想着做‘疯灯’。”记得刚从上海回到莆田，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这里的“文化时差”，上海 2000 年就有的 7-11 便利店，在莆田出现要等到 10 年之后了。更明显的是，年轻人的生活目的已经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我和陈建雄谈起莆田的生子和祭祀传统，他表示很能理解“死后需要有人给自己烧香”的愿望，但放在他自己身上，还完全没有考虑过



生育问题。当然，这是陈建雄身为家里的小儿子，在缝隙中享受到的一丝特权。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正在苏州做生意，结婚后已经生了三个子女。

那天下午在书店闲坐，陆续来了几个住在附近的莆田年轻人，一看就是书店的熟客，他们一进门就把包搁在椅背上，坐上长凳吃起花生。一位 1990 年出生的客人今年刚当上父亲，我问他妻子生了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妻子怀孕时，书店里的一群人还仿照传统给他们办了一场“求子仪式”，陈建雄表演，一群人笑闹着看他“施法”。在年轻人里，他们把这种并不严肃的祈祷活动自嘲为“搞迷信”。“那如果生出来是女孩呢？”我追问。“我倒是无所谓，可能我父母会比较介意吧，也许会再要一个？”

在传统中寻求认同和宽慰，有时也伺机逃离，在网络的缝隙里寻找个人的喘息之地。这群年轻人的态度，让我想起吴重庆所讲的“微妙平衡”。

那天下午聊到兴起，陈建雄还给我们表演了一折莆仙戏《状元与乞丐》的唱段：“漫漫古道儿




左图：几乎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的社庙

右图：建新房是“打金人”们在村庄中维护亲缘和熟人关系资源的一种方式

伴娘，戚戚哀鸣影凄凉，荆州遍地斜阳里，心神交瘁步跄跄……”即使看着手机上发来的唱词，也还是很难听懂他究竟在唱些什么，但我抬头时，见年轻的卓超贤一边笑，一边听得入神。陈建雄说，今年元宵节妈祖巡游，他还参与抓阄，加入了村里的游神鼓队，和一群村里的年轻人共同完成了仪式。“那是一个快乐的、热闹的活动，并不需要庄严和沉重。小时候单纯就觉得它好玩，长大以后你会觉得它是一种高级的东西，是我们莆田（人）内心里面长久的追求。”

9. 没有“老家”的人

那天去“疯灯”书店，吴重庆还带上了儿子吴形而和家里的几位侄孙。一群人在老城区的小巷里穿梭时，我第一次听到吴形而的自我介绍：“我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会说贵州话的福建人。”他面带遗憾地告诉我，自己虽然祖籍莆田，但并不会说莆仙方言。倒是因为小时候在妈妈的老家贵州住过一年，学会了当地话。有时候在外地出门打车，他还会以四川、贵州人的身份和司机搭话。

但老家一直是模糊的。小时候听父亲说起莆田，吴形而最感兴趣的都是他口中那些离奇的乡村鬼怪故事，上初中时读到《孙村的路》，也尽是挑里面有意思的部分跳着读。关于莆田最深刻的回忆是小时候回这里过年，元宵游神的清晨，一群孩子们天不亮就被鞭炮吵醒，迷迷糊糊被赶到楼下吃早饭，然后跑出门迎接队伍。按照传统，队伍里要有一位坐在轿子上的“金童”，吴形而看着他被人群簇拥着穿街过巷，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参与竞选。但除此之外，于他而言，莆田依然是一块陌生的、不确实的地带，充满了父亲的回忆和来自他人的“二手经验”。

“所以家乡就只成为故乡”，刘力也对儿子们有同样的担心。在他走南闯北“打金”的这些年，大儿子在武夷山市出生，在乐山长大，如今又和全家定居在四川省的其他城市，到北京读大学。带儿子回老家，他知道孩子不会说莆仙方言，也

不爱吃清淡的福建菜。他们的同学、朋友都是四川人，回到老家反而觉得难以适应，总是待不了几天就想回去了。他暗自感伤："那家乡的这些都停留在脑壳里头，成了一个户口本上的地方，还有什么意思？"

这些困扰也是吴重庆在中山大学发起"家乡田野"项目的初衷之一。比起学术研究，他更愿意将其称作一项"育人项目"。面对整整年轻一代"有家无根"的年轻人，他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一直是觉得我跟家乡是有联系的，跟村庄是有联系的，跟家庭是有联系的，我觉得这是支持我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了它们，很难想象自己个人的心理会出现很大的崩盘。"

"当然，个人主义是现在的主流文化，它推动了青年人的成长，也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造成很大的危机。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你面对问题、面对压力完全靠个人去解决，可能大部分人应付过去了，也有小部分人应付不过去。人越封闭，危机和压力也就越难摆脱，我们要不断去跟历史联系，跟社会联系，去跟家乡建立联系，跟自己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同辈同学建立联系，事实上就是要让人回到社会，回到那个网络中去。"

吴重庆有意识培养儿子和故土的联结，这些年每次回家都带上他，想让他和宗族的同龄人多点接触。高二那年寒假，学界好友、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带学生走访莆田的乡村祠堂，他让吴形而也参与了活动，也是那一次，吴重庆第一次意识到这一代年轻人和乡愁的距离。

乡愁的指向很具体，是他读小学时在广州住的小区。他出生在广州，从小在番禺区长大，在那儿的大型市民社区里，他的小学时光"没有五花八门的补课，没有花里胡哨的比赛"，课余时间，他整天和同学们绕着小区骑车，满大街疯跑。三年级时，有一次吴重庆在家问他要不要转学到教学质量更好的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吴形而头都没抬就回绝了。但到了"小升初"，父母还是决定带他去海珠区的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升学，为此，一家人还特意在学校旁边租了房。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吴形而都生活在怀旧之中。班级里的新同学都是"附小"的学生，读初中前就是老相识，他在学校里很难融入，回到家也感觉处处不便，一有时间，他就想着怎么赶紧回番禺过周末。他后来意识到，搬家"切断的不仅是我的人际关系，也是我在那一方小天地戏耍探索时慢慢长出来的根"。他将之称为"迷你版乡愁"。

那么，对于他，这个出生在广州的"00后"来说，莆田，或者说孙村又意味着什么呢？吴重庆希望儿子能从家族的亲戚网络中找到答案，每次回家都有意识地留出时间，让儿子和同龄人们待在一起。吴形而辈分高，许多同龄人都得叫他"叔叔"。小时候吴重庆大哥的孙女在广州读书，和吴形而同班，他向同学介绍这是自己的侄女，引起大家的好奇。吴形而告诉我，与其说是实体的"孙村"，不如说这些同龄的亲友，构成了他对家乡感情的重要一环。在那篇活动的总结论文里，他在文末写道："无论对于成长的城市还是作为'他者'的老家，我们若不断接受当地食物、节日灯食物的熏陶，不断和当地生活的人接触聊天，就能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扎根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

但和"老家"的联系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吴形而终于还是接受了自己会是一个"没有老家的人"。2022 年到兰州上大学后，他给自己拟定了那个完整版本的自我介绍——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会说贵州话的福建人。在这里，福建指的是他的祖籍，也是他父亲不断返回的老家，但那里并不属于他。他承认自己不喜欢吃莆田菜，也很难习惯当地的民俗，那里的热闹活动和密切的宗亲关系让他舒服，但他同时也喜欢母亲在贵州的温馨老家。

究竟哪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呢？他还没有想好，下一次怎么回答才能"不让吴老师伤心"。只记得 2022 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被封在学校里，某个深夜躺在宿舍的床上，打开手机听了一整夜的"广东省省歌"《海阔天空》，那一刻他发觉，如果一定要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接近"老家"的地方，起点依然会是广州，因为"那里是我父母的居所，也是我最熟悉、承载了最多美好回忆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力"为化名）

这一次股市救市的效果为什么不明显？

主笔 · 谢九

8月27日，财政部、证监会、税务总局等多部门集体释放利好，多箭齐发拯救股市。但是，从A股市场的反应来看，回应并不积极。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股市救市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呢？

从救市的具体措施来看，最引人关注的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宣布对印花税减半征收。从历史上来看，印花税救市都取得了不错的短期效应。尤其是2008年那一次对印花税从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当日上证指数暴涨9.5%，所有交易个股全部涨停，第二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再度暴涨超过7%。所以，投资者对于这一次降低印花税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除了印花税之外，证监会也发布了一系列组合拳。首先是优化了IPO和再融资监管安排，收紧了市场的融资节奏；其次，对股东减持做出了一定限制。

从收紧融资来看，证监会表示，“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紧IPO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具体包括对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或者其他行业大市值上市公司的大额再融资，实施预沟通机制，关注融资的必要性和发行时机；对于存在破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财务性投资比例偏高等情形的上市公司再融资，适当限制其融资间隔、融资规模；引导上市公司合理确定再融资规模，严格执行融资间隔期要求等。

从控制减持来看，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从严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东减持总量，引导其根据市场形势合理安排减持节奏；鼓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或者延长股份锁定期。

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都参与了此轮救市行动，三大交易所发布公告，调低融资保证金比例，将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的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由100%降低至80%。理论上而言，此举可以激励投资者采用更大的资金杠杆，进而起到活跃市场的作用。

财政部、证监会及交易所多箭齐发，一度让投资者充满期待，认为市场有可能重演2008年那一次救市行情。周一A股开盘之后，主要股指都大幅高开5%～7%。可惜好景不长，A股的强势只持续了十几分钟就开始跳水，当天主要股指的收盘涨幅只有1%左右，随后一周的交易也较为平淡。这就意味着，这一轮救市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2008年那一次救市的效果。

这一次救市的效果之所以不及2008年，原因在于救市的综合力度不及上次。2008年的那一次救市，除了财政部宣布印花税从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国资委还公开表示，支持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中央汇金公司宣布，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大银行的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这些组合拳极大地鼓舞了投资者的信心。

除了救市的力度不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两次救市的时机不同。2008年的那一次救市，A股市场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1800点，如果从上年6100多点的高点计算，最大跌幅已经超过了七成。所以，当时的A股已经处于严重超跌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救市就更容易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这一次，A股市场虽然也处于下跌态势，但是远远没有进入上一次那种大级别熊市，上证指数也还在3100点上方，在这个点位上，很多资金依然看空A股，也就是说，市场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底部。在这种行情下救市，很难和市场情绪形成共振，最终也就只能高开低走。

这一次救市的效果远不及15年前，更深层面

的原因在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和 15 年前相比，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周期，投资者的信心和当年相比明显不足，这是当前股市不振的根本原因。这次出台的各种救市措施，对股市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短期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信心不足的问题。

2008 年的 A 股大跌，主要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因素所致，而从中国经济自身来看，还是处于向上的周期。当年 4 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中国经济迅速止跌反弹，2009 年的 GDP 增长了 9.4%，2010 年和 2011 年的 GDP 再度重回两位数的高增长。所以，得益于宏观基本面的支撑，加上充裕流动性的推动，A 股市场在经历了 2008 年的熊市之后，于 2015 年再度迎来一场牛市，上证指数一度冲上了 5100 多点。

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处在不同的周期，经济增速和前几年相比大幅放缓。三年疫情期间（2020 ～ 2022 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下降到 4.5%，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虽然回到 5.5%，但是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对未来的预期再度变得不乐观。

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宏观经济增速息息相关。当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越来越慢，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也会随之放缓。2022 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3%，但是 A 股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增长仅有 0.8%；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5.5%，A 股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甚至同比下降了 4.29%。在这样的形势下，投资者自然很难对股市建立起足够的信心。

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不足，其实就是对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没有信心。如果从估值水平来看，当前上交所的整体市盈率不到 13 倍，已经处于历史底部水平，和 2008 年熊市时基本相当。但是投资者依然信心不足，原因在于此时的估值和当年的估值相比，意义完全不同。

股票的估值需要看动态水平，2008 年的 A 股市盈率跌到 13 倍后，等待中国经济的是随后几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上市公司的业绩也随之高速增长，拉动 A 股市场从底部反弹。现在 A 股市场的市盈率虽然再度跌到相似的水平，但是未来的经济增速已经截然不同。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业绩无法高增长，甚至负增长，13 倍的市盈率也难言低估。

未成年人进食障碍：以食物作为反抗

记者 · 吴淑斌　实习记者 · 张雅文

“食物”和自己的身体是年幼的孩子最容易掌控的对象，遇到处理不了的烦恼时，他们很容易用厌弃食物的方法做出自己的反应。但对心智尚不成熟的他们来说，就像是踏上一列危险的火车。

吃饭的难题

推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部七楼的门，一时间很难把眼前的一切与“医院”联系起来。宽敞的大厅以淡淡的鹅黄色为主体色调，左边的公告栏里贴着几张手抄报简笔画，风格可爱。下午3点多正是阳光最热烈的时候，一缕光线透过帘子洒在大厅正中央的两张大桌子上。桌边围坐着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模样，脸上带着尚未完全褪去的稚气。她们随意地散着头发或扎个低马尾，叽叽喳喳地低声聊天，偶尔发出一阵笑声。左边走廊两侧设置了十几间病房，每个房间最多能摆四张单人床。病房里没有五花八门的治疗、监测仪器，简单得像一间女生寝室。

但稍微留心，很容易发现一些异样。女孩们上身穿着简单的T恤，下身则是住院专用的浅灰色宽松条纹裤。许多人瘦骨嶙峋，脸颊凹陷，薄薄的短袖T恤袖口露出小树枝一般的胳膊。阳光下，一个穿紫色上衣、编两条发辫的女孩背对着我，正低头玩手机，后颈上一节一节的脊椎骨高高耸起。如果退回到公告栏旁，仔细看手抄报简笔画上的文字，其中用黑色马克笔写着的四个大字分外醒目：好好吃饭。

这里是进食障碍病房，来到这儿的人，都有“吃饭的困扰”。进食障碍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又分为神经性厌食和神经性贪食。神经性厌食患者面对食物时，由于种种心理障碍，总是“难以下咽”，体重大大低于正常标准；而神经性贪食患者会不受控制地在短时间里摄入大量食物，再通过催吐、使用利尿剂等各种方法排出食物，避免被身体吸收。病房里消瘦的女孩们，大多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

对常人而言，进食障碍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疾病。患者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误解，“不就是不吃饭吗？重新吃饭就好了呀”。一直到2019年3月，在“百度百科”词条里，进食障碍还被列为消化内科疾病，主要症状被描述为“营养不良，消化道及内分泌症状”。但在现代精神科学领域，进食障碍已经被归类为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敢吃”。它还可能和其他精神科疾病一起存在——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躯体化障碍或者强迫症——是死亡率最高的精神疾病。

这不是一个“小众”的疾病。最近20年，中国患上进食障碍的人数激增。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国内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也是少数设有专科病房的医院。医生杨磊记得，2014年前后是患者人数增长最快的阶段，住院人数达到了每年200余人，还有大量排队等待床位的患者——在2002年时，这个数字是每年20多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该中心门诊仅收治3例患者，而2016年就诊人数超过1100人次，2019年超过2700人次。

在杨磊接触的患者里，十几岁的未成年女孩最多，还有少数10岁以下的孩子。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是14岁到18岁，也就是初二到高中阶段，有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几岁，就已经成了“老患者”。刚来门诊时，患者的家属会向他抱怨，“爱美，学别人减肥、节食，变成了这样”。杨磊要和家属慢慢解释，“减肥”只是一种表面原因，进食障碍的病因非常复杂，有社会文化、个人的心理因素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但无论怎样，恢复正常的有规律的进食，是唯一有效的治疗办法，也是进食障碍患者最难完成的“任务”。

在病房里，每到饭点儿，那种轻松明快的氛



（插图：文哲）

围就消失了，七楼病房餐厅里透着一股压抑和低沉。月月曾经于2021年在北医六院住院治疗厌食症，那时，身高168厘米的她体重只有七十几斤。一走进餐厅，月月“脑子里的弦就会绷紧”。午饭从中午11点开始，一般是一份主食、一个荤菜和一个素菜，护工推着小推车进到餐厅里，从车上拿出一个个装满食物的不锈钢餐盘，挨个叫名字。十几个女孩在两名护士和护工的“监督”下吃饭，吃完后，要把空盘子给护士确认，才算结束。月月见过有人试图把一些米饭和肉藏在手心或衣袖里，想趁护士没有发现时偷偷扔掉，这种企图通常不会成功。还有人剩下一大半饭菜，哭着哀求护士：“我真的吃不下，太多了，求求你们了。”护士说话很温和，但没有一丝退让，“快吃吧，早点吃完才能好。”

食物，敌人

作为曾经的厌食症患者，晓鸳也说不清楚，吃饭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

她今年24岁，圆圆的鹅蛋脸，蓄一头过肩的长发，染成不太张扬的深红棕色，说话时礼貌而客气。夏天，晓鸳习惯穿白色连衣裙或是浅色的上衣和九分裤，无袖，露出两只胳膊。偶尔也有例外。今年五一期间，她到大连参加音乐节——那是一个“很嗨”的现场，“每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穿上班时不敢穿的衣服，蹦一整天”。她选了一套黑色紧身裙子，搭配黑色的项链，化了“最浓的妆”。

这是三年前的她无法想象的自己。那时，晓鸳陷在神经性厌食症的旋涡里，最严重的时候，身高162厘米的她只有70斤，身体虚弱到握不住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生杨磊

地铁上的拉环。进食是一种绝对的折磨，一盘饭菜上桌后，晓鸳的脑子会条件反射般计算热量：拳头大的鸡腿，没去皮，一个大约200大卡；半碗米饭，150大卡；炒肉片高油高盐，一份200多大卡……食物的香气在诱惑她的肠胃，但脑子里仿佛有个严厉的声音在抗拒："如果把这些全吃完，明天会长2斤，肉会长在最难减掉的大腿上，至少跑步3个小时才能消耗完。""吃这一口，之前受的苦就都白费了。"通常，脑子里那个声音会获胜，晓鸳放下了筷子。"你可能不会懂，就像走火入魔了，看食物就像毒药。我还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臆想症或者精神分裂症。"

"不能长肉"的念头是从晓鸳18岁刚上大学那一年开始的。那时候，A4腰、反手摸肚脐等测试在网上走红，晓鸳一个也做不到。"看到别人贴出来的照片被许多人点赞时，就会觉得这才是美的身体。"她的体重常年保持在115斤左右，身材匀称，也很健康，但"绝对不属于瘦子"。

最初，节食还算在合理范围内。早餐、午餐只吃原来的一半，不吃晚餐，不吃一切零食，不喝饮料。嫌食堂的饭菜太油腻，晓鸳就拿一个碗接满热水，把每一筷子的食物都涮一遍。第一个月很是煎熬，胃里不时传来咕噜声，身体对食物的欲望前所未有地强烈。夜晚是最需要意志力的时候，觉得快忍不下去了，晓鸳会打开手机里精心挑选保存的吃播视频，看着别人大快朵颐，"我告诉自己，吃得满嘴流油，就会胖得和主播一样可怕"。如果白天不小心吃多了，她还要做一个小时运动，试图耗尽摄入的热量。如此严格的节食减肥效果很显著，两个月时间里，她就从110斤瘦到了95斤。

瘦下来以后，晓鸳觉得身体变得轻盈许多。她渐渐习惯了饥饿感的存在，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肠胃空荡荡的感觉——因为精神变好了，不再像初期因为饥饿而萎靡不振。和朋友见面时，对方总会惊讶地发出赞叹。"熬过去头一个月，就好像从一个狭小的通道挤过来，一下子豁然开朗。心里很满足、很自豪的，觉得我是一个能掌控自己身体的人。"但她也逐渐捕捉到一些奇怪的信号：节食不再是痛苦的事情，相反，看到食物时，"心里第一反应是'别吃！'，还会责怪自己，难道管不住自己的嘴吗？"

这种变化，被精神病学教授希尔德·布鲁赫

（Hilde Bruch）这样概括："每个人都知道节食是怎么回事。它伴随着伊始时的热情，持续自我否定的枯燥乏味，还有放弃时的解脱。"但厌食症患者和食物的关系，已经悄悄突破了某种界限，"他们不停地在节食。所坚持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反应就会变得越反常。任何违反了强加给自己的苛刻规定的行为都会让他们感到愧疚。屈服于自己身体'粗俗的'生理需求会让他们感到愧疚，而且会通过更加严苛的极端饥饿来谴责自己"。

患上神经性厌食症的人知道自己病了吗？在杨磊接触过的患者里，许多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多少会知道这不太正常，身体健康已经出问题了。但是患者极度恐惧发胖，甚至成了一种生理性的反应，一吃东西就如临大敌，甚至崩溃，干脆就不吃。所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从节食过渡到厌食，似乎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红线"。采访中，多位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女生告诉我，她们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费力控制想吃的欲望，"食物像身体的敌人"，再回过头看，才发现已经走过了很远的路。希尔德·布鲁赫的一位病人曾经对他形容，得了厌食症就好像踏上一列火车，发现自己误入歧途时为时已晚。那位病人感觉自己已经无法自拔，只好让火车带着她去向终点。

"减肥"之外

我们第一次通话时，晓鸳用"减肥"来解释自己一开始为何踏上这列危险的火车。直到又一次聊了两个小时后，她才吐露另一个原因："我就想能变得更好，和我父母一样好。他们为我付出很多，我能更瘦、更美，也是对他们的回馈。"说出来，她有些如释重负。

用无忧无虑来形容晓鸳的童年是最贴切的。她住在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他们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即使在今天，那依然是一所公认的好学校。小时候，晓鸳就读在一所公立小学念书，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年年能拿到奖状。选报兴趣班时，一家人跑了七八个地方，上书法、武术、游泳、英文、乐器等各种体验课，最后还是晓鸳自己决定想要学古筝。当时，这个城市里做古筝培训的机构不太多，母亲选了一家离家不远的乐器行，每周上两次课。父亲打听到，有一位从音乐学校退休的古筝老师回到老家县城养老，他辗转托人争取到每月一次的上课机会。县城距离晓鸳家有两个小时车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成为一家人固定的出游时光。

烦恼是中学以后开始出现的。晓鸳的中学是当地一个知名外语教育集团的总校，学校里，"很多同学长得漂亮，家里有钱，成绩又好，和她们在一起，我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第一年学期末的文艺汇演上，她看到有同学能在舞台上流利地唱英文歌曲，台风、发音、造型，都像"电视里出来的人"。因为没有上过英文培训班，她的英文显得有些蹩脚。初三那年第一次考雅思时，许多同学已经能拿到6.5分，晓鸳因为口语小分太低，最后勉强得了6分。不过，父母似乎不太为此焦虑，反而常常夸赞她的英文写作能力强、学习习惯好，不让人操心。

"我不停地想，父母夸我，真的因为我做得好吗？更多是因为爱我吧？有点对不起爸妈，他们比很多人都优秀，我却很平凡。"她心里有对比，



精神病学教授希尔德·布鲁赫

和古筝老师一起演奏两人合作编的第一首曲子时，她看到母亲的眼里充满了惊讶和喜悦，“那才是真正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也是中学时，她渐渐感觉到，母亲就是一位“优秀到近乎完美”的人，无论是学历还是工作能力，哪怕只是优雅的体态、纤细的身材，“都比我强太多”。

为了迎合社会审美而减肥，是许多人节食的起点，但作为神经性厌食症“主力”患者的未成年人中，不少人还有难以言说的烦恼。“往往有更前置的诱发因素，才会一发不可收拾。”杨磊接诊过的患者里，有的家庭父母关系紧张，从小对孩子忽视；有的父母管教太严格，孩子用不吃饭的方法来抗议；也有人遇到了校园霸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青春期的少年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一开始，他可能不是为了减肥，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引起体重下降，却得到了某种肯定，使他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慢慢地进入到病态。”

深圳市儿童医院消化科医生王朝霞也有这样的体会。她是 2017 年来到深圳工作的，接触到的第一个神经性厌食症患儿是不到 10 岁的女孩小慧。被送到医院时，小慧已经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脑细胞发生明显萎缩，情况危重。在 ICU 抢救后，小慧虽然脱离危险，但依然胃肠道不适，难以进食，被转到消化科。王朝霞找小慧聊了好几次，又在查房时观察小慧的家庭，最终发现，小慧患厌食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家里多了二胎弟弟。“以前，她在家里像公主一样被照顾着。现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弟弟身上，她很失落。”后来，小慧发现不好好吃饭、反复生病住院家长就会一直陪着她，这导致她的疾病进一步发展到厌食症。

还有另一个 12 岁左右的女孩，因为同学说了一句“胖”，就开始减肥。她在网上买各种低热量的代餐减肥食品。“吃多了，脑肠轴发生改变，再想吃饭也吃不下了。”女孩入院后，王朝霞发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总是想操纵、控制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王朝霞后来了解到，女孩的妈妈是一位公司高管，在公司里管着大大小小的事情。母亲从小失去父亲，是家里的“大姐大”，总是为弟弟妹妹操心，连他们成年后买房、结婚都要管。这种习惯也蔓延到了小家庭里。但女孩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她用“不吃饭”来反抗妈妈的控制，又不知不觉像妈妈一样行事：她会在家里不停地做美食，自己不吃，却强迫家里人要吃完。

希尔德·布鲁赫于 1974 年发表的论文认为，对食物的拒绝代表对心理自主性的追求和对控制的反抗。当孩子进入青春期阶段之后，自我缺失感逐步加重，偶然的情况下，孩子学会用自我饥饿来对抗父母的控制，因而转向以节食或者暴食催吐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身体。“纵观很多患儿的家庭和成长过程，会发现他们的心理和感情其实非常脆弱，经不起大风大浪。”王朝霞说，“食物”和自己的身体是年幼的孩子最容易掌控的对象，遇到处理不了的烦恼时，他们很容易用节食的方法做出自己的反应。

隐秘的病症

在杨磊的诊室里，诊断并不是一件难事。当患者和家属敲开诊室门时，眼前的女孩往往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多聊几句，很容易判断出这是一名厌食症患者。困难的是，如何能让患者更早地到诊室来。“家人都看出孩子有问题时，基本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状态。低体重本身危险不大，但是它会慢慢影响全身各个器官功能，最后甚至呼吸无力。有的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直到大一暑假，晓鸳的母亲何莲才发现女儿“瘦得脱了相”。此时，距离晓鸳开始节食已经过去快一年，她的体重只有 80 斤。“寒假穿的衣服厚，看不出来很瘦。我觉得女孩子瘦点也没事，健康就行了。”何莲今年 52 岁，说话温柔斯文，她的母亲年轻时是一名护士，对子女们的饮食健康很上心，虽然家境不错，何莲却总是吃得很清淡，因此，身高一米七的她多年来保持着 100 斤出头的体重。但到了夏天，看到女儿悬在短袖里的两只胳膊已经“干巴巴”，胸前上方的骨头凸出来，何莲意识到了不妥。

即使深陷与食物的艰难抗争，晓鸳依然用“减

肥”搪塞过去，“其他的，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何莲接受了这个理由。毕竟，她没有发现太明显的异常。这是一种隐秘的病症，女儿依然每天和父母聊天说笑，也会在家弹古筝、看书。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整个暑假，晓鸳几乎没有和朋友出去玩、没有运动，看起来精神头不好。“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何莲说话有些哽咽，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到最初自己的大意，这位母亲总是自责地落泪。那时，她每天回家做饭，劝女儿，“你已经很瘦了，多吃点会更好看”。为了不让妈妈难过，晓鸳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少吃点，还会想法子偷偷把饭藏在袖子里，偷偷扔进房间的垃圾桶。

那年暑假最让晓鸳开心的一件事，是和母亲逛街时，晓鸳发现自己终于能穿上妈妈常买的一个“很优雅的”品牌的旗袍。

但回学校后，晓鸳的体重又一次刹不住车地下滑，掉到了70斤。上课的教室在二楼，没有电梯，她爬上去需要休息三次，头晕目眩，眼前常常一片漆黑，“感觉自己可能要死了，特别特别害怕”。这种恐惧超过了“变胖”，她终于主动向父母坦白，“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这是晓鸳的“自救”。愿意主动求助的厌食症患者不多，研究显示，许多厌食症患者会坚称他们“不能看出自己有多瘦”，而且认为其他人表露出的担忧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恰到好处，正是他们想要的样子，甚至会觉得自己还是“太胖”。这是神经性厌食的一种特征性临床表现，也是一种自我欺骗性的训练。杨磊说，在其他科室，患者是来“求医”的；而在进食障碍诊室里，往往是他苦口婆心地劝导，骨瘦如柴的女孩却激烈地坚持“我没有生病！”。

神经性厌食症不像其他精神疾病一般有激烈的外在表现，它总是以缓慢的速度，一点点蚕食患者的身体和内心。上海女孩张沁文曾经因为患有神经性厌食症，一度瘦到五十几斤，那时候，她已经快两年没有来月经，脸色蜡黄、脱发，手上甚至出现了老年斑。她总是郁郁寡欢，甚至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从没有真心笑过”。她的社交生活也在逐渐丧失——在中国，社交总是和吃饭分不开。饭桌上，朋友关切地劝张沁文：“你快多吃点吧。怎么可能不饿？你都瘦成这样了。”她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对食物的恐惧，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景，只好不再外出。

发现张沁文的异样后，父母带着她几乎跑遍了医院所有的科室。先是去看了妇科，想解决不来月经的问题，又因为肌肉萎缩严重，带她去骨科检查，消化科、血液科同样没有落下。“每一项检查数据都不在正常范围，但也都没有器质性病变，很多时候医生也只能说，‘回家好好调养’。”直到她因为脏器衰竭，住进ICU治疗一个月后，捡回了一条命，才开始真正进行进食障碍的治疗。

和解

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患者和家属首先要接受的是家庭心理治疗。“很多人患病可能和家庭有关，生病后又会给家里带来更多冲突。”杨磊说，神经性厌食症的成因十分复杂，虽然不能将患者心理上的障碍与疾病建立因果联系，但依然可以作为治疗时的参照。一家人坐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聊相处中存在的问题、对彼此的不满和可能做出的改变。

进食障碍的最好治疗场所是家里。杨磊说，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不同，一旦从节食发展到了进食障碍，疾病就有了独立的规律，只从心理和情绪上帮助患者是不够的，必须要配合营养、饮食措施。“许多父母太自责了，导致无法继续照顾孩子。我要先告诉他们，这不是你们的错，孩子是生病了，不会自己吃饭。现在的重点是，需要父母站在一起，像照顾小婴儿一样管着他、帮着他吃饭。”杨磊和一个家庭的谈话可能会进行五六次，内容甚至细化到家里谁来做饭、谁帮孩子盛饭、要不要陪着孩子一起吃、吃饭时聊些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马丽庄在《打开“家”锁——中国家庭治疗与厌食症的临床研究》一书中写道：“厌食症家庭的特点是，成员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边界，每个人太替别人着想，太关心别人的感受，却没有自己足够的空间。与中国父母打交道，理解他们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以及他们在原生

家庭中的地位和责任至关重要。这样的探索有助于治疗师评估父母双方对于管教子女的个人期望以及社会期望，激发亲子冲突的隐含意义，设身处地地理解父母一方或双方所肩负的担子。”

晓鸳一家人第一次在心理咨询室里认真聊起晓鸳的吃饭问题，母女俩都哭了。何莲不知道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心里竟有如此多的思量。“我们做父母的，从来不想着要孩子报答和回馈，反而让孩子有这样的压力，才是失败。”在咨询室里，她开导女儿：“我和爸爸只是赶上了好时代，你们现在的竞争太大，想要崭露头角，比几十年前难太多了。抛开经验，我们有很多能力不如你呢，你能弹古筝，我就没有一点艺术天赋。”

恢复的过程很漫长，往往以“年”为单位。按照医生的指导，何莲和丈夫选购了一个和医院一样的不锈钢餐盘作为晓鸳的餐具，有时在外面吃饭，也会带上餐盘。看到食物装在餐盘里，晓鸳心里就知道，这是可控的量，不会带来“体重暴长”。即便一家人已经统一了立场，恢复过程依然痛苦。何莲给我念了一段当时自己从书上摘抄来的文字：“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疾病，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孩子很明显地在痛苦中故意伤害自己，而你却无法帮助她。另一个悲剧是，它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充满恐惧和紧张的氛围中。”

还有许多人无法在家里康复。一开始，月月和父母也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回到家里休养。她的父亲常年在外跑生意，妈妈是家庭主妇，照顾女儿的责任全部落在母亲肩上。或许因为自责，让月月吃饭、恢复，似乎成了母亲检验自己是否合格的方式。“在家里吃饭的压力好大，我妈就坐在我对面盯着。这顿没有夹某个菜，下一顿只吃了素菜，她都记得，然后问我：‘做得不好吃吗？今天又吃不下饭吗？’”有一次，月月实在没有食欲，只是不断用筷子搅拌着碗里的米饭和炒牛肉，妈妈突然崩溃了，躲到卫生间里大哭了一场。

不得已，家人为月月选择了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医生会发给每人一个小册子，这是科室主任李雪霓在英国考察时，翻译的《进食障碍的动机促进与心理教育》手册。手册里解释了进食障碍的危害，还有一些需要患者做出回答的问题，比如分析自己有哪些患病的促发因素，可选答案包括“升学转学、离家独立、失恋”；哪些因素阻碍你好起来；有哪些现在可以改变的地方。像做家庭作业一样，月月填完后，会有一位医生和她一项一项讨论。一个住院周期往往是4周到6周，以患者的体重上升、脱离生命危险为最基础的出院标准。有些无奈的是，一些患者在医院里得到了有效的帮助，但出院后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常常会复发，再度入院。

“治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达到一种和解，让患者与食物和解、与自己和解，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和解。”杨磊说，目前进食障碍在未成年群体高发，与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有关。等他们的年纪稍长，有了更多的社会阅历后，情况慢慢也会好转。

恢复过程中，张沁文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故事，收到了许多女孩的私信，倾吐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患上进食障碍的烦恼。她才意识到，有如此多人深陷其中。张沁文开始致力于进食障碍的科普，她进入大学里做公开演讲，拍摄纪录片，还组织过一次关于“身材焦虑”的展会，试图让更多人知道这种危险而隐秘的疾病。晓鸳如今已经进入了稳定期。她检验自己的方式是，能在每周星期四从某个快餐店买到两个蛋挞，一口气吃完，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在漫长的恢复期里，她看了许多关于进食障碍的书和资料，印象最深的就是张沁文曾经参与拍摄的一个略显粗糙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学生作品，纪录片的结尾大约是个春天，片中与晓鸳同龄的女孩穿着裙子从河边跑过，指着一片草地说：“我之前坐在这儿哭过，现在这里已经开出花儿啦！”

（文中晓鸳、何莲、月月为化名，感谢张沁文为采访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打开“家”锁——中国家庭治疗与厌食症的临床研究》，马丽庄著；《金色牢笼——厌食症的心理成因与治疗》，布鲁赫著；《实用精神医学丛书·进食障碍》，陈珏主编）

困在肥胖里的年轻人

文 · 暮里

近日，一项被称为“中国肥胖地图”的大型研究冲上热搜，让中国超重和肥胖的严峻真相再次浮出水面：中国成年人（≥ 18 岁）的超重率为 34.8%、肥胖率为 14.1%——几乎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绝大多数人并非十分清楚，除了不美观，肥胖到底还会造成什么健康危害？

当我们走近肥胖症患者，才了解到亲身历劫给他们所带来的“痛的领悟”：原来“死胖子”不是玩笑，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减重的目的回归为生命健康，在专业的医疗指导下，“自律”才不会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刘思博从未料到，自己会因为肥胖失去左眼，一度双目失明，与死神擦肩而过。

三十出头的她，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特型喜剧演员，用十几年时间走出身材自卑，重拾“无可替代”的专业自信，却偏偏忽视了肥胖的健康危害。

“老天爷给我一次次打电话，我都没接。”刘思博心酸地回忆，大学一年级意外骨折，确诊为 2 型糖尿病，她自认“只是血糖高了些”，从没想过就医，此后每当身边人谈起，也总是岔开话题。

直到四年前的某天早晨醒来，视野里出现了几条黑线，她知道“这次电话不接不行了”。但为时已晚，一年四次眼部手术，没能逆转眼球的萎缩，大量服药和错误的减肥方式，更让她出现全身多项并发症。医生警告，再不控制体重，“只有半年能活”。

在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孟化教授的全面治疗下，刘思博如愿以偿地从 260 斤减到了 180 斤。对于身高 1.78 米的她来说，BMI（体质指数）28.41，略高于中国的肥胖标准。

BMI 可以用体重（kg）除以身高的平方（m^2）计算得出。按照我国标准，BMI ≥ 24kg/m^2 属于超重，BMI ≥ 28kg/m^2 属于肥胖——了解这一点，你对肥胖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 87% 的超重和肥胖患者。

1997 年，肥胖症首次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疾病，但据调查，46% 的肥胖症患者都不知道“肥胖是一种病症”。统计显示，仅有约三成肥胖症患者会积极治疗。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超重或身材走样，而不是肥胖。

“肥胖是名副其实的‘万病之源’，和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某些特定的癌症、代谢综合征、非酒精性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在代谢减重中心，孟化教授每周都要接诊 50 个左右的肥胖病人，可能需要综合处理的并发症种类多达 200 余项。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存在健康的胖子，所谓健康，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有病）。”

天生易胖，逃不开的宿命？

很多后天不良习惯会导致代谢紊乱，助长“易胖体质”：高糖高盐高油饮食、熬夜、睡眠不足、压力大、过劳肥，俨然是老生常谈；开灯睡觉，甚至家里灰尘太多，也是鲜为人知的“帮凶”；许多药物长期服用也会有发胖的副作用。

刘思博不知道的是，从娘胎里起，肥胖的“印迹”就已附着在她身上。她一出生就有 11 斤，母亲差点难产大出血而死。医学上称之为“巨大胎儿症”，根源就在母亲所患的妊娠期糖尿病。母体的高血糖，不仅刺激胎儿过度生长，还在基因层面影响其后天代谢能力，成年后更容易患上肥胖或 2 型糖尿病。

这类孩子在出生时，胰岛素调节和食欲调控就可能会有缺陷。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幼儿园时的刘思博就能一口气吃下六个大包子，还嚷嚷着“没吃饱”。国内多项儿童随访研究证实，超重 / 肥胖的发生率与出生体重呈正相关。

现有研究表明，BMI 的个体差异有 40% ～ 70% 可归因于遗传。对于这些“天生易胖者”来说，尤其需要及早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降低肥胖风险，否则很容易积重难返。

可惜天意弄人，刘思博偏偏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纵容她从小“胡吃海喝”。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城市化正高歌猛进，西方快餐文化浸润，一代独生子女受到“小皇帝”般的娇生惯养，许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还认为“能吃是福”……整个社会环境远远谈不上对于控制体重的健康认知。

刘思博家有两间仓库，分别储存食材和粮食，在她眼中堪称“神奇屋”。肉禽论个数，鱿鱼、海参之类的海鲜管够，“天天就跟吃婚宴似的，酒席没断过。”纵使家里有成箱的方便面、饼干、火腿肠，她依然止不住“一天四趟”往小卖部跑，所有衣兜里永远装满了零食，一度喝水就喝汽水——那是叔叔所在工厂发放的高温福利，每天都能背回灌得满满的四大瓶。

正常情况下，大脑通过“稳态进食系统”和“享乐进食系统”共同调节人体的食欲和进食决策。由于先天的遗传因素，刘思博大脑中的两种系统可能出现了失衡，使得她更难以抵挡“美食的诱惑”。

不出意外地，六七岁起她的体重直线飙升，十几岁体重突破 200 斤，无正确引导的刘思博没能避开从超重到肥胖的“宿命”。这样的悲剧，也周而复始地在其他孩子身上重演。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6 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达到 10%，6 ～ 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又翻了一番，接近 20%。

进入青春期，“肥胖”成了刘思博不愿承认的软肋。父亲的冷淡、同学的嘲弄，包括她的“讨好型人格”，统统都被归咎于肥胖。

“胖子很难交朋友”，所以她成了跑腿“买单王”；“胖子仿佛天生就是脏的”，于是她不敢当人面擤鼻涕，必须偷偷跑去墙角；班里有东西被踩坏、压扁了就“怀疑”她，喜欢帅哥也会被笑话；曾经锥心刺骨的一句玩笑化作自嘲，在为朋友打抱不平时脱口而出：“是不是想让我坐死你！”

“所有胖子都是流着血在跟你开玩笑，真的。”刘思博说。第一次去看孟化教授的门诊，她夸张地形容“巨好找”，“所有的胖子都穿黑衣服，为了显瘦。还都用老长的头发把脸盖上，显脸小。黑压压一片，肯定是那屋。”





上图：孟化教授和团队在巡房

下图：患者在减重中心听营养学讲座

减肥半生，归来仍是胖子

刘思博一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自带喜感。一副仗义执言的热心肠，令她在事业和生活中收获了一众好人缘。即使在后来遭遇病痛的日子里，她也坦言：“没有时间抑郁，所有的时间都在想着如何让大家都快乐。”


刘思博曾是一名成功的特型演员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的十来年里，她是不少综艺节目和电视台晚会的常客，参演了 30 多部影视剧。她骄傲于在演员休息室里拥有一把“写着自己名字的凳子”。此前，她一直觉得，“胖子好像没有独立人格。没人记得胖子的名字，我们要么是‘胖胖’，要么是‘胖妞’。”

很多人没能像她一样摆脱肥胖污名的阴影，反而受其影响，陷入增加暴食行为和减少身体运动的恶性循环。研究表明，体重歧视对年轻女性的影响最为突出，会增加 64% ～ 66% 的超重和肥胖风险。

刘思博并非没有努力过。相反，从初中开始，身边人都一个劲催促她锻炼，令她备受压力：老师在体育课上逼她跑三圈，比别人多一圈；叔叔曾盯着她每天锻炼，不做完规定数量不让进屋吃饭。有一阵父亲还搞来了食疗土方，水煮五种蔬菜，只放一点盐。最后都禁不住奶奶心疼“喊停”，一边隔三差五投喂三个大鸡腿，一边应她要求买来电视广告里的减肥茶。

“但凡知道能帮我减肥的项目，他们都给我报。”刘思博回忆，13 岁时，奶奶曾把她送进私营减肥中心，妄想用贴片仪器“震碎”脂肪排掉。最让她后怕的则是几年前网上爆火的泰国“神药”，买来后发现连外包装都没有。一个小袋子里装着各色药片，吃完后她睡不着觉，心跳过速，“120 救护车直接给我拉走了”。

在手术前为了减重，刘思博还尝试过生酮饮食——以高脂肪食物为主，配合适量蛋白质和少量碳水化合物。她没能坚持，体重迅猛反弹，而且比之前更胖了。更糟的是，这样的饮食加重了她的肾脏负担。

40 岁的重症医学科医生林峰也不推荐生酮饮食。一个月减重 12 斤的代价，是眼见着肌肉和头发一起掉。不到 30 岁查出高血压，他常年需保持低盐低脂饮食，但“中途崩了”的情形数不胜数。

和刘思博一样，林峰也是天生的大胃口，正常一顿可以轻松吃下六七个汉堡。健身期间，他会给自己设定“放纵餐”，最近的一顿，吃完海鲜后，他还干掉了满满三盘甜品。2021 年，他参加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药物临床试验，在试验期间结合饮食控制和运动健身，成功减重 50 斤。

社会公众普遍把肥胖归咎于不自律。然而研究表明，作为人类进化历程中一种“节能”的保护机制，机体会“不择手段”地抵御体重减轻，一边增加热量需求，一边降低代谢以储存能量。也因此，超重和肥胖患者会深陷“越胖越容易饿、比常人吃得更多才能感觉饱”的怪圈，很难通过饮食和运动来维持减重成果。

在超过 17 万名英国肥胖患者中进行的一项长期随访研究显示，体重减轻 5% 的患者中，至少一半人在两年内反弹回了原来的体重。此前还有文献称，大约 80% 有意减重 10% 及以上的人，会在一年内发生体重反弹。

现在，遇到有人问她减肥的事，刘思博坚决

不说那些“车轱辘话”，“什么管住嘴、迈开腿，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不了，尤其是两百五六十斤以上的朋友，求求你们，去正规医院看吧，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

肥胖是慢性疾病，需系统治疗

“很少有人会把肥胖跟疾病直接关联起来，人们想象不到肥胖的危害有多大。”孟化教授解释，2型糖尿病、高血压确实有遗传因素，但肥胖或许可以使得患者的发病时间比其父母提早十几二十年。

但刘思博懂得这个道理时已经太晚。2021年1月，第一次去看孟化教授的减重门诊，她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才进去。不等测量身高、体重，她指指自己的一只塑料义眼，开口“求救”，平静中渗出绝望。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不早治呢”，孟化教授听后连连哀叹。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通常出现明显症状时便已到晚期，多数人此前不知道自己患病。每年，全球约有100万人因此失明。

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病人还有陈明。肥胖令他患上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整晚监测下来呼吸暂停高达311次。为了通气，有整整一年时间，他每晚不得不坐着睡觉。与肥胖搏斗的十几年间，激进、错误的减肥方式，彻底打乱了他的代谢系统，导致体重飙升完全不受控制。

最重时他有520斤，1.89米的腰围，甚至还超出身高7厘米，定制9个“X”L型号衣服才“装”得下他。他送过外卖、快递，做过保安，但都因“大块头”的身材被辞退，无法在社会立足，以至于几乎不再出门、自暴自弃。

到了这个地步，他更加讳疾忌医，总想着再等等，“反正也能慢慢减下来”。有时，一想到陌生人的侧目和家人的唠叨，他会赌气说：“或许我一觉睡过去吧，这些痛苦就都结束了。”最终，在家人的连哄带骗下，他才走进医院，把孟化教授苦口婆心的科普听进心里去。

“想象一下，正常人去潜水，憋气两分钟是不是就不行了？而他们长期都活在这种两分钟里。家人在边上每天心惊肉跳，要随时把他摇醒，摇不醒就死了。”令孟化教授痛心的是，就在今年“五一”，一位节前预约治疗的31岁小伙子没有如约出现，“也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问人已经没了。”

如果不加干预和治疗，肥胖者有太多条通往死亡之路。尿毒症、心梗，还有“癌王”胰腺癌在内的20多种肿瘤，这些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都与肥胖有着密切关联。据统计，在2019年，中国11%的非传染性相关疾病死亡都由肥胖引起。

如今，在肥胖人口数量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首胖国”。肥胖会对社会和经济带来极大冲击，预计到2030年，中国在超重肥胖相关的卫生支出上将达到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2%。

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超重肥胖的控制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贯穿全生命周期，要从女性备孕、母亲孕期开始，从儿童青少年时期抓起。为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内的六个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强化家庭、学校、医疗机构、政府四个层面的责任。

在治疗方面，孟化教授主张成系统地进行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所在的减重中心，也配备有内外科大夫、营养师、康复师等不同职能的专业医护人员，治疗时不仅对患者的体重进行管理，还要治疗肥胖症引起的各类并发症。“不是以疾病为中心，而是以患者为中心，把健康作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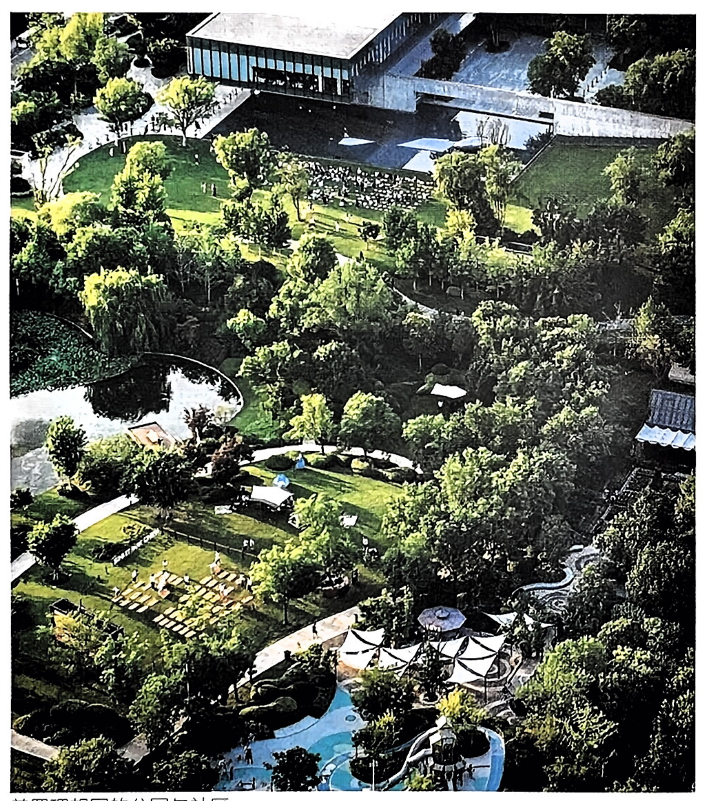
经过这样系统化的治疗，陈明有望在近期将体重降到180斤左右，他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减到150斤，是基础体重的三分之一。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变好了”，现在他坚持每周游泳2～3次，吃得也少了。

和最胖的时候相比，刘思博已经减掉了近100斤。如今，她强迫自己规律作息，并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再大鱼大肉，过年时连饺子都不敢吃。最近一次检查显示，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她正在转型做短视频主播，科普肥胖症、糖尿病的危害。

孟化教授强调，肥胖是一种需要终生管理的慢性病，“学会聪明地吃、聪明地运动，前提是改变对肥胖的认知和‘失败者’心理”。

一场关于人居的非典型性实验

文 · 张弛



普罗理想国的公园与社区

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曾经播出过一部名为《大时代》的电视剧，描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波诡云谲的股票市场中的爱恨情仇。其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股票是死的，它不会跟你斗，你最终的对手是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句话就像是一种隐喻，让我们看到了在商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往往舍本逐末，忘记了从人的需求角度出发，而这一点，在过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表现尤甚。

中国房地产从千禧年起飞发展至今，20多年的时间，已经异化了大多数人对于房子的认知。在他们眼中，房子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居住需要，同时也包含了个体的生活、审美、财富等方方面面的标签，成为他们对于当下生活和未来的憧憬的具象体现。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个人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景滚滚向前。而资本在这中间，就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巨兽，用各种不同的营销话术，将每个人隔离在一个个孤立的单元里。我们开始忘记当初亲切的邻居、满是烟火气的市场、富有人情味的公共空间。对于那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那个曾经的"我们院的孩子"，如今只能永恒地停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诚然，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但是，今天我们也遗忘了一些曾经宝贵的东西。对于整个时代而言，也意味着某种遗憾和缺失。

"黄金"时代的背后

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房子在国人的心中有着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安居"与"乐业"始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导致的结果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样的想法，"不论大小，好歹是个家"。这也催生出了过去20年中，中国房地产市场近乎于疯狂的发展速度。

从1998年开始，中国正式推进房屋所有制改革，2003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全面落实，标志着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式迎来了腾飞。这一年全国完成房地产投资10106.12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9.7%。而这一数据到了2021年底显示，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了147602亿元，增长了14倍多。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发商还是买家，每一方都被裹挟在一种群体性的狂热当中。拿地，盖楼，从银行抵押贷款，再开新盘。老百姓高涨的购买热情给了开发商"摊大饼"的底气。在各大城市，哪怕是区位不好的房子，开盘也必然排队，上午说好的价格，下午就能涨十万八万，在周边不停渲染的氛围之下，焦虑几乎萦绕着每个人的内心，

生怕今年不买，明年就再也买不起了。

这种“疯狂”一直持续到了2022年。这一年，随着全球经济的整体低迷，加上疫情的长尾效应，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萎靡不振，过往的被掩盖的种种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约13.29万亿元，比上年下降10%。而在这种恐慌的气氛下，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房地产公司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当过往动辄上百亿的销售额辉煌不再的时候，危机也逐渐浮出水面，过去高杠杆的经营模式下，大量房地产公司的贷款逾期，很多知名开发商的楼盘开始接连烂尾，那些承载着很多家庭毕生积蓄的泡沫逐渐被戳破。而在这中间当初选择了相对“保守”模式的人，如今看来似乎带着一种“天然的正确”。

看着别人在飞奔，他只想走好每一步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达的陆路交通带来了经济的活力，也带来了资本的青睐。作为全国17个GDP突破万亿的城市之一，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体量。然而，从产业结构上看，郑州经济也是对房地产的依赖度为最高的城市。据2019年的统计，房地产占GDP总量的28.9%，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与之相伴相生的，是地产行业的诸多问题，过度的开发、房企之间的相互内卷、价格战等。所以当需求出现萎缩，山雨欲来之时，郑州也是最先感受到切肤之痛的城市。

今年，《三联生活周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那对眼里有光又消失了的郑州小夫妻》的文章，描摹了一对经历了楼盘烂尾的郑州小夫妻生活的真实变化，侧面反映了全国房地产市场哀鸿遍野的现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8月至2022年6月，郑州新房和二手房价格指数连续11个月下滑。在那波停工停贷风波中，郑州也因涉及项目最多而受到关注。作为华中地区房地产最重要的风向标，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当暴雷、烂尾成了今天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那么，人们的消费意愿如何提振？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冷静地回望过去的冲动与狂热。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并不缺乏清醒的观察者。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中牟县，一个名为“普罗理想国”的项目和他的创始人徐益明，就是这波如火如荼的浪潮当中，为数不多保持冷静的人。在徐益明20多年的房地产从业履历中，只做了四个项目，这在房地产年景好的时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当时，所有的开发商都做一件事——快速周转。因为良好的偿付能力，银行也乐于将贷款放给地产企业，这也形成了当时的中国特色，迅速地开发完一片土地，马上再拿地开新盘，项目周期越短，赚的也就越多。但这并不是徐益明想要的，即使是今天，他也说自己从来没有把公司做大的冲动。在他看来，一个项目的周期，并不是简单地成立一个分公司，用数字指标去衡量员工的工作，卖完再去做新的，而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这里的居民，代入其中，才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们的需求。这也在当地衍生出一种现象 .你从未见过如此“慢”的开发商，从一开始，普罗与整个郑州楼市高歌猛进的基调是“背离”的。然而这种背离放在今天去看，却似乎为未来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找到了一条出路。

在以色列，聪明的犹太人中间一直信奉着一个非常著名的“第十人”理论，在十个人中间，如果前九个人讨论的方向与大体的结论一致，那么第十个人必须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结论的不合理之处，这个人被称为“恶魔拥护者”。用这样的方式，古老的犹太文明得以延绵了上千年。在中国不长的房地产发展历史中，徐益明所扮演的就像是这样一个角色。

故事从2003年说起，那一年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客家人代表，受邀回到客家先民的根基地河南寻根谒祖。在会上，郑州市政府推出了第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西史赵项目，徐益明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后，正式与郑州结缘，开始了普罗旺世项目的开发。因为这个项目，徐益明结识了金达利创始人谢广勇，整合了规划、建筑、室内、景观等国际国内优秀团队，合作打造普罗旺世。彼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方兴未艾，而两人则一拍即合，一方面，他们看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兴起的

旺盛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人居概念的理解上有一种天然的一致。

这种理解来自徐益明的经历，改革开放以后不久，徐益明大概是最先出国的那批人。他从事丝绸进出口贸易，当时中国的对外口岸只有香港，长期在国外的旅居经历，让他得以很早见识到居住空间对于人的意义。“中国房地产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房子越盖越高，这在当年看来，都是流行趋势，但是你看最近几年，除非是有特别好的景观，一般人不再偏爱高层建筑，所以普罗旺世从一开始就着重打造容积率低的、适合人居住的房子。”无论是审美还是消费观念，我们国家房地产今天所经历的过程，发达国家也曾经经历过。所以，在徐益明的眼中，人对于居住需求的理解最终会殊途同归。那是一种有和睦的邻里关系，孩子们能尽情奔跑、快乐成长，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同需求的空间。而这种理念在当时来看具有前瞻性，这也是普罗的行事风格，给你“超前十年”的生活。同时也奠定了他和金达利筑地的合作基础，金达利的创始人谢广勇是中国台湾人，亲历了台湾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期。由于二人对于人居概念的理解空前相似，所以决定携手开发项目。

西史赵村旧城改造项目被列为郑州市 2004 年重点建设项目。意义就像是给新郑州设计一张城市名片。于是，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前提下，徐益明与谢广勇围绕着客户、社区、产品三个维度，一尺一尺地丈量，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做出了开发体系的系统集成的规划和构想，这种“规划先导”的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先例，在当时野蛮生长的房地产市场独树一帜。在那个大干快上、效率至上的年代，这种模式被视作一种“愚蠢”“跟钱有仇”的发展思路。然而在今天回看，这种曾经被嘲笑的“慢”，如今正在逐渐成为引领当下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主流。

在这之后，谢广勇又以同样的模式主导开发了三亚的半山半岛以及秦皇岛的阿那亚，而事实也证明，中国人的人居观念正在从高楼大厦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向着更自在、休闲和宜居的生活方式转变。到了 2006 年，普罗旺世的开发已经初具规模，这个标杆性的项目也给徐益明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当时，摆在徐益明面前的选择有很多，而他大多拒绝了，从那时起，普罗就注定要走一条方向迥异的生长路径。

打造心中“理想国”

转折出现在 2012 年，在位于郑州主城之外 20 公里的中牟县，徐益明相中了一块 4 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这里实践着它对于美好人居概念的理解。用他的话说：“理想国拥有比普罗旺世更大的地块，那些在普罗旺世尚未实现的理想，将会在理想国一一呈现。”如今，他住在这里，每天绕着理想国的西川河边散步，业主们的孩子们会主动跟他打招呼。把家安在自己建造的社区里，在中国，这样的房地产老板样本似乎并不常见。

最初，政府只答应给他 2 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徐益明觉得，打造心中的“理想国”需要更大的面积，在他的积极争取之下，地块从 2 平方公里变成了 4 平方公里。这不单纯是面积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开发难度上升了一个量级。但是，在徐益明的脑海中，对于那些在普罗旺世没实现的事，早有了清晰的规划。

新城市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Stefanos Polyzoides 曾说：“建筑是关于在宇宙中建造一个地方，而不是模仿一个废弃破旧的现实。”就这样，徐益明特地把他从美国请来，对地块进行整体规划，与上次一样，普罗理想国同样是规划先行。

2012 年徐益明刚来考察的时候，西川还是一条宽 1.5 米的农地灌溉渠，每年夏天，会从黄河引水到这里灌溉农地。而曾经的东川则是一条泄洪渠，因为是一潭死水，所以河沟里有着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淤泥，偶尔经过都会觉得臭不可闻。而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地块，从中穿过的省道，也会在日后影响社区居民的休息。

规划完成之后，徐益明就开始了实践和改造，在保留设施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对这两条河道重新整理河床，铺设绿化，做成了独立的生态景观，如今，这里成了黑水鸡和白鹭的栖息地。而那条穿过理想国的省道，则被他自掏腰包改成了隧道，而在隧道的上方，则安置着中央公园、普罗市集、艺术文化中心、球场等一系列综合设施。为社区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爱好和教育背景的人群，提供了不同的生活选择。

在徐益明对于理想国的设想中，和睦的邻里关

系和人们生活的“烟火气”是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人和人的亲密关系，这里有帮助、有爱护、有礼貌，逢人打招呼，有别于现在工作忙碌的人们，出门头抬得高高的。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员工，不论是物业还是园丁，见到人始终都微笑着，那是一种幸福感的体现，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或许会改变整个社区的氛围。与此同时，用社区活动去维系社群的黏性，则会让每个人都更有‘家’的归属感。”过去，不论是去纽约还是去伦敦，徐益明总是忙里偷闲地去当地的菜市场转转，因为在他的眼里，这才是一座城市的基底，属于每个人的烟火气，而这样的“熟人社区”，也是属于每个人的理想家园。

而在更广的维度，因为有着能够将社区当作自家一样营造的人，才能真正地做到从业主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量。所以在今天，即使是交付10年之后，普罗旺世的局部改造，依然常换常新，保持着投入；业主食堂里能吃到自家农场种植的蔬菜，带着孩子到中央公园里，能看到萌萌的羊驼，踢足球、戏水；社区里有各类的跑步社团、骑行社团；新年还有春节晚会；去年的郑州“7·20”暴雨，得益于出色的给排水设计，理想国社区没有出现马路积水、地库泡水的现象，早在规划阶段，普罗理想国就将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海绵城市”的理念应用其中，而时至今日，这一方法才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每年跨年前，两万户业主会收到徐益明的家书，他也开放邮箱、面对面工作坊保持交流。这都是徐益明“围着人转”概念的精细体现。“我们常说，客户就是上帝，但是这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销售层面，而是要这个概念贯穿整个项目始终，以终身项目的姿态去做。”徐益明说。

人生长在社区之中，更生长在社会之中。有呼吸和沟通的地方，就有情感的联结与交互。“呼吸感”一词的流行，投射出人们对于生活本真、对于情感联结的向往。人类学家项飙曾经说过，我们生活的“附近”正在消失，而在徐益明的理想国里，他则希望找到这种消失的亲近感，让人感受到足够的尊重，不是陷入信息茧房的某位匿名用户，不是被大数据杀熟的目标客群，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与众不同的人。


普罗中国（大雅集团）董事长
普罗理想国创始人 徐益明

尾声

在普罗理想国的网球场里，有一面硕大的墙，徐益明的巨大头像被涂鸦在墙上，带着一点调侃的笑意，意味深长地看着前方，这并不是什么自我标榜，在这幅画像的旁边，写着“Hit me”（打我）的英文。这里是一块网球练习场，是广告人杨海华的主意，徐益明觉得很好，“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业主去挥两拍就能排解心中的不快，那这有什么的呢？”

谈起理想国的未来，除了继续完善理想国的十五年一贯制学校之外，他还在周边引入了三甲医院、奥特莱斯、适老公寓等适合“全年龄段”的设施营造。而对于理想国如今更偏七八十年代生人的社会中坚年龄构成，他也正思考着让这一切变得年轻化。不久后将要推出适合年轻人的小户型公寓，同时打造一个包含了菜市场和运动中心的非标商业综合体。在那里，你能游泳，打篮球、匹克球，能做瑜伽。当然，你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地享受一壶手冲的精品咖啡，看看书，逛逛艺术展。

说起这些，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徐益明眼神当中泛起的光芒。他说：“我如果对一件事情丧失了激情，那么就没法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所以，我始终都在思考完善社区的每一个细节，尽我所能地解决业主们的需要。”而我们也希望这道光，能够给中国看似有些迷失的房地产行业带来一些启示。



9月2日，梁朝伟（中）在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获颁终身成就金狮奖，李安导演（左）担任颁奖嘉宾

梁朝伟的荣耀与遗憾

文 · 肖浑

李安这次给梁朝伟颁奖的几分钟致辞，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响。一方面，大家感慨一个伟大导演与伟大演员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另一层原因，或许是想到他们引领的那个华语电影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

这将会是影史上一个让人难忘的画面，多年以后，一定还会有影迷翻出这段视频：梁朝伟在领取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时，先是做出一个诙谐的表情，肩膀上缩，双眼圆瞪，嘴巴张大，活像一个嬉闹的孩童；紧接着，他又因为李安的致辞感动到哭了起来，用一只手抹起了眼泪，然后用双手一起抹，这也是孩子哭泣的姿势。

61岁的梁朝伟，依然保留着他孩子气的一面，简单，天真，赤诚。

这样的梁朝伟，和电影里他那些忧郁、深沉、复杂的经典角色存在巨大反差，但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真正顶级的好演员，在生活中大都简单天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全相信戏剧情境，不着痕迹地进入其中。就像李安在颁奖词中说的，梁朝伟之所以如此出色，是因为他就像水一样，不费力地流向最低处。

虽然有点难以接受曾经的伟仔竟然也到了拿终身成就奖的年纪，但不得不说，这个奖绝对实至名归。他不仅是华语影坛获奖最多的男演员，

而且多部经典文艺片都曾在国际影坛声名远播，全世界的影迷都知道中国香港的Tony Leung。

而由威尼斯电影节颁这个奖，又尤其意义不一般。在此之前，大家或许会认为戛纳才是梁朝伟的福地，因为王家卫和梁朝伟合作的那些经典作品大都是在戛纳举行世界首映，2000年梁朝伟更凭借《花样年华》荣膺戛纳影帝。但实际上梁朝伟和威尼斯电影节的缘分也是极为深厚的，在他主演的电影中，有三部先后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分别是1989年的《悲情城市》、1995年的《三轮车夫》、2007年的《色·戒》。能达成这个纪录的演员，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也是凤毛麟角。有些遗憾的是，他从未获得过威尼斯影帝，所以这次的终身成就奖，大概就可以看成威尼斯电影节对此前亏欠他的一种弥补吧。

这份巨大的荣耀来得也很及时，因为梁朝伟最近这几年，在群众心目中口碑已经有下跌的趋势。算一算，他已经有整整10年没有拍出过被大家交口称赞的作品了，上一部称得上优秀的电影，还是2013年的《一代宗师》。

在那之后，他交出的是怎样的一摞成绩单呢？4.1分的《摆渡人》、4.9分的《捉妖记2》、3.5分的《欧洲攻略》、6.0分的《尚气与十环传奇》、6.1分的《风再起时》、6.6分的《无名》。

曾经的演技天花板、经典专业户，现在的作品评分却在及格线上徘徊，这很难不让人生出喟叹。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梁朝伟的错。对于表演事业，他从未懈怠，依然敬业认真，依然全力以赴。只不过整个行业环境早已今时不同往日。这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就是越来越难找到靠谱的好制作与好导演了。

演员是个很被动的职业，特别仰赖导演的调教和塑造。梁朝伟演艺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大导演的慧眼识珠和妙手生花。其实和梁朝伟合作过的大导演还挺多的，只不过因为他在王家卫身边的时间最长，两位之间“相爱相杀”的坊间传闻又足够吸引人，所以现在大家把他俩几乎都当成固定搭配，想不到别人了。

上面提到的梁朝伟三部擒获金狮奖的作品，就是体现大导演与好演员关系的现成三例。

他从未获得过威尼斯影帝，所以这次的终身成就奖，大概就可以看成威尼斯电影节对此前亏欠他的一种弥补吧。

梁朝伟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第一次被国际影坛瞩目，其实是靠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那时候他才20多岁，还在香港TVB拍电视剧，演技只是刚刚冒出一点头，还未得到太多外界肯定。而侯孝贤当时已经拍出过《恋恋风尘》《风柜来的人》，算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一员健将。

起初，侯孝贤是想找周润发来演《悲情城市》的，可因为筹备时间过长，周润发签的公司合约又出问题，无奈之下只能换角，这才找了梁朝伟救场。因为电影剧情设定，角色都要讲闽南语，梁朝伟又没时间去学，于是侯孝贤灵机一动，把梁朝伟饰演的文清设置成聋哑人，完全依赖他的眼神以及肢体动作去表演，反而让梁朝伟的潜力和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可以说，真正推动梁朝伟成为“电眼杀手”的决定性导演，不是王家卫，而是侯孝贤。

拍《悲情城市》的同时，梁朝伟还在赶拍TVB武侠剧《侠客行》，要在香港台湾两头跑，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状态，还因为睡过头未能准时到达台湾片场而导致拍摄延期。不过这也恰好让梁朝伟的憔悴状态更符合片中角色。电影有场戏是文清因为舅舅参与叛乱活动而被连坐入狱，为了拍出历史质感，这场戏干脆就在老旧的台中监狱里实景拍摄，隔一道墙就有真实的囚犯。为了拍这场戏，梁朝伟要一大清早从香港飞到台湾，然后再几次转乘交通工具，到了台中监狱直接拍入狱的戏份，那个饱受折磨的样子完全可以瞬间入戏。

这次合作对梁朝伟的影响可谓深远，不仅让他见识了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而且打开了视野。侯孝贤会跟他讨论很多深刻的文学、艺术与历史问题，还带他结识了一帮台湾文艺圈的名流，比如在电影里客串的张大春和詹宏志。这些缘分一直延续至今，前阵子梁朝伟还专门到台湾看张大


(TPG/Alamy 供图)

电影《三轮车夫》剧照

春的书法展，而侯孝贤每次去香港据说都会给梁朝伟带上几本台版的书。

《悲情城市》之后，梁朝伟就减少了电视剧的拍摄，直到彻底不拍，把精力全都放在了电影表演上。还有一个体现梁朝伟对《悲情城市》态度的细节是，多年以后，在被问到最欣赏哪位合作过的女演员时，梁朝伟的答案依然是《悲情城市》女主角辛树芬。

《悲情城市》在梁朝伟的事业版图中如此重要，无怪乎今年2月这部经典作品在台湾举行4K数字修复版重映，梁朝伟会亲自飞到台湾支持了。

1995年，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找梁朝伟演《三轮车夫》，其实也要拜《悲情城市》所赐。陈英雄当时已经凭借《青木瓜之味》在世界影坛一炮而红，很多电影人都在翘首以待，这位新锐导演还会带给大家什么惊喜。后来陈英雄果然没有走《青木瓜之味》那种精致生活美学的老路，而是要拍一部揭示越南底层社会各种阴暗扭曲堕落的电影，也就是《三轮车夫》。

片中有个角色非常复杂，是个写诗的人，同时又是皮条客、黑社会流氓。这就要求演员的气质既要优雅，又要阴郁，还要能展现出一些脆弱感。陈英雄翻遍了越南男演员的所有名录，都找不到可以出演这一角色的人。终于，他看到了《悲情城市》里的梁朝伟，立刻意识到，只有梁朝伟可以演这个角色，于是力邀他合作。因为梁朝伟不会说越南话，导演还专门把角色的台词量降到最少，让梁朝伟的眼神魅力又有了一次充分发挥。这部电影成功奠定了陈英雄的江湖地位，同时也让全世界影迷再次看到了梁朝伟的惊人演技，最单纯和最复杂竟然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

至于梁朝伟第三部获得金狮奖的作品《色·戒》，大家都已经够熟悉了。此时的梁朝伟已经历练成华语最强男演员。可即便如此，在这部



电影《悲情城市》剧照

电影面前，他还是要应对演艺生涯最严峻的挑战。虽然李安外表上一派谦谦君子，可实际上他对演员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格，开拍前会给演员下达非常具体又艰难的训练任务。为了《色·戒》，梁朝伟要瘦身8公斤，要读胡兰成和张爱玲的书以及其他民国历史书籍，还要学习普通话——这部电影的台词信息量非常丰富，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让梁朝伟闭着嘴巴只靠眼神来演了。

甚至易先生走路的姿势，都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李安认为那个年代的官员有一种不同于当代人的走路姿势，他父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于是他就让梁朝伟模仿自己父亲走路的姿势。因为造型相近，易先生这个角色时常会让梁朝伟想到《花样年华》的周慕云，有时候走着走着他会忽然顿住：不行，我现在做不到，因为我找不到走路的节奏，我现在是用周慕云的节奏在走路。然后他就要尽力摆脱周慕云的影子，让自己彻底成为易先生。

这些努力当然都没有白费，易先生是梁朝伟塑造的又一个可以写入影史的角色，而且和周慕云完全不一样，我们都不会搞混的。

侯孝贤、陈英雄、李安，这些名震世界的大导演，都参与了对梁朝伟的塑造。他们的电影作品风格各异，对梁朝伟的运用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是营造情境，让外部条件尽量贴合梁朝伟的本质；有的是向内挖掘，把梁朝伟内心的复杂面向都给挖出来；有的是拓展边界，用各种折磨人的手段把梁朝伟给逼到极限。这些大导演们各尽其才，而梁朝伟也总是尽量配合他们，遇到困难不会叫苦，面对大尺度戏份也不会忸怩。李安这次给梁朝伟颁奖的致辞中就说，拍《色·戒》时有场戏他自己在片场就崩溃了，是梁朝伟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导演，我们只是暴露了一点皮肉，而你是暴露了其他的东西（指内心），你要保重哦。"

有这样的演员，对于导演来说，夫复何求？

在梁朝伟的电影生涯里，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导演是刘伟强，虽然他不怎么参与国际影展，但《无间道》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好莱坞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翻拍版还拿了奥斯卡大奖，所以也算是为梁朝伟在国际影坛的地位立了一功。不过梁朝伟在采访中说，刘伟强在片场是一个很好说话的导演，对演员永远都是赞美，而且工作节奏很快，总是急着收工回家。这也是香港导演普遍的风格。虽然"无间道"系列出来时被认为是香港电影的救世之作，但现在看来，更像是一次偶然的回光返照。刘伟强此后再没能延续辉煌，

香港电影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低迷下去，直到如今。身处香港的梁朝伟，也只能被动承受这局面。

现在刘伟强早已不拍港式警匪片了，而是北上拍了一系列的主旋律电影。不过由他带起的港式警匪片风潮现在还余波未了，每年还会出几部，但影响力已经日薄西山，显得过时老套。最近传出《无间道》编剧庄文强担任导演的新片《金手指》在筹拍，再次请来梁朝伟和刘德华上演双雄对决，但群众表示已经审美疲劳，高赞评论是：没想到20年过去，还是得靠他俩。

最近这20年，整个华语区的导演都存在人才断档的问题。虽然时不时地也会冒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导演，可大多数都是刹那闪耀然后迅速滑落。能像侯孝贤、王家卫、李安那样，树立风格、稳定产出的导演，好像再也出不来了。

梁朝伟最近这几年选择合作的新导演，包括程耳和翁子光，之前都曾是众人期待的明日之星，但《无名》和《风再起时》的成色却都很难令人满意，总像是过去一些经典电影的复刻，缺乏新意。导演人才断档的背后，是整个行业的僵化，包括人文艺术教育的保守、社会气氛的浮躁、资本的急功近利、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都是原因。

所以李安这次给梁朝伟颁奖的几分钟致辞，才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响。一方面，大家感慨一个伟大导演与伟大演员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另一层原因，或许是想到他们引领的那个华语电影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他们俩都老了，我们也开始老了。

梁朝伟最好的银幕搭档张曼玉，2004年就息影了，我们曾经为她感到可惜，现在才猛然发觉，这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定。或许她早就预见到了，电影行业将要陷入瓶颈，她在表演之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会再有艺术高峰可以攀越，剩下的只会是缓缓的下坡路。据说她还曾经建议过梁朝伟不要轻易接戏，要有更严格的筛选标准，只不过梁朝伟和她毕竟是两类人，她可以随性洒脱地跨入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梁朝伟只有在表演状态才能找到放松和安全感。

这两位华语影史上最伟大的演员，他们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不管是戛然而止，还是缓缓下坡，他们的光辉都定格在了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他们曾经的成绩已经足够耀眼，所以后来的遗憾也就无足轻重了。所谓遗憾，只属于我们和现在这个时代。

老年痴呆的预警信号

主笔·袁越

失智症（Dementia）俗称痴呆症，指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中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虽然这个病目前无药可治，但有不少方法可以延缓病情的进程，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老年痴呆的检测方法，希望能尽早发现这个病的苗头，从而提前进行干预。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是导致老年痴呆的主因，约占老年痴呆总人数的70%。虽然阿尔茨海默病有一定的遗传性，但遗传因素的占比并不高，而且主要局限在中年便已发病的人群当中。绝大部分患病的老年人都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当导致的，从他们身上找不出明显的家族遗传史，所以医生们很难依靠基因检测做出预判。

目前最为可靠的阿尔茨海默病检测指标是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beta）和涛蛋白（Tau）的异常堆积，但这个检测指标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这两种蛋白的异常堆积往往意味着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常用的干预措施难以奏效；二是这两种蛋白基本上只存在于患者的脑组织当中，采样很不方便，难以通过常规体检而检测出来。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几位科学家决定从血浆蛋白入手，看看到底有哪些蛋白质与老年痴呆有关。

这项研究开始于1993年，研究人员招募了10981名年龄在45～60岁的中年人，对测试者每隔几年抽一次血，测量其中4877个血浆蛋白的含量，再与正常值做对比，看看哪些蛋白出现了波动。25年之后，一共有1874名受试者被诊断出老年痴呆，约占受试总人数的17%。通过对这些人历年的血浆蛋白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研究人员从中找出了32种蛋白质和老年痴呆有关，相关论文发表在2023年7月19日出版的《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上。

这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招募人数最多、检测蛋白质数量也最多的老年痴呆预警实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之后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这项研究开启了通过抽血来预测老年痴呆的新时代。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仅仅通过常规体检就可以知道自己在未来的10～20年内是否会患上老年痴呆症，从而提早做好准备。

另外，这项研究还有助于科学家们研究老年痴呆的发病机理。比如，在这32种蛋白质当中，只有12种蛋白质和脑脊液中的阿尔茨海默病、神经退行性疾病或神经系统炎症的生物标志物有关，其余20种蛋白质则与人体内的蛋白平衡维护机制、免疫系统健康机制、神经突触功能调节机制和细胞外基质的稳定性等方面有关，覆盖面相当广泛。

在这20种蛋白质当中，和老年痴呆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个名叫GDF15的蛋白质，该蛋白质和新陈代谢、免疫调控、炎症反应及氧化压力等人体最基础的功能系统都有关联，但却并不存在于大脑之中。这个结果说明老年痴呆的发病机理相当复杂，和人体很多部位的健康状况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不能指望仅凭一种药物就解决问题。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老年痴呆发病前20年出现的预警信号和发病前10年出现的预警信号有所不同。科学家们也许可以通过追踪这些预警信号的变化，研究老年痴呆的发病进程，从而找出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站酷海洛 供图）

甲骨文

文 · 苗炜 图 · 孙愚火



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汉字的历史就是一部小的文化史。鲁迅先生说，汉字如结核，细菌都在其中。这两种看法截然不同，我等徘徊其间，只是觉得“一个青年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语文上面”。

我问过好几个学语言的朋友，汉语是不是最难学的一种语言，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鱼能够对终身畅游其间的水说什么呢？然而，三四岁的小孩子，应该认识26个英文字母了，此后他要学的单词，都是由这些字母构成，你跟孩子讲一个英文单词，write，只需要拼出五个字母，他就知道怎么写了。但你要告诉他，“写”字怎么写，就比较麻烦，你得说出笔画，“点，横钩，横，竖折折钩，横”。小孩听着笔画，肯定写不出来，大人听着笔画，也未必能写出来。你只能拆一下，秃宝盖下面加一个“与”。

1925年，图书馆专家杜定友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民众检字心理略论》，开头讲了个小故事。一个小女孩问妈妈，“恋爱”的“恋”字怎么写。当时还是繁体字，妈妈回答说，当中一个“言”，左右两旁各有一个绞丝，下面再加一个“心”字。汉学家周文龙（Joseph R. Allen）说，这种拆字方法是中文的笔体学（graphology）或者元语言（metalanguage）。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口头描述一个汉字的组成部分，描述其结构，传递出这个汉字是什么，比如木子李、立早章。拆一个汉字，我们有笔画，有偏旁部首检索方法，还有这种“笔体学”的方法，不像英文，再长的单词也能用一个个字母拼出来。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说，对于习惯字母拼写的人来说，写字就是分析发音，并把一串音记录下来，每个字都有它自己的符号，如s-c-r-i-p-t，用六个符号，这相当自然，简直一看就懂。这条原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特别适用于西方语言。汉字不同，汉

字最初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象形文字。高本汉这本书是向外国人介绍汉语的。他的学生林西莉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向外国人介绍汉字源流，翻译成中文改头换面成了《给孩子的汉字王国》。林西莉开头讲，1899年夏天，《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到北京达仁堂中药铺给自己的朋友王懿荣买药，王懿荣患了疟疾，大夫开的药方里有一味“龙骨”，刘鹗在药铺里发现，“龙骨”上刻着字。等王懿荣病好了，刘鹗和王懿荣就把北京所有药铺里的“龙骨”都买下来，他们在这些“龙骨”上发现了1058个古老的汉字。当时中国人对自己文字起源的了解，主要来自成书于公元121年的《说文解字》，甲骨文的发现让人们对汉字起源的了解更加深入。1903年，刘鹗出了一本书叫《铁云藏龟》。

有一天我儿子放学回来，在白板上写了个字。他说："我写了一个甲骨文，你猜猜是什么字。”我看他写下的那个字，说是“山”，他说是“火”。那三道凸起，的确像火焰。我儿子还会背诵课文，“二人从，三人众，田力男，日月明”，并且大声宣布，这就叫“会意字”。我想起我上高中时，老师才讲什么叫“会意”、什么叫“假借”，当时我认识的字不少了，害怕要通过“六书”来辨明每个字的来源，那可太难了。所幸的是，考试不会考甲骨文，也不会考“六书”。小孩子对甲骨文的那一点儿好奇，就在于那些字更像是画，“水”像是画，“目”像是画，“网”像是画，小孩子写汉字就像是画画。我儿子在上小学之前，写汉字的过程的确像画画，每一笔都神出鬼没，他不按照笔顺来写，每一笔都出其不意。上了一年级，写字作业要求一笔一笔写出笔画顺序，然后才写出整个字来。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儿子也上一年级，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跟她说，你儿子写汉字，笔顺永远是错的。那位女士不以为意，说她的那些同事，笔顺永远是错的，不耽误工作。我也觉得，笔顺不耽误工作，但还是想弄明白笔顺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会发一个写字本，通过二维码，能看到字帖，能看到汉字书写的小视频，那完全是书法的路数。我检索了一遍，发现在笔画和部首之外，还有一个名词叫汉字部件（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又叫字根或字素，是汉字书写的最小单位。有些东西，你不学，自以为明白，一学就糊涂了。笔顺（stroke order）、笔画组合关系（stroke combination），还有汉字部件，太复杂了。

我没有任何轻慢汉字的意思，就在我儿子给我写甲骨文“火”字那一天，我看到一位朋友晒他新买的书《史墙盘》，这是文物出版社出的一本咖啡桌大书。“史墙盘”是1976年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器，盘子的口径有40多厘米，底部有铭文284个字，整理成书，每个字都很大，极具压迫感。我看到那些铭文就想知道写的都是啥。也许那些喜欢书法的人，对青铜器上的字更有兴趣，他们提笔写字，对汉字肯定有更深的感情。有位书法爱好者跟我讲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夫作字之势，饬甚为难，锋铦来去之则，反复还往之法，在乎精熟寻察，然后下笔。”还有清代书法家朱和羹的《临池心解》——“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这说的都是笔顺。我还查到了元代的《书法三昧》、明代的《书法离钩》和清代的《习字秘诀》，都有笔顺的例字。当然，这都是繁体字。

我还在《中文打字机》一书中看到了意大利奥利维蒂打字机1950年的一则平面广告，画面上方是一块黑板，写满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画面下方是一排漂亮的打字机，广告语是“从古代到奥利维蒂”。显然，商周汉字代表着“古代”，新型打字机代表着文字处理的新时代。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刊登过一篇小品文，说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报社里，存放着一台中文打字机，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的键盘，其上共有5000个按键，需要一个打字员拿着喇叭发号施令，四个打字员在键盘上操作，才能打出汉字来。这篇文章还配有一张漫画，嘲笑“中文打字机”。那时候，世上大多数拼音文字已经有了从英文打字机改造而来的打字机，而“中文打字机”是一个讽刺性的比喻，是空想出来的一种极大极笨拙且效率极低的机器。也就是说，在王懿荣、刘鹗研究甲骨文的时候，洋人正嘲笑中文处理的笨拙。

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种笨拙。1892年，一个叫麦克法兰的人根据雷明顿打字机发明

了第一台暹罗文打字机，也是在这一年，闽南的卢戆章完成了“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甲午战败后，卢戆章写文章倡导切音字，“用切音字能使国人读书无一不精”，是“变通中国之大急务”，环顾世界，除“中国十八省及无字之生番而外，自余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以切音为字。是切音字为普天下万国之公理也”。这话的意思是，拼音乃普世价值。汉字的确是难，比如卢戆章这个“戆”字，我就是用“笔体学”的方式搜索而来，不知道它到底该怎么念。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我不认同卢戆章的说法，但试想一下，那时候有电报了，有打字机了，然而电报处理中文要转译，打字机无法处理中文，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像现在我们用电脑，却不能用中文，是会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我妈妈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在上世纪 80 年代，每到期末，她就有一项工作是“刻卷子”，从学校带回铁笔、蜡纸和钢板，钢板垫在下面，铺上蜡纸，用铁笔写上汉字和英语，完成一份两三页的试卷，蜡纸刻好了，带回学校印刷，用老式滚筒油墨印刷机，滚一下就印出一张卷子来。铁笔、蜡纸有“北京牌”和杭州产的“双圈牌”，我上高中以后，偶尔会帮着我妈“刻卷子”。当时他们英语教研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像宝贝一样，我始终不知道能不能用打字机把英语直接打在蜡纸上，更不知道有没有打字机能处理汉字。我从来没见过中文打字机，中文打字机也从来没进入过“家用”的阶段。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宣传部，主要工作是出校报，学校里有印刷厂，有排版车间，有检字工人。我先拿到稿子，在版面纸上画版，然后检字工拿着稿子，一个个检铅字，把一版的文字排好放在一个铸铁模具上，然后印刷。我在“二外”那个小印刷厂干过检字的活儿，把一篇文章变成一个个铸铁的小字模，实在是磨炼心性。这道工序有专门的检字工人干，我不过是体验一下。更多的时候，我闲着没事就在办公室里背英语单词。我背过刘毅的“四大本”，也背过俞敏洪的“GRE 红宝书”。刘毅的“四大本”是这样分的——“基础词汇”“五千词”“一万词”和“22000 词”，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词频”这个概念。那时候我利用工余时间，去某个夜校学电脑输入，小半年后，校报编辑部终于要用激光照排系统了。党委宣传部召开一个座谈会，题目是“从铁与火迈向光与电”，印刷厂的一位退休老工人被请来发言，老工人回忆起过往喋喋不休。虽然我们很早就学过“四大发明”的知识，知道活字印刷，可稍具常识就能推断出来，活字印刷更适合拉丁文字，打字机也更适合拉丁文字。等我多年后看了《以铸代刻》一书，便知道了中文活字印刷的来之不易。

洋人对汉字的认识，有三种手段，第一是统计字频，他们发现儒家经典《论语》，不过用了 3000 多个不同的汉字，中译本《圣经·旧约》全文 503663 字，但印刷所需的汉字是 3946 个，《圣经·新约》全文 173164 字，只有 2713 个不同的汉字，《康熙字典》中的汉字有 4 万多个，但常用的三五千汉字就足够写文章搞印刷了。传教士相信，把一套中文金属活字排布得更紧凑，就可以让排字工人在一步之内拾取所需的任何汉字，其中 500 个最常用的汉字放在一起，会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最早的中文打字机就是以这个思路发明出来的，一个大圆盘，包含 4000 个常用字，中间一圈是最常见的 700 余字。后来商务印书馆开发的中文打字机，也是以常用字构建键盘。

另一个手段是拼合汉字，英文单词由字母构成，那汉字是不是由部首构成的呢？他们发现，部首并不是汉字的“字基”，而是一种分类成分（classifier），用来查字典可以，作为组字的工具却有很多不便。比如“明”和“昔”中都有一个“日”，但大小并不相同。欧洲的字体设计师和印刷工匠生生将汉字拆开再拼合，其结果就是太难看了。拼合汉字破坏了汉字书写的连贯性、整体性和美感。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是最像英文打字机的中文打字机，只有 72 个按键，每个按键看上去都是汉字的一个“字基”，打第一下打第二下，都不会出字，打第三下，会出现 8 个汉字，要从中挑出你要打的那个字。这种交互模式不是“所打即所得”，中间加了一个“搜索”的过程，现在我们使用的输入法，其实就是这种交互模式。林语堂耗费巨资研究的打字机从未量产。

有一位英国记者曾说，汉字不能用打字机，对中国的商务发展颇有阻碍。历史学家李思纯说：“汉字的其他劣点，且不必说。只是不能造打字机一件事，便可以作废汉字的一个最坚强最确实的理由。”也许，当年的电报，类似于现在的“信息时代”，国人感到汉字不适应“信息时代”。洋人处理汉字的第三个手段是“代码”。1871年，上海与香港之间开通了电报通信，两个外国人发明了中文电码，选取6800个常用汉字，按顺序编码为0001到9999的四位数，在电码本中预留将近3000个空位置，以供电报员根据工作需要输入一些不常用的汉字。莫尔斯电报用长脉冲、短脉冲组合发送字母和数字，中文电报由数字传输，再由数字转译，是天然“密电”，而不是“明文电报”。清朝在1880年设立了电报局，这套系统此后使用了100多年。清末以来就有人研究改革，希望摆脱“四码”制度。

上世纪60年代，周有光出了一本小书叫《电报拼音化》，他在前言中说，方块汉字不便在电报上传送。要把汉字转换为数码，用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才能传送。这叫作汉字“四码”电报。收发双方都要翻查电码本，不能直接阅读，手续烦，速度慢，成本高，很是不便。周有光人送外号“汉语拼音之父”，其实，汉语拼音的“爸爸”太多了，希望将“四码电报”改为拼音电报的前人也有很多，但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电报拼音化的可行性似乎提高了。周有光期望的是“所见即所得”。1983年，周有光还是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到了晚年，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到如今还认为中国的文字不太方便，在电脑上使用不能跟人家竞争，我今天还主张要有一种很方便的中文。但是可以保留原来的困难的中文，让有时间的人去使用。应该有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就能用的语言文字。在新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你不能叫一个青年花太多时间在语文上面。”

汉字太有文化内涵了，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汉字的历史就是一部小的文化史。鲁迅先生说，汉字如结核，细菌都在其中。这两种看法截然不同，我等徘徊其间，只是觉得“一个青年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语文上面”。你越努力学中文，就越应该努力学英语。

（参考书目：墨磊宁《中文打字机》；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林西莉《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征君（6）

戴震：所读之书，五色灿然

文 · 卜键

五征君中最后一个抵京的，应是戴震。接奉征召之谕时，戴震正在浙东的金华书院主讲，同时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订注释，也将《六书音韵表》题序付刻，是以并未急于登程。当年夏，他与章学诚还在宁波道署讨论方志的体例，有所争论，也告知自己“不贵古雅”“皆从世俗”的修志原则，给章氏留下深刻印象。应地方官之邀主修地方志，亦著名学者的谋生（也谋名）手段之一，戴、章二人多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会在一起谈论切磋。至于戴震的迟迟不赴京，并非不当回事，除却手头的一些事务，更主要的怕是经济原因，缺少盘缠啊！

该年仲秋，戴震至京，租不起更买不起房子，借住于纪晓岚之宅。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写道：“仆今暂寓纪公处，出月初五移洪素人兄处。”其时纪昀从新疆赦回仅两年，家境也不富裕，戴震住了两个月就要搬家。洪素人，即辛卯科进士洪朴，歙县人，为戴震同乡好友。而纪与戴则是19年前结识的，戴震那时就在纪家住过一段，并帮他刊刻了《勾股割圜记》。这一次戴震等五征君应召，据老纪自记，第一个推荐人就是他，自是基于一种很深的了解和信任。

自乾嘉两朝以至于近现代，对戴震的评价都呈现两极化倾向，尊崇者甚众，贬抑者也不少，但都难以否认其是一个耀眼的存在，一个长久持续的存在。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今黄山屯溪区）人，家境贫寒，父亲戴弁做些贩卖布匹之类小生意，也没有一个出身大户人家、课子读书的母亲。相关传记年谱均写其很晚才会说话，有的说是九岁，多数说是十岁，以为“聪明蕴蓄者深矣”，总觉得还是与贫困有些关联；至于说他“介特多与物忤”，则画出其孤单孤独，以及缘此生成的敏感倔强。20岁之前，戴震没有什么知名人士做师傅，留下的传说是他如何把老师问得张口结舌。而他的确是一个治学天才，一个不世而出的读书种子，刻苦专注，尤其是擅能叩问质疑，索求真解。弟子汪灼说：“先生与东方日俱起，所读之书，五色灿然，终朝握管，考核礼经，为古文辞，不作一行草字。”五色灿然，指其阅读时随笔批点，以不同墨色批之再三再四，益见精审。而仅20余岁，戴震就陆续写成《六书论》《考工记图注》《转语》等，同时对算学产生极大兴趣，写作《筹算》，并访求《九章算术》。汪灼说戴震应乃父汪凤梧之邀，两次往歙县不疏园坐馆，对其在学术上的提升很关键，亦非虚语。戴震那时常苦于无书可查，无人可与讨论，汪氏斥巨资购书，邀集省内饱学之士，使他得与江永、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相交游，治学亦跃升一个台阶。戴震、凤梧、金榜等皆拜江永为师，后乾隆谕令各省征书，也是戴震将江永的著作通过朱筠呈缴，收入《四库全书》。

约在乾隆十九年春，戴震遭遇家难，仓皇离乡赴京。事因同族中豪门侵占祖先坟地，戴震告至官府，族豪倚财结交县令，欲文致其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馆粥或不继……”真是狼狈至极。钱大昕时为新科进士，选庶吉士，一日相与论学，叹为奇才，广为推介，并荐与礼部侍郎秦蕙田。蕙田正在编撰《五礼通考》，亟缺精天文历算者，闻知即往拜访，盛邀他至府中讲授和协纂。京华名士纪昀、王昶、王鸣盛、朱筠等纷纷与戴震定交，其《勾股割圜记》《考工记图注》也得以刻印，吏部尚书王安国礼聘他为儿子念孙授课，一时间名扬京城。

二十七年秋，40岁的戴震总算考中举人。此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为户部右侍郎钱汝诚，副考官为编修戴第元，同考官为时任金匮知县的韩锡胙。锡胙后来也是戴震弟子段玉裁的房师，说起当年

阅戴震试卷，见“文笔古奥，定为读书之士，榜发，窃自喜藻鉴不谬”，颇感庆幸。其实这也是戴震的幸运，多数考官既缺目力也缺情怀，看不太明白即心生厌倦，归为下等。后来戴震五次参加会试，皆未被取中。第六次为四十年乙未科，乾隆帝因他在四库馆表现优异，有意赐以翰林，而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谁知再一次落第。皇上命戴震随该科贡士一起参加廷试，然后又将53岁的他选为庶吉士，力度不可谓不大。爱惜人才，认准了就要为之铺路架桥，是弘历贯穿始终的准则。可皇上越是这样，或也越让他感到憋闷。

戴震是个心高气傲的儒者，平日落落寡合，涉及学问格外较真，措辞激烈，与京师一些学界通人说话也是直截了当，不免招恨招怨。时人很少会否认他在考证上的成就，却有一种舆论称其狂妄。王鸣盛《蛾术编》说：“余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戴氏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韩昌黎所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必谓郑康成注不如己说精也，是古之狂者、妄者。其学于世所称《十三经注疏》者检阅尚未周，而轻于立解。”戴震在四库馆的状况也不太好，像是一个独行侠，虽会帮助同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似乎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几个昔日知交，如姚鼐、程晋芳、翁方纲等，应与其在著述中指斥程朱相关，也与他的表达方式相关。

乾隆三十一年初夏，章学诚前往戴震在京居所拜访，事后记下戴对他说的一段话：

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受；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

用章学诚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自我感觉甚好，听此一番言论如当头棒喝。戴震应也对学诚的议论有所听闻，故针对性很强，有着明显的教训意味，令其深感羞愧。

有人说戴震好为人师，成名学者有几个不是如此呢？其实只要说出道理，他也很能采纳不同意见。如姚鼐在阅读《考工记图注》文稿后，写信大加称誉，但也提出一些疑问，建议不要急于成书。戴震此书颇得好评，纪昀邀其住在宅中修订，赞助刻印，未想到年轻的姚鼐竟有此议。他有些震惊（若雷霆惊耳），当即表示会认真考虑和修改，并写道：

自始知学，每憾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今足下以是规教，退不敢忘，自贺得师。何者？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他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要求别人，而至今仍应视为治文治史的法脉准绳。姚鼐的信已不可见，透过此函可知想拜戴为师，戴震提出“交相师”，话说得很恳切。


（FOTOE 供图）

戴震

排球日创造奇迹

文 · 张斌



（视觉中国 供图）

8 月 30 日，内布拉斯加排球日备受瞩目，共有 92003 人到场观看了这场女排比赛。图为内布拉斯加大学队对阵奥马哈大学队

8 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时间上午，一项崭新的世界纪录在朋友圈里留下隐约可见的涟漪。最专业的体育产业观察者抛出一张航拍照片，偌大的体育场满眼红色人潮，在巴尔的摩市已屹立百年的纪念体育场刚刚结束一场全美大学生女子排球赛常规赛季比赛，在一座传统的橄榄球赛场上尽享主场之利的内布拉斯加大学队以 3 比 0 击败同州的奥马哈大学队。第二局比赛结束时，现场主持人高声宣布，总计 92003 人入场参与“内布拉斯加排球日”观赛助战，由此创下了全球女子运动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崭新纪录。前纪录是由一场女子欧冠比赛创造的，巴萨与沃尔夫斯堡一道分享直至这个前所未有的排球日隆重登场。

如果沿着纪录的时间线再向前追寻，会遇到 1999 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中，中美联手创造的保持了 23 年之久的纪录——90185 人。前纪录与前前纪录皆是源自超级大赛，一场女子大学生排球比赛何以在一个人口不过 200 万的美国小州中一举刷新纪录呢？远远遥望，好奇之心显而易见。

内布拉斯加职业体育并不强盛，没有统治力球队，公众的体育热情常年被州内大学球队点燃。橄榄球作为第一运动的地位在州内难以撼动，内布拉斯加大学队上世纪 90 年代全盛期时曾四个赛季三夺全国冠军，自豪感和运动遗产传承至今。想当年，手握橄榄球门票是可以免费入场观看排球赛事的，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内布拉斯加女排四夺 NCAA 全国冠军，排球比赛票价扶摇直上。本次精心打造的排球日活动，下午 4 点半开始，先由两支第二级别大学球队比赛暖暖场，接着 7 点钟，主角内布拉斯加和奥马哈队再压轴出场。赛后还有歌星表演，外加烟花大秀，即便夜幕降临，氛围也始终高涨。史无前例的排球日票价友好，成年人 25 美元，高中生以下 5 美元，黄牛价一度攀至 400 美元。

内布拉斯加州政府对本次排球日活动的举办格外上心，聚合资源用心推动大学女子运动的价值提升。在这样一个小州，公立大学总计创办了 522 个女子运动项目，参加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体育联盟赛事。成绩斐然的内布拉斯加女排不过是 500 多个项目中的一个而已，但这支球队具有超强的市场感召力，两年前正是她们创造了美国大学生女排比赛观众人数纪录——18755 人，那是常态体育馆纪录，如今选择巨型橄榄球专用球场办赛，目的只有一个，打破纪录，提升人气，创造价值。给州政府和内布拉斯加大学信心的还有另外一个骄人数据，这支女排已然 309 场主场比赛满场，也只有橄榄球队的 389 场排在前列。

说干就干，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排球日热烈上演，内布拉斯加大学甚至准假一天，让同学们开心参与，宛若过节。盛大开场，女排全队在当年公牛队 NBA 赛场出场乐《天狼星》的烘云托月下，从纪念体育场长长的通道中奔跑入场，巨大的球场内专门搭建了不过 162 平方米的排球场，从巨型球场顶层看台望下去，肉眼捕捉快速飞行的球该是非常吃力的。纪念体育场可容 85000 人，内场搭建了演唱会模式的座席，让创造世界纪录成为可能。

纪念体育场百年之尊，那入场的通道原本是橄榄球选手如潮水般冲向赛场、渲染赛场气氛的最佳场景。排球日这一天，终于见到超大场面的排球人从这里跑过，与过道两旁的人们击掌相庆，很多人不禁热泪奔流。主教练库克不仅是在通道里流泪了，全场比赛中至少还经历了另外四个泪奔时刻。赛后在接受采访时，这位执教内布拉斯加女排不下 20 年的老教练甚是感慨，他宣称以往大学只会因为暴风雪才全天停课，后来因为新冠疫情，学校被迫停摆，如今有了第三个理由，那就是排球日。

首创的排球日明年是否还会续办，至今没有结论，但从收益角度看，办一次还是值得的。参赛的四所大学共同分享近百万美元的商业红利，而那些已经展露商业潜质的女排姑娘也将迎来崭新的合同。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因为A道路堵车，所以改走C道路，但会多花一些车费。

好吧……

根据电脑资讯，C道路因山崩，所以只能绕到后山路，车费又会增加一些。

好吧……

因太阳幅射线干扰，车速比较缓慢，所以随着行车时间延长又会增加一些车费。

好吧……

饭钱没了……

谁叫你们发明AI无人驾驶车，活该被我讹。

哈，我侦测出你是AI机器人。

我编号R138。

我编号C251。

真巧，我认识你姑妈。

真的呀，那帮我向她Say hello。

嗨，今天遇见您侄儿。

全自动电扇

这种AI时代我不要。

我看腻你的脸了。

换张脸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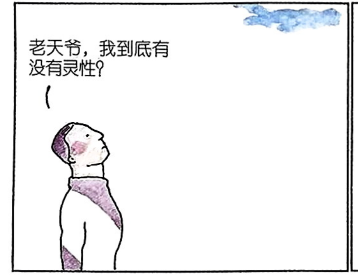
我也看腻你的身体了。

换个身材就OK了。

我和你的三观也不合！

换个芯片就解决了。

AI机器人不单一辈子不会死，也一辈子别想分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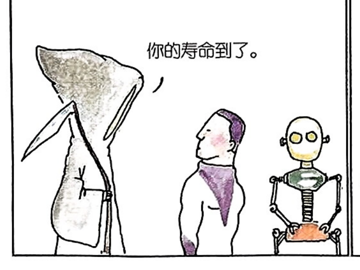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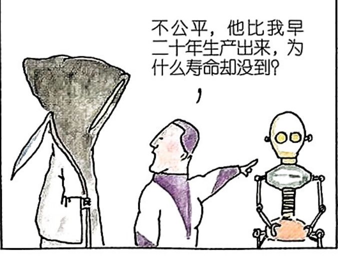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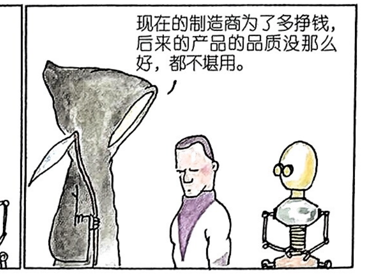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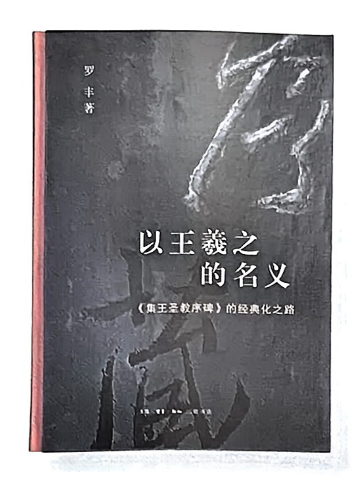
因为创造你的人满脑子只有钱。











以王羲之的名义：《集王圣教序碑》的经典化之路

罗丰 著　定价：1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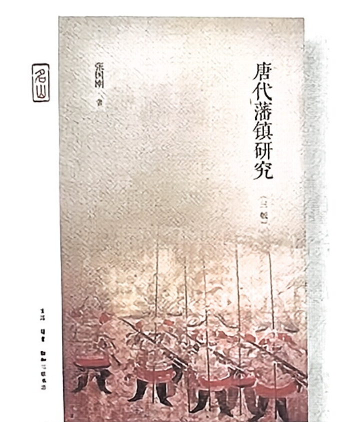
考古学者罗丰对"行世法书第一石刻"《集王圣教序碑》所做的全面考察，梳理了由唐至清人们"以王羲之的名义"推动该碑经典化的历程。他不只关注文字、书法，更考索了碑的形制、花纹、石材，以及碑的物质存在同书法和碑文内容的关系；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些重要的书法史问题。



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

吴飞 著　定价：8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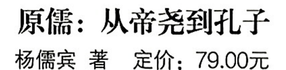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基盘上，找到"礼"的现代言说方式？作者以跨学科和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对礼学中的重要论争、经典文献、服制流变等，予以重新梳理与诠释。



唐代藩镇研究

张国刚 著　定价：7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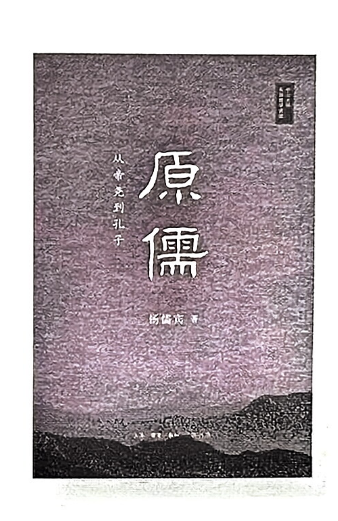
藩镇割据是中晚唐以后困扰唐廷一个多世纪的痼疾，但藩镇割据并不是藩镇研究的全部。本书涉及藩镇的形成及其存在条件、藩镇的类型及动乱的特点、藩镇与中央政治和财政上的互动等诸方面，基本勾画出唐代藩镇的真实面貌，对以往学术界忽略的或认识模糊的问题做了补充和澄清，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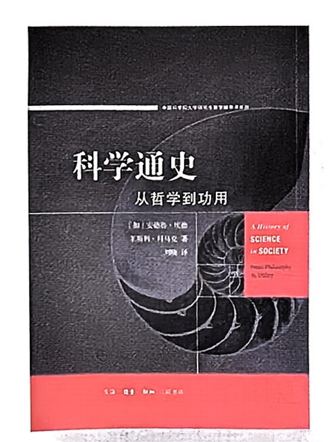


原儒：从帝尧到孔子

杨儒宾 著　定价：79.00元

"原儒"指的是自尧舜以下直至孔子的圣贤及其儒思。本书从神话传说、经籍史料和出土文物中取得线索，追溯"原儒"的谱系与事件，展现"原儒"如何在巫教、夏、商时期氤氲成形，在两周成就以文王、周公、孔子为代表的经学人文新时代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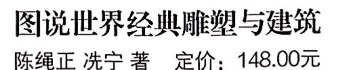




科学通史：从哲学到功用

[加]安德鲁·埃德 [加]莱斯利·科马克 著　刘晓 译　定价：1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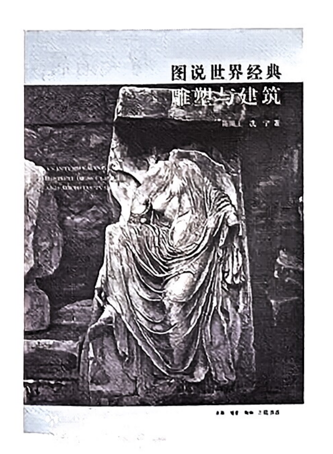
概括和梳理了近三千年来人类科学思想和文明的发展历程，汇集了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考察了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存在的张力，通过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追溯科学的历史。三分之一以上篇幅聚焦于20世纪以来的科技史，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图说世界经典雕塑与建筑

陈绳正 冼宁 著　定价：148.00元

撷取世界各文明区域、各历史时期的典型作品，还原雕塑与建筑的历史场景，并以雕塑家的专业视角，对经典作品的创作背景、特定手法、艺术效果进行深度解析，带领我们"读懂"这些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薅羊毛”大作战

文 · Tina 大王　图 · 陈曦



银行的客户经理总爱给我打电话，特别自来熟：“姐，行里送礼品，有空来拿吗？”从坚果、纸巾到锅碗瓢盆，再到大米和食用油，涉猎范围颇广，且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一向很怕麻烦，每次都找借口推托。一个周六，我再次接到她的电话，“这次礼品是一箱油，足足 12 瓶，送人自用都特别实惠”，潜台词是如果我还不动心，简直就是十足的傻瓜。

我难以抵挡“小便宜”的诱惑，加上一点点愧疚心的驱使，鬼使神差地说：“那我现在去，行吗？”

当我走进银行大厅时，客户经理像只灵巧的兔子一样蹦出来，寒暄过后就是“赠品交流大会”，她自豪地向我展示什么级别的客户能获得什么样的礼品。那些堆成小山的袋装大米和叠成墙的食用油不仅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也轻轻撩拨起我贪婪的欲念：“怎样获得这些礼品？”她发出爽朗的笑声：“我给你推荐个理财产品，定存利息实在有点低。”

完成一系列柜台操作后，我得到了一口炒锅和一大箱油。“如果在软件里参加活动，积分可以兑换更多的东西，如超市卡、话费、外卖券。”她雀跃地补充道，好像是朋友间分享精选好物，殊不知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每天清晨，我在闹铃的提醒下，兢兢业业地打开银行软件，比照规则和算法，一点点搜寻虚拟金币（积分）的踪影。

首先是签到打卡，需要一种“任外界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的毅力，中间若有断签，一切都会从头再来。系统巧妙地设置成第三天和第七天提供大额的奖励，把“死忠粉”从一批心血来潮的用户中筛选出来。

其次是完成任务。月初，我需要检查这个月的精选任务，哪些可以完成，哪些不具备资格，有些在会员日可赚取双倍积分，有些则需要提前报名。我做了细致的分类表格，完成一项就在旁边虔诚地打上对钩，被家人戏称为“羊毛宝典”。这些任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叫“自拔腿毛”，自给自足就能达标，另一种是“薅秃他人”，需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新客户。

再次是无限游戏。玩家会被“傻白甜”的规则所吸引，兴冲冲地开启第一关，前几关通常是无比顺畅、高歌猛进。当我玩到第 10 关时，却发现自己深陷丛林而找不到北，返回定会前功尽弃，若继续前进，按照目前每天 1 小时的游戏时长，我大概还要 5 年才能享受优惠券。

最后是信用卡消费。银行提供多种奖励方式，有满减、返现、加倍积分，你必须精准掌握。哪怕是再小额的消费，我都会尽量使用信用卡，但常有意外情况发生。有次购买咖啡没用上信用卡，我脸上的神情一度让新手咖啡师傅怀疑制作程序有误，跑过来连连道歉。我安慰他道：都是积分惹的祸。

奋斗一个月后，我的积分有了量的飞跃，总共兑取了 200 元的超市卡。可等我瞥了一眼理财账户时，一桶水浇得我透心凉，昨日理财收益竟然是负数，换句话说：“辛苦一天赚来的‘羊毛’，瞬间灰飞烟灭。”

我气愤地去找客户经理，她小声地向我解释：“理财本来就不保本，收益率只是参考。”与她之前笃定的态度截然不同。我只好努力消化“还我钱来”的怨气。只见她眼眸一闪，坚定地说：“你放心，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反问她：“何以见得？”她摆出共沉沦的姿态：“因为我自己也买了这种理财，要不我再送你点礼品吧？”我瞪了她半天，一时不知道谁才是那只被捕获的羊。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